埃德加·莫兰著作译丛(5)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

〔法〕埃德加·莫兰 著
陈一壮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总　序

东方和西方的交融

当我为我的主要著作《方法》[①]一书的总导言做结语时，我引用了《道德经》中称呼"道"所用的"谷神"[②]一词以宣扬"道"的"吸纳百川"的精神，这难道纯属偶然吗？当我从旨在把分离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复杂性原则"出发来定义"方法"一词时，我讲到在西方语言中该词的最初含义意味着"行进"，同时我又一次提及东方的"道"——具有"道路"的意思并且是统一阴和阳的原则，这难道纯属偶然吗？

我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了解是非常片段的，得自于对翻译著作的阅读。我自己的思想方式是受西方少数派的思想传统滋养的，这个思想传统由赫拉克利特、尼古拉·德·库萨[③]、帕斯卡、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所标志着。但是我感到我的思想方式与中国传统所固有的深刻的思想方式处于共鸣之中。我认为从复杂方法中可以归结出的两个基本原则——两重性逻辑（dialogique）的原则和

---

① 《方法》(La méthode)是莫兰的多卷本巨著，由法国色伊(Seuil)出版社出版，迄今已出四卷：1.《自然之自然》(1977)，2.《生命之生命》(1980)，3.《认识的认识》(1986)，4.《思想观念》(1991)，其中1、4两卷的中译本已收入本译丛。

② "谷神"，见《道德经》第六章，法文版中译为"山谷的精神"。——译者注

③ 尼古拉·德·库萨(Nicolas de Cusa, 1401—1464)，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哲学家，西方某些学者认为他是黑格尔的前驱。——译者注

回归环路的原则——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们以其他词语所做的同样的表述。因此表明对立的原则和概念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互补地联系着的。而且它们在这种互补联系中仍保持着彼此对立性的两重性逻辑的原则，实质上不仅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修正性的发展，而且可以看作是对从老子到方以智[①]的中国思想家的一个关键思想的现代、西方式的表述。

同样，在本"译丛"所收入的著作中，我阐释并运用来理解宇宙中和宇宙本身的自我创造及自我产生过程的"回归的环路"这一原则，与在方以智那里得到充分表述的"道"的一个深藏的主题也是彼此相应的。

此外，当我在努力寻求一种不是以孤立和封闭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而是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来把握对象的认识方法的时候，我总是自然地感到与中国的注重联系、变动和转化的思想相沟通。我甚至可以用庄子的话做我许多著作的引言："大知闲闲，小知间间"[②]；当然"大知"需要和包含着"小知"。在此，我们与指导我的帕斯卡的原则会合了：

> **所有的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

---

① 作者在本序中一再提到中国17世纪的杰出思想家方以智(1611—1671)。这与他仔细阅读过本文译者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答辩通过的关于中西辩证法比较的博士论文有关。该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是黑格尔和方以智辩证法思想的比较研究。其缩写在国内发表于《中国哲学》杂志第18辑(岳麓书社，1998年9月)。——译者注

② 语见《庄子》第2篇《齐物论》，意为大的智慧宽容广纳，小的智慧务求精细的区分和取舍。——译者注

因此我非常高兴看到我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我相信尽管有着词语的不同，中国读者会比许多西方读者更易于理解我，因为这些西方读者忠于笛卡儿的分离和区别的原则远胜于忠于帕斯卡的连接和相互作用的原则。

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几乎是零。在这方面我只是阅读过长篇小说《水浒传》，但是感到一种精神上高度的满足。我一边读，一边不停地思量："他们与我们多么相似！""他们与我们多么不同！"

正是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这种统一性中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精神的财富。它认证了我们的地球公民籍，同时又包含着我们各自民族的公民籍而不使之变性。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的是1992年我应邀访问中国，我曾经既沉浸在西安数千年的古史中，又漫步于上海、深圳和广州这些未来时代的前沿阵地。我感到与人类这个巨大部分感人的命运相沟通，它的文明诞生于人类历史纪元的初期，而今又迎击着全球时代的所有挑战。

作为一个十分遥远而又十分亲近的朋友，我向你们献上这些话，你们将在这个朋友的书里既发现距离又发现相通之处。

埃德加·莫兰

1999年7月5日于巴黎

出版者说明

本书的书名是由我们确定的，它汇集出版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的下述两篇教育学论著的中译本：

1.《未来教育所必需的七种知识》(Les sept savoirs nécessaires à l'éducation du futur)，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99年10月出版；

2.《构造得宜的头脑》(La Tête bien faite)，由法国色伊(Seuil)出版社在1999年5月出版。

目　　录

未来教育所必需的七种知识

构造得宜的头脑

未来教育所必需的七种知识

感　谢　词

我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特别是它的“为一个可行的未来而教育”这个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主任 Gustavo Lopez Ospina 的理解和支持，后者激励我以我可能达到的最完整的形式来表达我的建议。

本文曾经送交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大学人士和国际事务官员审阅，他们之中有 Andras Biro（匈牙利，联合国发展问题专家）、Mauro Ceruti（意大利，米兰大学），Emilio Roger Ciurana（西班牙，巴利亚多里德大学）、Eduardo Dominguez（哥伦比亚，波利瓦尔教皇大学）、Maria de C. de Almeida（巴西，北里奥格朗德联邦大学）、Nadir Aziza（摩洛哥，欧洲-地中海研究讲座教授）、Edgard de A. Carvalho（巴西，圣保罗天主教大学）、Carlos Garza Falla（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Rigoberto Lanz（委内瑞拉，中央大学）、Carlos Mato Fernandez 乌拉圭，共和国大学）、Raul Motta（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复杂思想国际研究所）、Dario Munera Velez（哥伦比亚，波利瓦尔教皇大学前校长）、Sean M. Kelly（加拿大，渥太华大学）、Alfonso Montuori（美国，加利福尼亚整体性研究研究所）、Helena Knyazeva（俄罗斯，俄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Chobei Nemoto（日本，援助艺术基金会）、Ionna Kuçuradi（土耳其，Beytepe Ankara 大学）、马胜利（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Marius Mukungu-Kakangu（扎伊尔，金沙萨大学）、Peter Westbroek（荷兰，莱登大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 Nelson Vallejo-Gomez 收集和综合所提出的评论和建议，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如此修订的文本得到我的同意。

我向他们每一个人致以热忱的谢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作的序言

当我们瞻望未来时，关于我们的子女的、我们的孙辈的、我们的孙辈的子女的世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至少对于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如果人们希望地球能够满足居住在它上面的人类的生存的需要，那么人类社会将必须改变。因此明天的世界将应根本不同于我们今天在20世纪将终和新千年将始之际所认识的世界。因此我们应为建设一个“可行的未来”而努力。民主、公正和社会正义、和平以及与我们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应该构成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主导词。我们应该保证“可持续性”的概念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区的指导方针、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活动的基础。

在朝向我们的生活的和行为的方式的根本变革而前进的过程中，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教育是“未来的力量”，因为它是实现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我们要接受的一个最困难的挑战将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之能够面对形成我们世界的特点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变化的迅速性和不可预见性。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组织知识的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应该推倒学科之间的传统的壁垒和设想怎样把迄今被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我们应该重新制订我们的教育政策和教学大纲。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瞄准长远的目标，考虑到我们对之负有重大责任的未来世代的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从可持续性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教育问题，这特别体现在“关于教育、启发公众和为可行性而进行培养

的国际项目”的负责人的工作中，这个项目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1996年发起。这个工作项目宣传是被各国批准了的优先任务，并呼吁这些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工商业界、学术团体、联合国的系统和国际金融机构迅速采取措施，以便把为着一个可行的未来服务的新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从而改革各国的教育政策和教学纲要。在这项事业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要求发挥推动国际行动的动力的作用。

正是在这个框架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埃德加·莫兰在他的“复杂思想”的观点的背景下表达他对未来教育的本质的看法。因此这个文件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促进关于教育朝着可持续发展重新确定方向的方式而展开的国际讨论而发表的。埃德加·莫兰提出了他认为对于未来教育是必要的七项关键原则。我最大的祝愿是他的思想引起一场讨论，以协助教育者和决策者澄清他们自己在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的思想。

我最真诚的谢意献给埃德加·莫兰，感谢他接受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在“为着一个可行的未来而教育”的跨学科项目的框架内，来刺激可以促进这一讨论的思考。我同样向以他们的建议协助丰富了这个文本的国际的专家们致以衷心的谢意，还要特别感谢 Nelson Vallejo-Gomez 先生。

像埃德加·莫兰这样的杰出的思想家们的投入和智慧是无比珍贵的，他们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对准备未来所不可缺少的思想的深刻变革。

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

前　言

本文被设想为是先于任何教学指南或概要的。它不处理有关被或应被教授的全部材料的问题，而仅仅基本上围绕阐述中心的或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仍然被完全无视或忽略，但却是在未来的世纪中必须加以教授的。

有七种"基本的"知识是未来的处于任何社会和任何文化中的教育毫无例外都不能排除的，而只应根据每个社会和每个文化特有的风尚和准则加以处理。

我补充说明本文作为依据以给人类地位定位的科学知识不仅是暂时的，而且还将导致关于宇宙、生命、人类的诞生的更加深刻的神秘。在这里一个"不可判定的"领域敞开着，使得通过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而存在的各种哲学的选择和宗教信仰可以干预其中。

七种必要的知识

第一章　认识中的盲点：错误与幻觉

◆ 致力于传播知识的教育对于什么是人类认识、它的机制、它的弱点、它的困难和它可能导致错误和幻觉的倾向毫无所知，毫不关心对于什么是认识加以认识，这是令人担心的。

◆ 事实上，认识不能被看作一个 ready made[①]工具，人们可以只加应用而无须考察其本性。因此对认识进行认识应该显

① 英文：预先准备好的。——译者注

得具有头等重要性,以帮助我们面对不断干扰人类精神的错误和幻觉的经常出现的危险。问题在于在这场至关重要的战斗中用清醒意识来武装头脑。

◆ 在教育中需要引入和发展关于人类认识的大脑的、精神的、文化的特质的研究，关于它的过程和类型的研究，关于使它冒着犯下错误或发生幻觉的风险的心理和文化的倾向的研究。

第二章　恰切的认识的原则

◆ 一个一向被忽略的关键性问题是促进形成如下一种认识能力的必要性：善于抓住总体的和基本的问题,并在这个框架内整合部分的和局部的认识。

◆ 由于根据学科划分而被片段化了的知识占据优势,常常使人不善于进行部分和整体之间的连接工作。上述认识应该让位于能够在其背景、复杂性、整体中把握对象的认识的模式。

◆ 有必要发展人类精神的把任何信息在一个背景中和一个总体中加以定位的自然的禀赋。有必要教授有关的方法使得受教育者能够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掌握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

第三章　教授人类地位

◆ 人类存在同时是物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但是人类本性的这种复杂的统一性在教育中由于学科的划分被完全瓦解了,因此现在已变得不可能学习人类存在的真正含义。而现在必须恢复这个含义,使得无论在何处的每一个人同时了解和意识到他的复杂的本性和他与所有其他人共有的本性。

◆ 因此，人类地位将应成为任何教育的基本对象。
◆ 本章指出怎样可能从现有的学科出发，通过汇总和组织分散在自然科学、人类科学、文学和哲学中的知识重现人类的复杂的统一性，并表明在整个人类范围内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不可消解的联系。

第四章　教授地球本征

◆ 人类今后的全球性的命运是被教育遗忘的另一个关键的现实。对在 21 世纪将继续增强的全球化的发展的认识，对于每个人和全体人将日益变得不可避免的对于地球本征的承认，应该成为教育的一个主要题目。
◆ 适于教授以 16 世纪所有大陆之间的交往为开端的全球纪元的历史，表明世界的所有部分如何变得相互依存，但并不因此掩饰曾经遍及人类的一部分人压迫和控制另一部分人的事实，这个事实迄今尚未完全消失。
◆ 必须指示标志着 20 世纪的全球危机的复杂性，表明全体人类今后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家生活在同一命运共同体之中。

第五章　迎战不确定性

◆ 科学曾经使我们获取了许多关于确定性的知识，但在 20 世纪也向我们揭示了无数的展现不确定性的领域。教育应该包含教授关于在物理科学（微观物理学、热力学、宇宙学）、生物进化科学和历史科学中出现的不确定性的知识。
◆ 应该教授策略的原则，使人们能够对付随机因素、意外事件和不确定性，根据在前进途中获取的信息修改前进的计划。必须学会在散布着确定性的岛屿的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
◆ 古希腊诗人欧里庇得斯 25 个世纪前的格言现在比任何时

候都更加现实："期待之事没有实现，神灵打开通往意外之事的大门。"抛弃认为可以预见我们的未来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决定论的观念，审察20世纪的都是出乎预料的事件和变故，今后人类征途的不可知的特点应该促使我们培养准备应付不测事件而处理它们的头脑。所有身负教育之责的人们应该走向迎击我们时代的不确定性的最前哨。

第六章　教授相互理解

- 相互理解既是人类交流的手段又是其目的。但是在我们的教学中还缺乏关于理解的教育。地球上在所有的方面都需要相互理解。鉴于教育理解在所有的教育层次上和对于所有年龄的受教育者都是重要的，发展理解要求改变精神状态。这应当是未来的教育的工作。
- 在无论亲近的还是疏远的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今后对于人类关系走出其互不理解的野蛮状态是至关重要的。
- 从而产生了研究不理解的必要性，研究它的根源、它的类型和它的后果。这样一种研究如果不是针对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蔑视他人的表现，而是针对其原因，那就更为必要。它同时构成了争取和平的教育的一个最可靠的基础，而和平是我们的根基和使命。

第七章　人类的伦理学

- 教育应该在考虑到人类地位的个人⟷社会⟷族类的三位一体的性质的基础上导向一个"人类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族类的伦理需要个人对社会和社会对个人的相互控制，亦即民主。个人⟷族类的伦理学还在21世纪召唤着地球公民资格。
- 伦理规范不能通过道德课来教授，它应该在精神中从关于

人既是个人,又是社会的一部分,还是族类的一部分的意识出发来自我形成。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含有这个三重的实在。因此,任何真正的人类的发展应该包含个人的自主、对共同体的参与和从属于人类的意识这三者的联合的发展。

◆ 从此出发勾画出了新千年的两大伦理—政治的目标:通过民主建立社会和个人之间互相控制的关系,完成人类作为全球共同体。教育应该有助于不仅形成关于"地球是我们共同的祖国"的意识,而且使得这个意识转变为实现地球公民籍的意志。

第一章　认识中的盲点：错误和幻觉

任何认识在本身都包含着产生错误和幻觉的危险。未来的教育应该正视错误和幻觉的两个面目的问题。最大的错误将是因低估错误的问题而产生的错误，而最大的幻觉将是因低估幻觉的问题而产生的幻觉。承认错误和幻觉的存在会由于错误和幻觉愈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自我承认而愈加困难。

从智人(homo sapiens)[①]出现起，错误和幻觉就干扰着人类精神。当我们检查既往，包括新近的既往时，我们感到它遭遇到许多错误和幻觉的支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正确地说过：人们总是制订关于他们本身、关于他们在做什么、关于他们应该做什么、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虚幻的观念。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自己也没有避免这些错误。

1. 认识的阿基里斯(Achille)[②]的脚踵

教育应该表明没有一种认识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错误和幻觉的威胁。信息论表明在任何信息的传输中，在任何消息的通讯中

---

① 智人代表着古人类学中关于从猿到人的进化的历史分期中最晚近的一个阶段，智人在体质形态上最接近现代人类。——译者注

②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健美、英勇的无敌战士。传说在他幼年时母亲忒提斯曾握其脚踵倒提着他把他浸入斯提克斯冥河水中，从而使他周身刀枪不入，只有他的脚踵因为没有沾到冥河水成为“致命弱点”。后被帕里斯用箭射中他的脚踵而死。——译者注

都存在着在随机干扰或噪声(noise)的作用下发生差错的可能性。

一种认识不是对事物或外部世界的反映。所有的知觉都同时是从被感官截取和编码的刺激或信号出发由大脑作出的翻译和重构。由此,会产生我们清楚地知道的许多知觉的错误,但是它们却来自我们最可靠的感官——视觉器官。在知觉的错误之外还要加上理智的错误。认识是在词语、观念和理论的形式下借助语言和思想进行的翻译/重构的结果,从而它也承受出错误的危险。这种既作为翻译又作为重构的认识包含着解释,这把出错误的风险引进了认识者的主观性、他的世界观、他的认识原则的内部。从而尽管有我们的理性的控制,无数的概念的和观念的错误自发产生。我们的意愿或我们的担忧的投影,我们的激情造成的对思想的干扰,使出错误的危险倍增。

人们可能认为通过压制任何情感性人们可以消除犯错误的危险。确实,感情、怨恨、爱情、友谊可能使我们盲目起来。但是也必须指出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已经是,而在人类的世界里尤其是:智能的发展与情感亦即与好奇心、热情的发展不可分,它们构成哲学的或科学的研究的动力。因此情感性既可能窒息认识又可能滋养认识。在智能和情感性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关系:感情的亏损可能降低甚至摧毁推理的能力;在感情上反应能力的削弱甚至可能是非理性行为的根源。

因此不存在凌驾感情的理性的高层,而只有理智⟷情感的圆环;在某些方面产生激情的能力对于理性行为的运作是不可缺少的。

科学认识的发展是探测错误和抵抗幻觉的强有力的手段。尽管如此,支配科学的范式可能发展幻觉,而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具有抵制错误的永久免疫力。此外,科学认识还不能单独处理认识论的、哲学的和伦理学的问题。

因此教育应该投入对错误、幻觉和盲目性的根源的探索。

1.1 心理的错误

大脑没有任何设施使得可能区分幻觉与知觉、梦境与清醒、想像物与现实、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

在人类身上幻觉与想像之物的重要性是闻所未闻的。鉴于把机体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脑—神经系统的进路与出路只占总体的2%，那么98%的部分的工作都关系到内部的运转，构筑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世界，在其中需要、梦想、欲望、观念、形象、幻觉在骚动，而这个世界渗透到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或概念中。

此外在每个精神中还存在着产生自欺(self-deception)的谎言的可能性，它也是错误和幻觉的经常的源泉。自我中心主义、自我辩护的需要、把坏事的原因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倾向，使得每个人自己向自己说谎而不对这个他本人是作者的谎言加以探测。

我们的记忆本身也是受到十分多样的错误的源泉的影响。一个记忆如果不被回忆加以复现就会趋于变得模糊，但是每次回忆可能不是将其美化就是将其丑化。我们的精神无意识地趋于选择对我们有利的记忆，而压抑甚至抹去不利的记忆；每个人在此起着自我阿谀的作用。他趋于通过不自觉的投影或混淆使记忆发生变形。有时存在人们确信经验过的虚假的记忆，如同存在人们确信从未经验过的被压抑的记忆。从而，记忆这个真相的不可替换的源泉，它可能受到错误和幻觉的影响。

1.2 理智的错误

我们的观念系统(理论、学说、意识形态)不仅受到错误的影响，而且还保护被纳入其内部的错误和幻觉。任何观念系统抵抗不适合它的或它不能加以吸收的信息，这是符合其组织的逻辑的。理论抵抗敌对的理论或对立的论据的进犯。虽然科学理论是惟一

接受被驳倒的可能性的，但它仍趋于表现这种抵抗性。至于学说，即关闭于自身之中的和绝对信服其真理性的理论，它们是任何揭露它们错误的批评所攻不破的。

1.3 理性的错误

使得能够区分清醒与睡梦、想像物与现实、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的，是精神的理性的行为，它借助了环境的控制（物质环境对欲望和想像的抵抗）、实践的控制（检验的行为）、文化的控制（对共同的知识的参照）、他人的控制（你是否和我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大脑皮层的控制（记忆、逻辑操作）。换言之，合理性（rationalité）是校正器。

合理性是抵抗错误和幻觉的最好的屏障。一方面有建构的合理性，它在制订和谐的理论时检查理论的组织的逻辑性、形成理论的各观念之间的相容性、理论论断与它们应用于其上的经验材料的一致性。这样的合理性应该保持对与它抵触的异议的开放性，否则它将自我封闭为学说而演变为合理化（rationalisation）。另一方面，有批评的合理性，它特别用于处理信仰、学说和理论所包含的错误和幻觉。但是当合理性蜕变为我们刚才指出的合理化时，在其内部也存在发生错误和幻觉的可能性。合理化自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建基于演绎或归纳之上的完美的逻辑系统；但事实上它是建立在残缺的或虚假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拒绝表示异议的论证和经验的检验。合理化是封闭的，合理性是开放的。合理化虽然吸取着与合理性同一的源泉，但是它构成错误和幻觉的最强大的源泉之一。因此，一个遵从机械论的和决定论的模式来考察世界的学说不是合理的，而是合理化的。

在本性上是开放的真正的合理性会与抵抗它的现实进行对话。它在理论的逻辑机制和经验机制之间进行不断的穿梭运行。它是多种观念论证争辩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观念系统的私产。无

视存在、主观性、情感性、生命的理性主义是不合理的。合理性应该承认情感、爱情、懊悔的领域。真正的合理性知道逻辑、决定论、机械论的极限，它知道人类精神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存在，也知道现实包含有神秘。它与非理性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不可理性化的东西谈判。它不仅是批评的，而且是自我批评的。人们认出真正的合理性是从后者具有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的能力上。

合理性并不是科学家和技术师具有而其他人不具有的一种品质。主张原子学说的、在他们的技能的领域里和在实验室的约束下是合理的学者，可能在政治上或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是完全不合理的。

同样地，合理性也不是西方文明独占地拥有的一种品质。西欧人曾长久地自以为是合理性的所有人，而只在其他文化中看到错误、幻觉和愚昧，并根据技术效能的标准来判断任何文化。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任何社会包括原始社会中，就已在工具的制作，狩猎的策略，认识植物、动物、地形中存在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神话、巫术、宗教。在我们的西方社会中，也有神话、巫术、宗教的存在，包括关于神圣的理性的神话和信奉进步的宗教。当我们认识到被包含在我们的合理性中的合理化时，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神话——其中有关于我们的理性的全能性的神话和关于被保障的进步的神话——时，我们才开始变成是真正合理的。

从而产生了在未来的教育中承认一个合理的不确定性的原则的必要性：合理性如果不保持它的自我批评的警惕性，不断地冒着陷入合理化的幻觉中去的风险。这说明真正的合理性不仅是理论的，不仅是批评的，而且是自我批评的。

1.4　范式上的盲目

真理和错误的游戏不仅在理论的经验检验和逻辑和谐的范围内进行，它也在更深藏的范式的看不见的领域内进行。因此教育

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一个范式可以如下确定：

◆ 提升/选择可理解性的主导概念：因此，“有序”在决定论的观念中、“物质”在唯物论的观念中、“精神”在唯心论的观念中、“结构”在结构主义的观念中都是被选定的/进行选择的主导概念；它们排除对立的概念或使之从属于自己（相应地依次是“无序”、“精神”、“物质”、“事件”的概念）。因此，范式的层次就是对概念进行选择的原则的层次，它使不同的概念或者被融入论述或理论，或者被疏远和抛弃。

◆ 决定主导的逻辑操作：范式深藏在逻辑之后，选择在它的统治内同时变得主要、适当和明显的逻辑操作（排除/纳入、分离/连接、蕴含/否定）。是它给予某些逻辑操作以优先权而贬低其他逻辑操作，比如优待分离而贬抑连接；是它给予它所选中的逻辑方法以有效性和普遍性。从而它给予它所掌控的论述或理论以必然性和真理性的特点。通过它的规定（prescription）和它的禁令（proscription），范式建立公理和表现为公理。（如说“任何自然现象服从决定论”，“任何人类特有的现象通过与自然的对立来定义”……）

因此，范式对概念化和逻辑操作的方法进行选择和决定。它决定可理解性的基本范畴，并支配对它们的应用。因此，个人根据由文化纳入他们脑中的范式来认识、思想和行动。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现有两个关于人类/自然的关系的对立的范式。第一个范式把人类纳入自然，任何遵循这一范式的论断都把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和承认“人的自然本性”。第二个范式规定了这两项之间的分离，并确定在人身上有特定的排斥自然的概念的东西。这两个对立的范式其实共同地服从一个更加深刻的范式，这就是简单化的范式。后者面对任何概念的复杂性规定了或者是还原（在此是把人还原为自然）或者是分离（在此是实行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的方法。这两个范式都阻止设想人类存在的"一中之二"(自然的/文化的,脑的/心理的),同时阻止设想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既蕴涵又分离的关系。只有蕴涵/分离/连接的复杂的范式可能建立这样的概念,但是它还未被纳入科学文化之中。

范式在任何理论、学说或意识形态中起一个既是地下的又是至高的作用。范式是无意识的,但它浇灌着有意识的思想,支配它,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超意识的。

简言之,范式建立构成公理的首要的关系,后者又决定概念,支配论述和理论。它组织它们的组织,它产生它们的产生和再产生。

在此我们应该提及由笛卡儿(Descartes)提出,并自 17 世纪由欧洲历史的发展树立起其权威的"伟大的西方的范式"。笛卡儿范式分离主体与客体,根据每个人的工作领域的不同,形成了这边是哲学和反思的研究、那边是科学和客观的研究的形势。这种分离涉及整个宇宙:

主体/客体
灵魂/肉体
质量/数量
目的性/因果性
感情/理性
自由/决定论
存在/本质

这确实关系到一个范式,它决定主导概念和规定逻辑关系:分离。不遵从这个分离的东西只能是地下的、边缘的、离轨的。这个范式决定了双重的世界观——事实上,是把同一个世界两重化:一方面是一个遭受观察、实验、摆布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向自己提出存在的问题的主体的、交流的、意识的、命运的世界。

因此，一个范式可能同时既是使人明达的又是使人糊涂的，既是起揭示作用又是起遮蔽作用的。在它的内部蜷缩身体躲藏着一个有关真理和错误的游戏的关键的问题。

2. 刻印作用和标准化

范式的和解释模式的决定论连接着信念的和信仰的决定论，在它们统治一个社会的时候，向全体人和每个人树立神圣事物的权威的力量、教条的标准化的力量、禁忌的禁止的力量。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和意识形态同样拥有权威的力量，给信服者带来明证；还拥有威慑的力量，给其他人带来起抑制作用的恐惧。

威严的和强制的权力与范式、正统的信仰、统治性的学说、建立起来的真理相联合，确立了认识的框框、不加审察而接受的观念、无人表示异议的愚蠢的信仰、通行无阻的歪理、以明证的名义对明证的抛弃。这个权力在到处建立认识上和理智上的循规蹈矩的优势。

所有特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定性(权力、等级制、阶级区分、专业化和当代的工作中的技术—官僚主义化)和所有特有的文化的规定性会聚起来并协同动作，以便把认识束缚在一种由绝对律令、规范、禁忌、僵硬性和阻限构成的多重决定论的机制之中。

因此在认识的循规蹈矩下面有大大多于循规蹈矩的东西。有“文化的刻印作用”，即被深深地记录在循规蹈矩的行为中的文化模式的印迹；还有可以消除与之抵触的东西的“标准化”。“刻印作用”(imprinting)是孔纳德·罗伦兹(Konrad Lorenz)[1]提出来的一

---

① 奥地利生物学家，1903—1989，现代动物行为学创始人，获诺贝尔医学奖。——译者注

个术语，说明幼小动物的最初一些生活经验加予它们的永久性印象（比如在雏鸟那里，它们脱壳而出时，总是把经过它们旁边的第一个生物作为母亲加以跟随。这种情况安徒生[Andersen]已在丑小鸭的故事里以他的方式向我们讲述过）。文化的刻印作用从人类出生起就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迹，首先是家庭文化的，然后是中小学的标记，然后一直持续到大学里或职业中。

因此，遵循社会和文化对于观念作出的选择很少依据后者的真理性；这种选择可能是相反地对于对真理的追求毫不宽容。

3. 精神学：被支配

马克思说得很正确："人脑的产物具有独立存在的方面，被赋有特殊的身体，它们与人类进行交流，并被人类用来相互交流。"

我们说得更多一些：信仰和观念不仅仅是精神的产物，这也是具有生命与力量的精神存在。因此，它们可以支配我们。

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从人类的黎明起，精神圈已经升起，这是精神事物的领域，伴随着神话、神祇而展开。这些精神存在的惊人的崛起引起和推动智人投入在动物世界中未知的狂想、屠杀、凶残、崇拜、痴迷、圣化。自这个黎明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使文化丰富起来的神话的丛林的中间。

完全源出于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精神的精神圈存在于我们身上，而我们又存在于精神圈之中。神话从由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想像所产生的幻觉出发而获得形状、坚实性、现实性。神话与观念又回到我们身上，侵占我们，给我们以激情、爱情、仇恨、痴迷、狂怒。被控制的人类可以为了一个神祇、为了一个观念去赴死或杀人。在这个第三个千年的黎明，我们的"思想的"精灵如同古希腊人的精灵，有时如同《福音书》中精灵，仍然驱动我们，完全占据我们的意识，使我们变得无意识，同时又给我们一个幻觉——我们是

有超级意识的。

社会通过神话和观念驯化个人，而神话和观念又轮到它们来驯化社会和个人，但是个人能够彼此驯化他们的观念，同时他们能够控制控制着他们的社会。在如此复杂的(互补的—对抗的—不确定的)在三个实体(个人/社会/精神圈)之间展开的互相控制—剥削—寄生的游戏中，可能有进行共生的研究的地位。这绝不意味着让我们以把观念化归为纯粹的工具和把它们变成事物作为理想。观念由于和为着人而存在，而人也由于和为着观念而存在。只有当我们知道也为它们服务时我们才能很好地使用它们。难道不应该意识到我们被支配的状态以便能够与我们的观念对话，在它们控制我们之时我们也控制它们，和向它们施以有关真理与错误的检测？

一个观念或一个理论既不应被完全工具化，也不应专制地发号施令；它应该被相对化和被“驯化”。一个理论应该帮助和引导人类主体制订认识的策略。

我们很难在下面出自同一根源的东西之间辨认使它们相互区别和对立的环节：观念性(idéalité)，即观念翻译现实所必要的存在形式，和唯观念论(idéalisme)，即观念对现实的占有；合理性，即观念与现实对话的机制，和阻止这一对话的合理化。同样地，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来看出在科学的或理性的标签下被掩藏的神话。

我们又一次看到对于认识的主要的理智的障碍存在于我们的认识的理智的手段之中。列宁曾经说过事实是固执的。他没有看到固定的观念和思潮，他自己的，是更加固执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摧毁和吞吃着事实。

但是，是观念使我们能够认识观念的缺陷和危险。从而有这个无法逃避的悖论：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反对观念的决定性的斗争，但是我们只能依靠观念的帮助来进行这一斗争。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把我们的观念保持在它们的中介作用中，我们应该阻止把

它们视为与现实同一。我们应该只承认下述观念是值得相信的，这些观念包含着一个观念："现实抵抗观念"。这是一个在反对幻觉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任务。

4. 意外之事……

意外之事使我们惊讶，这是因为我们过分安心地把自己安置在我们的理论里和我们的观念中，而我们的理论和观念没有任何接待新事物的结构。但是新事物不断地涌现。人们永远不能如它们将出现的那样预见它们，但是人们应当等待它们的到来，也就是说等待意外之事（参阅第五章"迎战不确定性"）。而一旦意外之事突然发生，应当能够为之修正我们的理论和观念，而不是使用产钳把新事实拖入不能真正接待它的理论之中。

5. 认识的不确定性

有着多少错误和幻觉的源泉、原因啊，它们在所有的认识中各式各样，不断翻新！

从而对于任何教育产生了引出对我们认识的可能性的重大探询的必要性。进行这些探询构成任何认识事业的氧气。如同氧气曾经杀死原始的生物直到生命能够利用这个腐败剂来做解毒剂，不确定性杀死简单化的认识而成为复杂认识的解毒剂。总而言之，认识永远是一种探险，教育应该向它提供不可缺少的获取成功的手段。

对于认识的认识应该作为一个原则和一个经常的必要性在教育中出现，它包含着把认识者整合在他的认识之中。

我们应该知道：存在着可能进行"真正的"探询的生物—人类

学的条件(人的大脑←→精神的能力)、社会—文化的条件(开放的文化允许观念的对话和交流)和精神学条件(开放的理论),它们使得可能进行关于世界、人类和认识本身的根本的探询。

我们应该知道:在对真理的追求中,自我观察的行为应该与观察的行为不可分,自我批评应该与批评不可分,反思的过程应该与客观化的过程不可分。

由是,我们应该学会:寻求真理需要寻求和制订使得可能进行反思的元观点,这个元观点特别包含了把观察者—认识者整合到观察—认识活动中去的行为,包含了把观察—认识在它们的思想和文化的背景中加以环境化的行为。

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观念使我们遭受的被支配的形势来使我们正好被批评的、自我批评的、开放的、关于复杂性的观念所支配。我在此捍卫的观念并不是我拥有的所有观念,而主要是支配着我的观念。

更广而言之,我们应该努力在两重支配上——一个是我们的精神对观念的支配,另一个是观念对我们的精神的支配——施展身手,以便从相互支配最终达到一种亲善共生的形式。

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问题:建立与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神话的和睦相处的关系。

人类精神应该当心他的思想的产物,而后者对他同时又具有与生共存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经常进行控制以避免唯观念论和合理化。我们需要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观念之间的谈判和相互控制。我们需要我们精神的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和通讯。必须意识到“本我”(ça)和“人们”(on)通过“我”而讲话,并不断保持警惕以尽力检测自欺的谎言。

我们需要使我们的理论文明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新一代的开放的、合理的、批评的、反思的、自我批评的、能够自我改善的理

论。

我们需要找到精神圈的元观点，它只会在复杂观念的帮助下突然涌现；这些复杂观念与我们的精神本身合作寻求元观点以观察自身和认识自身。

我们需要一个使复杂的认识成为可能的范式结晶出来和扎根下来。

错误和幻觉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和无时不在的：那些来自文化的和社会的外部现实的错误和幻觉克制精神的自主性和禁止对真理的追求；那些来自内部的、有时是蜷缩在我们最好的认识手段的内部的错误和幻觉，使精神自己欺骗自己、不明自己。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多少痛苦和迷途由错误和幻觉而产生，而在20世纪这还以十分令人恐怖的形式展现出来。因此，认识问题具有人类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重要性。如果在21世纪可能会有基本的进步，这将是因为男人们和女人们不再是他们的观念的和他们的自欺的谎言的无意识的玩偶。因此教育的首要责任是在争取具有清醒意识的极其重要的战斗中武装每个人。

第二章　恰切的认识的原则

1. 关于认识的恰切性

对于世界的关键问题，对于关系到这个世界的关键的信息的认识，无论它是多么不定和困难都应努力进行，否则认识就会残缺不全。这特别是在今天，因为任何政治的、经济的、人类的、环境的……认识，其背景都是世界本身。全球纪元要求把任何事情都定位于全球的背景和复杂性中。对于世界作为世界的认识变成一种既是理智上的又是生存上的必要性。这是向所有新千年的公民提出的普遍的问题：怎样获取关于世界的信息和怎样把握把它们连接起来和组织起来的条件？怎样察觉和认识背景、总体(整体/部分的关系)、多维度、复杂性？为了连接和组织知识，并通过它们发现和认识关于世界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思想的改革。不过，这个改革是范式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这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组织知识的能力。

未来的教育面对这个普遍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是分离的、被肢解的、箱格化的，而另一方面现实或问题愈益成为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

在这种不适应中下述东西变得不可见：

- 背景
- 总体
- 多维度
- 复杂性

因此为了使认识成为恰切的，教育将应该使它们变得明显。

1.1　背景

对于孤立的信息或资料的认识是不够的。必须把信息和资料放置在它们的背景中以使它们获得意义。为了获得含义，词语需要构成它们的背景的文本，而文本需要它们在其中被宣读的背景。因此，“爱情”一词在宗教的背景中和在世俗的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思，一封求爱信由引诱者或受引诱者宣读，其真实性的含义也大相径庭。

克劳德·巴斯蒂安(Claude Bastien)指出：“认识的进化并不是朝向建立愈益抽象的认识，而是正相反，朝向把它们放置到背景中。”[①]这个行为确定了知识被插入的条件和它们的有效性的界限。巴斯蒂安补充说：“背景化是(认识运作)发挥效能的一个基本条件。”

1.2　总体(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总体超过背景，它是包含不同部分的整体，这些部分以相互—反馈作用的或组织性的方式与它相连。因此，一个社会超过一个背景，它是我们构成其部分的有组织的整体。行星地球超过一个背景，它是一个我们构成其部分的既有组织又破坏组织的整体。整体具有一些性质或属性是各部分在彼此孤立的情况下所没有

---

① 克劳德·巴斯蒂安：《逻辑与认识之间的差距》，载于CNR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译者注)的“通讯”第79期《认识科学》，1992年10月。

的，而部分的某些性质或属性也可能被来自整体的约束所抑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①]曾说："应该重新构筑整体"。确实应该为了认识部分而重新构筑整体。

由此引出将应启发未来的教育的帕斯卡(Pascal)提出的原则所具有的认识功能："任何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受到作用又施加作用，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所有事物，包括相距最遥远的和最不相同的事物，都被一种自然的和难以觉察的联系维系着。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②]

此外，在人类如同在所有其他生物中一样，整体存在于各个部分的内部：每个细胞包含有一个多细胞机体的全部遗传信息；社会作为整体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内部，表现为他的语言、他的知识、他的责任、他的规范。因此，如同一个全息照相的每个个别的点包含它所代表的整体的全部信息，每个单独的细胞、每个单独的个人以全息的方式包含着它们构成其部分的整体，同时该整体也构成它们的部分。

1.3 多维度

复杂的统一体如同人类和社会都是多维度的：因此人类同时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感情的、理性的；社会包含着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方面。恰切的认识应该看到多维度性和把它获取的资讯都置入这个框架：人们不仅不能把部分孤立于整体，而且也不能使各个部分互相孤立。比如，经济方面是与人类的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持续的相互—反馈作用中的；此外经济在它本

---

① 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1872—1950。——译者注

② 帕斯卡：《思想录，由 Léon Brunschwicg 建立的文本》，Garnier-Flammarion 出版社，巴黎，1976 年。

身以全息的方式蕴含着人类的需要、欲望、热情，这些东西超出了惟一的经济利益。

1.4 复杂性

恰切的认识应该正视复杂性。complexus[①]意味着交织在一起的东西。确实，当不同的要素（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感情的、神话的）不可分离地构成一个整体时，当在认识对象与它的背景之间、各部分与整体之间、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反馈作用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复杂性，由于这个原因，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我们全球纪元特有的发展使我们愈益经常和愈益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性的挑战。

因此，教育应该促进适于参照复杂性、背景，以多维度的方式和在总体的视域中进行认识的“一般智能”(intelligence générale)。

2. 一般智能

人类精神如同 H. 西蒙(Simon)[②]所说是一个 G. P. S, 即“General Problems Setting and Solving”[③]。与一种流传的意见相反，精神的一般能力的发展使得可能更好地发展特殊的或专业的技能。一般的智能愈是强，处理特别的问题的能力就愈是大。因此，对于特殊的资讯的理解需要启动一般智能，后者实施和组织把知识的总体调动到每个特殊的案例中去。

---

① 拉丁文：复杂。——译者注

②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16 年生。——译者注

③ 英文：提出和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译者注

认识，在参照背景、总体、复杂性力图自我构筑时，应该调动认识者对世界所知的一切。如同弗朗索瓦·勒卡纳蒂(François Recanati)所说："对陈述的理解，远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纯粹的和简单的解码，它是一个不能模式化的解释过程，要调动一般智能和大量地运用关于世界的知识。"因此，在调动总体知识和启动一般智能之间有相关性。

教育应该促进精神提出和解决基本问题的自然的禀赋，而相应地刺激一般智能的充分运用。这个充分运用需要好奇心的自由发挥。好奇心是幼童和青少年的最普遍的和最活跃的特性，但是过分经常地被训导所窒息，而问题正是在于应该相反地刺激它或在它还在沉睡时把它唤醒。

在促进个人的一般智能的任务中，未来的教育应该同时利用现有的知识、克服由专业化知识的进步所引起的矛盾(参阅 2.1 节)和辨识虚假的合理性(参阅 3.3 节)。

2.1 矛盾

在 20 世纪的过程中，在学科的专业化的框架内，知识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正是由于这个专业化经常打碎背景、总体性、复杂性，这些进步是分散的、不相连接的。由于这个问题，甚至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内部，巨大的障碍被累积起来阻止恰当的知识的运行。

我们的教育系统实行了人文文化与科学的分离，以及把科学划分为各个学科，这些学科变成超级专业化的，各自封闭在本身之中。

因此，总体的和复杂的现实被粉碎，人类被肢解。人类的生物的方面(包括脑)被关闭在生物学系，他的心理的、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方面被遣送到人类科学的各个系中而彼此分离，它的主体

的、存在的、诗意的特点被安置在文学和诗歌系。本质上是对任何人类问题的反思的哲学，轮到它变成一个封闭于自身的领域。

根本的和总体的问题被从学科性的科学中撤出。它们只在哲学中被保留，但停止被科学的成果所滋养。

在这种条件下，由学科养成的精神失去了他们自然地把知识加以背景化以及把知识整合在它们的自然整体中的禀赋。对总体性的东西的察觉能力的削弱导致了责任感的削弱（每个人趋于只对他的专业化任务负责），以及团结精神的削弱（每个人不再感到他与他的同胞们的关联）。

3. 根本的问题

3.1　分割与封闭的专业化

事实上，超级专业化[①]阻止看到（被它分割为碎片的）总体的东西和（被它消解的）根本的东西。它甚至阻止正确地处理只能在其背景中被提出和思考的特殊的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从来不是片段的，而总体问题愈来愈带有根本性。当一般文化包含着对力图把任何信息或任何观念放置到背景中去的做法的激励的时候，学科性的科学的和技术的文化切割、分离和箱格化知识，使它们越来越难以被纳入背景中。

同时学科的剪裁也使得不可能把握"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亦即复杂性（依据此词原始的含义）。

专业化的知识是抽象（abstraction）的一种特殊形式。"抽象的"（abs-trait）专业化，就是说把一个对象从它的背景和它的总体

① 亦即把自己关闭在自身之中的专业化，它不允许把自身整合到关于对象的总的研究领域或整体观念中，它只是看到该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

中提取出来，舍弃它与它的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交流，把它插入一个抽象概念化的区域亦即被箱格化的学科的区域；后者的边界线任意地打碎了现象的系统性（一个部分对于整体的关系）和多维度性。它还导致一种数学的抽象，后者实现自身与具体事物的分离，推崇一切可计算的和可形式化的特性。

因此比如说经济学，是在数学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但是又是从社会的和人类的角度来说最落后的科学，因为它在抽象中除去了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生态的条件。因此它的专家越来越不能够解释货币和股市的动荡的原因和后果，预测和预言甚至是短期的经济趋势。这一来，经济的错误变成了经济科学的第一个后果。

3.2 还原和分离

直到20世纪过了一半，大部分的科学服从还原的原则。这个原则把对一个整体的认识引导到对其部分的认识，仿佛一个整体的组织并不产生相对于被孤立看待的部分的崭新的性质或属性。

还原的原则自然导致把复杂的东西化归为简单的东西。因此，它把人造机器的机械的和决定论的逻辑应用于生物的和人类的复杂事物中。它还可能蒙蔽人而导致清除所有不能量化和不能测量的东西，因此从人身上消除人性，亦即情感、爱情、痛苦和幸福。同样地，在严格地遵守决定论的公设的时候，还原的原则遮蔽了随机性、新事物、创造性。

由于我们的教育教给我们分离、箱格化、隔绝知识而不是连接它们，知识的总体形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七巧板。相互作用、反馈作用、背景、复杂性处于学科之间的 no man's land[1]中变得不可

[1] 英文：无人地带。——译者注

见。人类的重大问题为了特殊的技术问题的利益而消失。对于组织分散的和被箱格化的知识的无能导致进行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自然的思想禀性的衰退。

被划分为小块的、箱格化的、机械论的、进行分解的、还原的智能，把世界的复杂事物破碎为分离的片段，分割问题，分离连在一起的事物，单方面化多方面的事物。这是一种近视的智能，而最经常地以盲目告终。它把理解和反思的可能性摧毁在萌芽状态，减少取得可矫正的判断和长期的观点的可能性。因此，问题愈是变成多方面的，愈是存在思考它们的多方面性的无能；危机愈是进展，思考危机的无能也愈是进展；问题愈是变成全球性的，它们就愈是变得不可思考。由于没有能力考虑背景和全球的复杂性，盲目的智能造成失却判断力和不负责任。

3.3　虚假的合理性

丹·西蒙斯(Dan Simmons)在他的科学幻想的四部曲长篇小说(《许珀里翁(Hypérion)》及其续集)中，想像有一个由于技术事物的被解放而产生的和受I.A.(人工智能)统治的技术中心，它力图控制人类本身。而人类的问题是希望享受技术事物带来的好处但又不从属于它。

但是我们现在正行进在将从属于I.A.的路上，后者在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形式下被深深地建立在我们的精神之中。技术统治的思想对于所有与人造机器有关的事务是恰当的，但它不能理解生物和人类，而当它应用于它们时还自以为是惟一合理的。

事实上，虚假的合理性，亦即抽象的和单向度的合理化在地球

上占了上风。[①]在到处和在数十年间，由自信是为理性和进步而工作的专家们所带来的、在民众的习惯中和敬畏中只遭到迷信的所谓合理的解决办法，在致富中又导致贫困，在创造中又进行破坏。在我们行星上各处，在很多很多公顷的土地上开垦荒地和拔除林木造成了水的失去平衡和土地的沙漠化。如果不加控制，盲目的伐光树木将把比如说尼罗河这个热带的水的源泉变为一年三季的干涸河，而且还将使亚马逊河干涸。用大面积的单种作物连作取代小面积的多种作物混作，这加重了缺粮问题，造成农村人口外流和城市的贫民窟化。如同弗朗索瓦·卡尔克琴斯基(François Garczynski)所说，"这种农业造成双重意义的荒漠：土壤被侵蚀和农村人口外逃。"不考虑人们对不可量化的和不可鉴定的东西的需要的伪功效性概念，使愈来愈多的郊区和城市迅速变成充满厌倦、垃圾、堕落、麻木、庸俗和犯罪的隔离群居地。这个技术官僚主义的合理性的最宏伟的"杰作"是由苏联完成的——举例说，那里人们甚至在最炎热的季节里改变河道，为的是灌溉无数公顷的无林木的棉田，而这导致由于地下盐分的上升而引起的土壤的盐碱化、地下水蒸发和咸海的干涸。虚假合理性的恶果曾经在苏联比在西方更严重，这是因为在苏联技术官僚体制不会遭到公民们的反应的

---

① 发生这样的事：有益的企图遵循虚假的合理化行事，它最后产生的有害的效果会抵消甚至超过它产生的有益的效果。比如，为了解决第三世界的吃饭问题而发动的"绿色革命"曾极大地增加了粮食资源，使得可能显著地避免了缺粮问题；但是后来人们必须修正在开始时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被任意地最大限度化了的观念，该想法选择在十分广大的面积上大规模种植惟一的植物基因组(génome)，即在数量上最高产的那一种。以后人们发现缺乏遗传类型上的多样性使得该基因组不能抵抗的病原菌在一个季度里消灭了所有的收成。于是，人们被引导重建遗传类型的一定的多样性，以达到生产率的最佳化而不是最大化。此外，大量施用肥料恶化土壤；不考虑土质的灌溉引起土质的被侵蚀；农药的积累摧毁了物种之间的调节机制，在杀害害虫的同时也杀害了益虫，有时甚至引起对农药获得免疫性的害虫无节制地繁殖；最后农药中包含的有毒物质进入食物，恶化消费者的健康。

制约。不幸的是，在该帝国倒塌之后，新建国家的领导求助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专家，而这些专家们故意无视竞争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制度、法律和规则这一事实。他们没有能力制订如同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①]——虽然他也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不可缺少的复杂的策略，这涉及有计划地实施非计划化的演变和为非程序化的过程制定程序，结果造成了新的灾难。

这些做法造成了人为的灾难，但其受害者和后果却没有像对待自然灾害的受害者那样加以清查和统计。

因此，20世纪在伪合理性的统治下度过，它自称是惟一的合理性，但是却使理解、反思和长远目光萎缩。它对于处理最严重的问题的不胜任，构成了对于人类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从而出现了如下的悖论：20世纪在科学认识的所有领域里以及在技术的所有领域里产生了宏伟无比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对于总体的、根本的和复杂的问题的新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从科学家、技术师和专业人员开始曾经引发了无数的错误和幻觉。

何以如此？因为恰切的认识的主要原则没有被认识。知识的片段化和箱格化使得不可能把握“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

新的世纪难道不应该摆脱被肢解的和起肢解作用的合理性的控制，以使人类能够终于控制它？

事关用一种既进行区分又进行连接的思想来理解只是进行分离和还原的思想。它无关于为了对整体的认识而抛弃对部分的认识，也不是为了综合而抛弃分析，应该把两方结合起来。存在着我们全球纪元的发展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的复杂性的挑战。

---

① 法国经济学家，生于1911年，研究市场经济和有效利用资源。——译者注

第三章　教授人类地位

未来的教育将应首先是关于人类地位的普遍的教育。我们处于全球纪元,共同的探险驱动着无论处于何处的人类。后者应该承认他们共同的人类性,同时又承认所有为人者固有的文化的多样性。

认识人类,这首先是把他放置到宇宙里,而不是把他从那里拔离。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第一章),任何认识应该把它的对象背景化而成为恰切的。“我们是谁?”与“我们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是不可分割的。

探询我们人类的地位,这首先是探询我们在世界的处境。在20世纪末,有交汇的大量知识使得可能以全新的方式说明人类存在于宇宙中的处境。在60—70年代相伴发生的宇宙学、地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史前学的进步改变了关于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本身的观念。但是这些成果还是分离的。人类仍然被肢解、分割成拼图板中的板块,失去了他本来的面目。在此存在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分离的思想不可能认识人类的复杂的统一体。它把人类在包围着他的宇宙之外,在我们由以构成的物理物质和精神之外,作为一个孤岛来认识;另外还有一种还原性的思想,把人类统一体还原为纯粹的生物—解剖学的基质。人类诸科学也被切分为小块和箱格化。因此人类复杂性变得不可见,而人“如同沙滩上的痕迹”消失了。因此,关于人的新的知识,由于缺乏连接,既未被吸收也未被整合。自相矛盾地,对于整体的无知趋于严重,而对于部分的知识不断进展。

从而对于未来的教育产生了如下的必要性：实行对来自自然诸科学的知识的大合并以便在世界中给人类的地位定位；实行对来自人类诸科学的知识的大合并以便阐明人类的多维度性和复杂性；必须在其中整合人文文化的极其珍贵的成果，不仅是哲学的和历史学的，而且还有文学的、诗歌的、艺术的……

1. 人类的根基←→脱离根基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物理宇宙和生物范围内的双重根基，同时还有人类特有的脱离根基：我们既在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外。

1.1　宇宙条件

我们最近抛弃了关于一个有序的、完美的、永恒的宇宙的概念，而承认一个产生于辐射之中并变得弥散的宇宙，在其中有序、无序和组织以互补的、竞争的和对抗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我们处于一个在膨胀中的宏大无比的宇宙中，它由数十亿个星系和数十亿又数十亿个星体构成。我们已知道，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一个在宇宙的郊区的小星系的周边游荡的天体旋转的细小的陀螺。我们机体中的基本粒子大概在我们的宇宙产生的最初几秒钟就出现了，而我们的宇宙的存在迄今(可能?)已有 150 亿年。我们身上的碳原子是在早于我们的太阳的一个或几个太阳中形成的；我们身上的分子是在地球激变的最初时刻聚集起来的；那些巨分子是在旋涡中结合起来的，其中有一个在它的分子组合的多样性上变得愈益丰富，终于变形为一种相对于严格的化学的组织而言的新型的组织——生物的自组织。

不断地遭到瓦解和耗散的力量的威胁的这个宇宙的组织的伟绩也是连接的伟绩，它惟一地阻止了宇宙在一诞生之后就立即弥散和消失。在这个宇宙的探险的内部，在生物的自组织的一个独

特的分支的非凡的发展的顶端，我们以我们的方式继续着探险。

1.2 物理的条件

一些物理的质料以热力学的方式在地球上组织起来，通过海洋的浸泡、化学的酝酿、放电的作用，它产生了生命。生命是由太阳派生的：它的所有成分是在太阳中被锻造出来的，又集结在由太阳的喷吐而形成的行星上；它是从太阳烈焰万丈的旋涡中发出的光子的漫射的转化物。我们，生物，只是宇宙散居地上的一点草芥、太阳系中的一些碎屑、地球存在中的一棵细小的萌芽。

1.3 地球条件

我们是宇宙的命运的构成部分，但是我们在其中处于边缘地位：我们的地球是被从宇宙的中心位置上罢黜下来的太阳的第三个卫星，这个太阳变成了处于膨胀的宇宙中的一个外围星系的数十亿个星体里的一个漂泊的侏儒小天体……

我们的行星大概在 50 亿年前就由以前的一个太阳的爆炸产生的宇宙碎屑聚合而成；大约 40 亿年前，生命组织从由雷雨和地球动荡造成的巨分子的旋涡中涌现。

地球在对太阳的依赖中自我产生和自我组织。从生物圈形成的时候起它就构成一个生物—物理的复合体。

我们同时是宇宙的和地球的存在。

生命产生于大地激变，它的历险至少有两次面临灭绝的危险（在古生代结尾和中生代的过程中）。它不仅发展为不同的物种而且发展为生态系统，在其中捕猎和吞食构成具有两重面目——生命和死亡——的营养链。

我们的行星在宇宙中流浪。我们应该从我们所处的这种周边的、外缘的形势得出结论。

作为这个行星的生物，我们生死攸关地依赖着地球的生物圈。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十分物理的又十分生物的地球本征。

1.4 人类的地位

原人进化的重要性对于教授人类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向我们表明动物性和人性怎样共同构成我们的人类地位。

史前人类学向我们表明原人进化是怎样一个绵延数百万年的历程，既是断续的——新的种类突然出现：habilis(能人)、erectus(直立人)、neanderthal (尼安德特人)、sapiens(智人)，以前的种类随之消失，突然产生了语言和文化——又是连续的——因为两足行走、用手操作、身体直立、大脑发达[①]、青春化(成年人保留着胚胎的非专门化特点和青年人的心理学特点)和社会复杂化的过程相继而行。在这个过程中在出现人类固有的语言的同时形成了文化，亦即可以代代相传的知识、本领、信仰、神话的后天获得的库藏……

原人进化导致了一个新的开始：人的进一步人类化。此后人的概念就有了两个入口：一个生物物理学的入口，一个心理—社会—文化的入口，两个入口互相凭借。

我们出自宇宙、自然、生命，但是由于我们的人类性本身，又出自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因此我们变得异在于这个与我们仍然隐藏地具有紧密联系的宇宙。使我们认识这个物理世界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又因此使我们远离它。理性地与科学地考察宇宙这一事实本身使我们与它分开。我们发展得超越了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而正是在这个超越中实现着人类性的充分发展。

以一个全息点的方式，我们在我们的个别性的内部蕴含着不

---

① 南方古猿脑容量为 508cm^3，能人为 680 cm^3，直立人为 800～1100 cm^3，现代人为 1200～1500 cm^3。

仅是整个人类性、整个生命,而且还有几乎整个宇宙,包括后者的可能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神秘。但是我们不是人们可以惟一地从宇宙学、从物理学、从生物学、从心理学……出发加以认识和了解的存在。

2. 人类之为人类

2.1 一中之二

人类是一个既充分的生物的又充分的文化的存在,他本身包含这种原始的合二为一性。这是一个高级的和超级的生物,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了生命的潜能。他以过度发展的方式表现了个人的自我中心的和利他主义的品质,在痴迷和沉醉中达到生命的情绪的顶点,被求欢和纵欲的热情烧得沸腾,因此在其超强的生命力中“智人”又是“狂徒”。

人因此是一个充分得生物学的存在,但是如果他不充分地拥有文化,他将是一个最低级的灵长类动物。是文化在他身上积累起那些被保存、传授、学习的东西,它们包含着后天获得的规范和原则。

2.2 大脑←→精神←→文化的圆环

人类只是通过文化和在文化中实现为充分的人性的存在。没有无人类大脑(赋有行动、知觉、理解、学习的能力的生物器官)的文化,但也没有无文化的精神(mind, mente)[1]、亦即意识和思想的能力。人类精神是在大脑—文化的关系中产生和强化的一种涌现

---

① 这两词分别为英文和德文的“精神”。——译者注

(émergence)。精神一旦涌现出来,它就干预大脑的运作和反馈作用于它。因此一个三元联立的圆环存在于大脑⟷精神⟷文化之间,其中每一项对于另外任一项都是必要的。精神是文化引起的大脑的涌现,而文化没有大脑也将不能存在。

2.3 理性⟷感情⟷冲动的圆环

同时,我们还可以在大脑⟷精神⟷文化的三项式之外找到另一个生物—人类学的三项式,它出自麦克·莱恩(Mac Lean)的三合一的脑的概念①。人脑在它的内部整合了:a)古脑——爬行动物的脑的继承者,进攻性、发情与原始冲动的源泉;b)中脑——古昔的哺乳动物的脑的继承者,其中脑内的海马状突起看来把情感性的发展与长时期的记忆的发展联系起来;c)皮层——在哺乳动物那里已很发达,以致包裹了整个脑结构和形成了两个脑半球;在人类那里又过度发展为新皮层,是使文化得以充分实现的分析的、逻辑的、策略的中枢。从而,人类复杂性的另一个面目向我们展现出来,它在人类性中整合了动物性(哺乳动物的和爬行动物的),在动物性中整合了人类性。② 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互补的,而且也是对抗的,包含了在冲动、情感和理性之间的熟知的冲突。相应地,三合一的关系不遵从理性→情感→冲动的等级制。存在的是这三项之间的不稳定的、可对调位置的、转动的关系。理性因此不拥有最高权力。它只是不可分离的三联整体中与其他两项竞争和对抗的一项,它是脆弱的——它可能被情感或冲动所控制、完全占有甚至奴役。杀人的冲动可以利用最美妙的逻辑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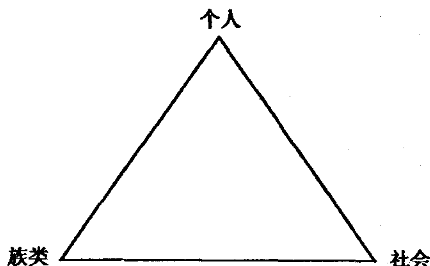
① 麦克·莱恩博士:《三合一的脑》,载于史密斯(F.Q.Smith)主编的《神经科学:第二个研究项目》,洛克菲勒大学出版社,纽约,1970年。

② 如同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这导致我们紧密地把智能与情感性连接起来。这一点也在下述著作中被清楚指出:A.达马西奥(Damasio):《笛卡儿的错误》,O.Jacob出版社,巴黎和J.M.樊尚(Vincent):《情感生物学》,O.Jacob出版社,巴黎。

和技术理性来组织其行动和证明其正当性。

2.4 个人←→社会←→族类的圆环

最后，还存在个人←→社会←→族类的三元联立的关系。个人是人类族类的繁衍过程的产物，但这个过程本身又必须为两个个人所产生。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而展现了文化的涌现的社会，又通过文化反馈作用于个人。



我们不能把个人绝对化，使他成为这个圆环的最高目的；我们也不能对族类或社会这样做。在人类学的层面上，社会为个人而生存，而个人为社会而生存；社会与个人为族类而生存，而族类又为个人与社会而生存。这三项中的每一项都同时是手段和目的：是文化和社会使得个人可能长成，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文化可能永续和社会可能自我组织。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个体—主体的自由表现的充分发展构成了我们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但是不须因此认为他构成个人←→社会←→族类的三项式的目的本身。人类的复杂性在分离这些构成它的要素的情况下是不能被理解的：任何真正人类的发展意味着个人的自主性、对共同体的参与和对人类的归属感这三者的联合的发展。

3. Unitas multiplex[①]：人类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未来的教育应该注意人类的统一性的概念并不消除人类的多样性的概念，而人类的多样性的概念也并不消除人类的统一性的概念。存在着人类的统一性，也存在着人类的多样性。统一性不仅仅存在于智人的族类的生物学特点之中，多样性也不仅仅存在于人类存在的心理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特点之中。在人类的统一性的内部也存在着生物学特有的多样性，而不仅有大脑的，而且也有精神的、心理的、感情的、理智的统一性。此外，最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也具有共同的形成的或组织的原则。正是在人类的统一性本身中蕴含着它的各种各样的多样性的原则。理解人类，这就是理解它在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它在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应该认识多中之一、一中之多。

教育将应在所有领域里说明这个统一性/多样性的原则。

3.1　个人的领域

在个人的领域，存在着遗传的统一性/多样性。任何人都在他身上通过遗传蕴含着人的族类，同时又通过遗传包含着他自己的独特性，既是解剖学上的又是生理学上的。还有大脑的、精神的、心理的、感情的、理智的、主观的统一性/多样性：任何人类存在在他身上都携带着在大脑方面、精神方面、心理方面、感情方面、理智方面、主观方面的基本的共同点，同时又具有他特有的大脑的、精神的、心理的、感情的、理智的、主观的……独特性。

① 拉丁文：多样性的统一。——译者注

3.2　社会领域

在社会的领域里，存在着语言的(所有不同的语言都从一个共同的两重分节的结构出发，这使得我们在语言[Langage]上是孪生子而在言语[Langue]上被分开)、社会组织的和文化的统一性/多样性。

3.3　文化的多样性与个人的多重性

人们说一般的文化[①]是正确的，人们说许多的文化[②]也是正确的。

文化由知识、本领、规则、规范、禁忌、策略、信仰、观念、价值、神话的整体构成，它代代相传，在每个人身上再生，控制着社会的存在和维系着心理的和社会的复杂性。没有无文化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古老的还是近代的)，但是每个文化是独特的。因此总是存在着处于许多文化中的一般文化，而且一般的文化只是通过许多的文化而存在。

技术可以从一个文化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之中，如同车轮、挽具、指南针、印刷术的情况。同样某些宗教信仰也是如此，以后还有非宗教的观念，它们产生于一个个别的文化之中，但是都能被普及。但是在每个文化中有一个由信仰、观念、价值、神话和特别是那些把一个特殊的共同体连接于它的祖宗、传统、逝者的东西构成的特定的核心。

那些看到文化的多样性的人趋于缩小或遮蔽人类的统一性，那些看到人类的统一性的人趋于把文化的多样性看成次要现象。适当的做法是相反地设想保护和促进多样性的统一性和存在于统

① La Culture，这是法语“文化”一词的单数形式。——译者注

② Les cultures，这是法语“文化”一词的复数形式。——译者注

一性中的多样性。

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双重现象是决定性的。一般的文化在它所有的特殊的东西中保持人类的本征，复多的文化在它们所有的特殊的东西中保持各个社会的本征。文化表面上看起来是关闭于自身以保护它的特殊的本征的，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开放的：它不仅把知识和技术融合到自身，而且还融合来自他处的观念、习俗、食品和个人。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吸取是起丰富作用的。在文化的杂交中也有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比如产生了安达卢西亚民间音乐(flamenco)、许多拉丁美洲音乐、"拉伊"(raï)[①]。相反，一种文化在技术文明统治的破坏作用下瓦解是对于整个人类的一种损失，因为人类的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它最珍贵的宝藏之一。

人类存在本身是既一又多的。我们已经说过，任何人类个人都如同一个全息点，在他身上蕴含着宇宙。我们还应该看到，任何个人，即使是最闭锁在他的最平庸的生活中的，在他本身也构成一个宇宙。他在他身上蕴含着他的内在的多重性，他的潜在的几重人格，许许多多幻想的人物，处于现实和想像、睡眠和清醒、服从和反抗、公开和隐秘之间的多重存在，在其难以探测的洞穴和深渊中幼虫般蠕动的各种念头。每个人在他身上含有梦想和幻觉的星系，欲望和爱情的未曾满足的冲动，不幸的深渊，灰心的无边的荒漠，有如燃烧天体的热情之火，仇恨的怒涛，低能的迷惘，清醒意识的闪电，狂乱的风暴……

3.4 智人←→狂徒

21世纪将应抛弃用理性(homo sapiens——"智人")、技术(ho-

① 阿拉伯音乐，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改变节奏，加强旋律，使用传统主题，但采用现代西方配器法，歌唱日常生活。——译者注

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实用的活动(homo economicus——“从事经济的人”)、注定的必然性(homo prosaicus——“散文般单调的人”)来确定人类存在的片面的观点。人类存在是复杂的,在他身上以两极分化的形式含有对立的特质:

sapiens 和 demens(理性的和热狂的)
faber 和 ludens(勤劳的和贪玩的)
empiricus 和 imaginarius(经验的和想像的)
economicus 和 consumans(节俭的和挥霍的)
prosaicus 和 poeticus(散文般单调的和诗意般充满想像的)

理性的人同时是充满神话和妄想的感情的人(demens);工作的人同时是游玩的人(ludens);注重经验的人同时是喜好想像的人(imaginarius);经济的人同时是“消费”的人(consumans);散文般的人同时是诗歌似的人,也就是说充满了热忱、同情、爱情、痴迷的人。爱情是诗歌。初起的爱情充溢着诗歌的世界,持续的爱情浇灌着日常生活的诗篇,爱情的终结把我们又抛入散文之中。

因此,人类存在并不是只靠理性和技术生活的。他也投身于、专心于、尽力于舞蹈、通灵、神话、巫术、礼仪,他相信贡献牺牲的效能,他在生活中经常在为他超越死亡的另一种生活作准备。在各处,技术的、实践的、理智的活动体现了经验—理性的智能;同时在各处,节庆、盛典、祭祀及其狂想、激奋、挥霍、“消费”又显示了贪玩的、诗意的、消耗的、想像的、热狂的人。游戏的、欢庆的、礼仪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为着重新投入实际的生活或工作而进行的放松活动,对神祇和观念的信仰也不能被化归为幻觉或迷信,它们具有潜藏在人类学的深处的根基,它们关系到人类存在的本性本身。在心理、情感、巫术、神话、宗教之间有明显的或隐秘的关系。在制造工具的人、游戏的人、智人和狂徒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二元性。并

且,在人类存在那里,理性的—经验的—技术的认识的发展从来都没有取消象征的、神话的、巫术的或诗歌的认识。

3.5　Homo complexus(复杂的人)

我们是幼稚的、神经症的、狂热的存在,同时也是理性的。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人类特有的品质。

人类存在是理性的和无理性的、既能节制又会过激的存在;受制于强烈的和不稳定的情感,他微笑、欢笑、哭泣,但也知道进行客观的认识;这是一个认真的和精于算计的存在,但也是忧虑的、恐慌的、享乐的、陶醉的、痴迷的存在。这是一个暴烈的和温存的、爱情的和仇恨的存在。这是一个被想像的事物所充满、但是又能够认清现实的存在。他知道死亡,但又不能相信它;他产生神话和巫术,但也产生科学和哲学。他被神祇和观念所占有,但是又怀疑神祇和批评观念。他既用被验证的知识、又用幻觉和奇想滋养自己。在理性的、文化的、物质的控制中断的情况下,当发生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的和想像的事物之间的混淆的时候,当出现幻觉的霸权和失控的过激性的时候,“狂徒”会支配“智人”,使理性的智能从属于为他的魔怪服务。

因此疯狂性是人类的一个中心问题,并不仅是他的残渣或他的病症。人类的疯狂性的主题在古代哲学、东方智慧、各个大陆的诗歌中以及对于伦理学家们、埃拉斯穆斯(Erasme)、蒙田(Montaigne)、帕斯卡、卢梭是很显然的。但是不仅在人道主义的给予人以支配宇宙的命运的令人欣快的意识形态里,而且在人类科学和哲学中,这个主题都被化为乌有了。

发狂没有把人类引向灭亡(只有被科学理性解放出来的核能量和以牺牲生物圈为代价实现的技术的合理性的发展可能使人类导致消亡)。但是,有如此之多的时间被丢失、浪费在礼仪、祭祀、

沉醉、装潢、舞蹈和无数的幻觉等等之中。尽管有这一切，先是技术后是科学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展起来，文明产生了哲学和科学，人类统治了地球。

这说明复杂性的进步是同时地“不顾”、“伴随”和“由于”人类的疯狂性而实现的。

智人←→狂徒的两重性逻辑在是破坏性的同时又是创造性的。思想、科学、艺术曾经被情感的深刻力量，被梦想、焦虑、欲望、畏惧、期望所浇灌。在人类的创造之中总是存在着两个引领者：智人←→狂徒。“狂徒”抑制了但也推动了“智人”的发展。柏拉图早已注意到 Diké 即明智的法规是 Ubris 即放纵无度的女儿。

那种盲目的狂热情绪粉碎了奴役的神殿的殿柱，比如占领巴士底狱；相反，那种对理性的崇拜滋生了法国革命的断头台。

天才的可能性来自人类并不完全受制于现实、逻辑(新皮层)、遗传密码、文化、社会。研究、发现是在不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的开口之中进展的。天才突然出现于不可控制的事物的缺口中，正好是疯狂性游荡的地方。创造在心理—感情的黝暗的深渊和意识的耀眼的火焰的连接处迸射出来。

因此，教育将应表明和说明具有多重面目的人类的命运：族类的命运、个人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历史的命运，所有命运相互纠结，不可分离。因此，未来的教育的基本使命之一是审视和研究人类的复杂性。它导向认识到从而意识到所有人类的共同的地位，个人的、民族的、文化的十分丰富和必要的多样性，以及我们作为“地球的公民”的根基……

第四章　教授地球本征(identité)[①]

只有贤哲之人不断地把整体放在脑中，从不忘记世界，基于宇宙而思考和行动。

格罗蒂桑(Groethuysen)

第一次，一个人真正地理解了他是这个行星上的一个居民，可能他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不仅从个人的、家庭的、种族的、国家的或国家集团的角度，而且从整个行星的角度。

韦尔纳德斯基(Vernadski)

新千年的公民将能怎样思考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时代的问题？他们应该同时理解在世界中的"人类地位"和人类世界的状况，后者在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已变成了"全球纪元"的状况。

我们自 16 世纪起进入了全球纪元，而自 20 世纪末起进入了

---

① 法文词 identité 在英文中的同义词是 identity。除了其基本含义是"同一性"外，该词还具有下述含义：本性、特性、根本特征、面目、正身、身份、资格、国籍等等。此词在本书中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多次出现，但很难用现有的中文词汇翻译，因为它兼有"本性"、"根本特征"和"身份"、"资格"之义。比如这里所说人的地球的 identité，是说人生长在地球上因此赋有一种被地球给予的本性、根本特征，但这同时又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身份、资格，使他可以取得地球公民籍。下文还谈到法国的、欧洲的、国家的、省份的 identité，都具有类似意思。译者为此不得不借用物理学中已有的一个词汇"本征"，在这社会科学领域内作为一个新词来使用，使它兼有物理学中已经使用的"特征"、"固有性"之义和法律学中的"身份"、"资格"之义。——译者注

世界化(mondialisation)的阶段。

世界化作为全球纪元的现有阶段首先意味着——如同地理学家雅克·莱维(Jacques Lévy)很好地说出的:"如此的世界作为一个新的对象涌现"。但是,愈是我们被世界所把握,我们就愈是难以把握世界。在远距离通讯、信息化、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完全被世界的复杂性所占据,无数的关于世界的信息淹没了我们理解的可能性。

从而产生了找出一个典型的根本问题的希望,所有其他的根本问题都从属于它。但是这个根本问题由根本问题的总体构成,也就是说是许多问题、对抗、危机、不可控制的过程的复杂的相互关联。全球的问题是一个整体,它被各式各样的、彼此冲突的、危急的成分所滋养,而它又囊括它们、超越它们和反过来滋养它们。

加重了认识我们的世界的困难的东西是现有的思想方式,它不是在我们身上发展背景化和总体化的潜能,而是使之萎缩;而全球纪元的要求是思考它的总体性,即整体←→部分的关系,它的多方面性,它的复杂性。这使我们求助于思想改革,如同在第二章中所要求的,它是认识背景、总体、多维度的东西、复杂的东西所必要的。

是复杂性(部分对于整体和整体对于部分的相互作用的创造的/破坏的圆环)造成了问题。而我们必须认识世界的非同寻常的复杂性,我是在如下意义上这样说的:应该同时考虑各种全球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考虑它们的互补性与对抗性。全球不是一个总体的系统,而是一个运动中的旋涡,没有组织中心。

它要求一个能够把捉普遍性的多中心的思想,这个世界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意识到人类地位的统一性/多样性的。这个多中心的思想滋养着世界的各种文化。教育这种思想,这就是未来的教育的目标。它应该在全球纪元为着地球的本征和意识而努力工作。

1. 全球纪元

当代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大约处于使宇宙产生的一个难以言说的灾变之后150亿年，原人进化的探险历程开始之后大约500万年(这个历程导致我们区别于其他类人猿)，"智人"涌现之后10万年，历史的文明诞生之后1万年，而现在我们进入所谓的耶稣纪元的第三个千年的开始。

人类的历史通过在全球所有大陆上的散居开始，然后从近代起进入在人类的散居地之间进行交往的全球纪元。

人类的散居没有产生遗传性上的分裂：俾格米人(pygmée)[①]、黑种人、黄种人、印度人、白种人属于同一个族类，拥有人类性的同样的基本特点；但是它产生了语言、文化、命运的异常的多样性，而这构成在一切领域内的革新和创造的源泉。人类的财富存在于他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之中，而他的创造性的源泉存在于他的繁衍的统一性之中。

在欧洲15世纪末，明朝的中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印度是全球最重要的文明；而在亚洲和非洲的伊斯兰教是在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宗教；奥斯曼帝国从亚洲蜂拥进入东欧，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和威胁维也纳，成为欧洲的一大强国。印加人的帝国和阿兹特克人[②]统治着美洲，库斯科(Cuzco)[③]和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城[④]当时在人口、文物和壮观方面都超过了马德里、里斯本、巴黎、伦敦这

① 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诸岛屿。——译者注

②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译者注

③ 秘鲁南部城市，11世纪初起至16世纪为印加帝国首都。——译者注

④ 中世纪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活动中心，建于1325年，今为墨西哥城。——译者注

些西欧年轻小国的首都。

但是从 1492 年起，正是这些年轻小国投入了征服全球的活动，通过冒险、战争、死亡揭开了全球纪元，此后在五大洲之间建立了既有最好的效用又有最坏的结果的联系。西欧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统治引起了文明的灾难，特别是在美洲，引起了无法补救的对文化的摧毁、可怕的奴役。因此，全球纪元是在和通过对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摧残、奴役和残酷的剥削而开启和发展的。欧亚大陆的杆菌和病毒涌向美洲，在那里造成了由于麻疹、疱疹、流行性感冒、结核病的传布而引起的大屠杀；而从美洲梅毒螺旋体菌又从一个性器官扑向另一个性器官，一直到达上海。欧洲人在他们的家乡种植了来自美洲的玉米、土豆、菜豆、番茄、木薯、甘薯、可可、烟草，而他们把绵羊、牛、马、谷类、葡萄、橄榄和热带植物、稻米、薯蓣、咖啡、甘蔗带进美洲。

全球化是通过向各大陆带去欧洲的文明、它的武器、它的技术、它的观念而发展的，把这些东西带到所有它的国外分行、前哨阵地、渗透区。工业和技术发生了在任何文明中还没有见到过的飞跃发展。经济的起飞、交往的发展、把被征服的大陆纳入世界市场，这些决定了人口的巨大流动，普遍的人口增长率的提高① 也将扩大这个流动。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2,100 万欧洲人越过大西洋来到南、北美洲。移民的浪潮也发生于亚洲，在那里中国人为着经商到暹罗②、爪哇岛和马来亚半岛定居，也乘船前往加利福尼亚、不列颠哥伦比亚③、新南威尔士④、波利尼西亚⑤，而印度人前往

① 在一个世纪中，欧洲的居民从 1.9 亿增长到 4.23 亿，而全球的人口从 9 亿增长到 16 亿。

② 泰国的旧称。——译者注

③ 在加拿大西海岸。——译者注

④ 在澳大利亚。——译者注

⑤ 中太平洋的岛屿。——译者注

纳塔尔[1]和东非定居。

全球化在20世纪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和在1989年之后被称为世界化(mondialisation)的自由经济的普遍化。世界经济愈来愈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它的每一个部分变得依赖于整体，反过来，整体也遭受发生于部分的扰动和随机事变的影响。地球变小了。曾经需要麦哲伦花三年时间(1519—1522)航海绕行世界。到19世纪一个利用公路、铁路和汽船环绕地球一圈的大胆旅行还需花费80天。而在20世纪末，喷气式飞机在24小时完成环球旅行。但是特别是通过电视、电话、传真、互联网……在地球一点上的一切都可以即时地在另一点上显现。

世界愈来愈变成一个整体。世界的每个部分愈来愈构成世界的部分，而世界作为整体，也愈来愈出现于它的每个部分之中。这一点不仅在国家和民族身上，而且也在个人身上得到证实。如同每个全息点包含它构成其一部分的整体的信息，今后每个个人也在他身上接受和消费来自整个世界的信息和物资。

因此，比如说一个欧洲人每天早上醒来时打开他的日本造的收音机收听关于世界的事变的消息，当他饮用着锡兰、印度或中国的茶叶或者是埃塞俄比亚的木哈咖啡或拉丁美洲种植的阿拉伯咖啡时，关于火山爆发、地震、政变、国际会议等等的报导冲他而来。他穿上他的用埃及或印度的棉花做的针织衫、三角裤和衬衫，再套上先后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和法国的鲁贝—土尔昆[2]经过加工的澳大利亚羊毛制的上装和长裤，或者是一件来自中国的皮夹克衫加上一件美国式样的牛仔裤。他的手表是瑞士造或日本造的。他的眼镜架是用厄瓜多尔的玳瑁壳制的。他可以在他冬季的餐桌上吃到阿根廷的或智利的草莓和樱桃，塞内加尔的新鲜绿菜豆，非洲的

① 南非的省名。——译者注

② 法国北部集合城市，羊毛纺织中心。——译者注

鳄梨或菠萝，瓜特罗普岛上的甜瓜。他的橱里放有马提尼克(Martinique)的朗姆酒、俄国的伏特加、墨西哥的龙舌兰白酒、美国的威士忌。他可以在家里聆听由一位朝鲜人指挥的德国交响乐，或者在录像机屏幕前观看歌剧《波希米亚人》(Bohème)[①]，在其中黑人女歌唱家巴巴拉·亨德里克(Barbara Hendricks)扮演咪咪，西班牙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扮演卢道夫。

当欧洲人处于舒适的全球流通环路中时，很大数量的非洲人、亚洲人和南美洲人却处于贫困化的全球流通环路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到世界市场引起的他们国家生产的可可、咖啡、糖、原料的价格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被发自西方的世界化过程、主要是单一工业文明的进展赶出了他们的村庄，从自给自足的农民变成了寻求一份工资的郊区贫民，他们的需要今后用货币来表现。他们向往着广告和西方电影使他们对之产生梦想的舒适生活。他们使用着铝制的或塑料的碗碟，饮着啤酒或可口可乐。他们睡在回收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薄片上，穿着按美国式样印制的T恤衫。他们随着混和的音乐跳舞，他们的传统的旋律用来自美国的配器法来演奏。总而言之，无论是好是坏，每个人无论是富的还是穷的、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在他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在他身上蕴含着全球。世界化同时是明显的、无意识的和无所不在的。

世界化肯定是起统一作用的，但必须马上补充说它在其本质上也是引起冲突的。世界化的统一作用愈益伴随着它自身的负面的东西，这是通过它的负效应——巴尔干化(balkanisation)而引起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但是它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分裂。全球化的纪元本身又自相矛盾地引起和促进了国家—民族的普遍的分立。确实，民族解放的要求被追根溯源以认同祖宗的本征的

① 这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作品。——译者注

运动所刺激,这个运动作为引起文明的均一化的全球化潮流的反动而发生。由于未来的普遍化的危机这种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

民族之间的、宗教之间的、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各种对立相互滋长,大国的和追逐利润的跨国公司的对立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又加入其中。所有这些对立在彼此相关又分裂的地区(比如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开始,穿越中东直至苏丹的这条全球大地震带)相遇。它们在这样一些地区不断激化,那里宗教和种族混杂,国家之间的边界线是任意确定的,角逐激烈和无视任何秩序,比如中东地区。

因此,20世纪既创造了又割裂了惟一的全球的组织,它的部分之间互相孤立、对峙、战斗。各个国家统治着世界舞台好像是粗暴而又昏醉的、强大而又无力的泰坦(Titans)[①]。同时,在地球上汹涌的技术—工业的大潮趋向于消灭很多人类的、种族的、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本身创造的问题多于它解决的问题,它导致了深刻的文明的危机,后者也冲击着西方的繁荣社会。

只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发展是难以长期立足的,包括所谓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丰富和复杂的关于发展的概念,它应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理智的、感情的、伦理的……

20世纪没有离开全球的铁器时代,它陷入在那里面。

2. 20世纪的遗产

20世纪是两种野蛮的结合的世纪:第一种野蛮来自古老的年代,它带来战争、屠杀、放逐、狂信;第二种野蛮是冰冷的、无名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译者注

的,来自理性的合理化的内部,它只知道计算而不知道个人、他们的血肉、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灵魂,它追求增长技术—工业的致死的和奴役的力量。

为了走出这个野蛮的纪元,必须首先认清它的遗产。这个遗产是双重的,既有引致死亡的遗产又有导向新生的遗产。

2.1 致死的遗产

20 世纪似乎证明了这个残酷的格言:“人类的进化是致死的力量的增长”。

20 世纪所导致的死亡不仅是被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与苏联的灭绝式集中营所杀死的数千万死者,它还包括被两个新的致死力量所杀死的死者。

2.1.1 核武器

第一个致死的力量是核武器可能造成整个人类的全部死亡。这个危险在公元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消除,相反,它随着核炸弹的扩散和小型化而增长了。自我消灭的潜在可能性今后伴随着人类的前进。

2.1.2 新的危害

第二个致死的力量是生态系统的死亡的可能性。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我们发现了我们城市的技术—工业发展的排泄物、释放物和挥发物在恶化我们的生物圈,使我们构成其一部分的生物环境不可挽救地中毒的可能性威胁着我们——技术对于自然的无节制的统治把人类导向自杀。

此外,人们以为处于被清除过程中的致死的力量进行反扑:爱滋病病毒在我们之中蔓延,这是在突然出现的未知病毒中的第一个;而人们以为被消灭了的病菌带着对于抗生素的新的抵抗力

而复归。因此,死亡的可能性随着病菌的毒性重新进入我们以为已被消过毒的我们的身体。

最后,死亡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扩张了地盘。特别是在孤独和焦虑在扩展和增长的所有地方,潜藏在我们之中每一个人身上的自我摧毁的力量,借助于像海洛因这样的硬毒品被激发起来。

因此,与热核武器一起在我们头上盘旋的威胁,它用生物圈的恶化包围我们,它潜藏在我们的每一个性爱的拥抱之中,它随着毒品的致命的诱惑蜷缩在我们的灵魂里。

2.2　现代性的死亡

诞生于西方的文明由于解开了它与往昔之间的缆绳,自信在走向一个可以无限地进步的未来。这个未来观是被科学、理性、历史、经济、民主的联合的进步所催熟的。但是,随着广岛事件,我们得知科学的作用是两重性的;我们看到理性的倒退,而斯大林式的狂信戴着历史的理性的面具;我们看到不存在指导着不可抵挡地走向光辉的未来的历史规律;我们看到民主的胜利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最终地被保障的;我们看到工业的发展可能导致文化的被摧残和致命的污染;我们看到舒适的文明可能同时产生苦恼。如果现代性被定义为对于进步、技术、科学、经济发展的无条件的信赖,那么这种现代性死亡了。

2.3　期望

如果人类——其"大脑—精神"的辩证关系不是封闭的——身上真的拥有不可穷尽的创造性的资源,那么人们可以隐约地预感到在第三个千年将出现20世纪已为之带来了萌芽或胚胎的新创造的可能性,这就是**地球公民资格**。既传承往昔又具有接受新事物的开放精神的教育处于实现这个新的任务的核心。

2.3.1 逆流的贡献

20世纪在其暮日遗留了起更新作用的逆流作为遗产。在历史上经常作为对统治潮流的反动而被引起的逆流，可以继续发展并扭转事件的进程。我们应该注意下述逆流：

◆ 生态运动的逆流：环境恶化的增长和技术—工业的灾难的出现只是使之不断加强；

◆ 质的标准的逆流：它作为对量的标准的泛滥和普遍的均一化的倾向的扩张的反动而产生，专注于所有领域内的质的问题，从生活质量开始；

◆ 抵抗纯粹讲功利的散文般的生活的逆流：它表现为追求一种投入爱情、美妙的事物、热情、节庆的诗意般的生活；

◆ 抵抗把标准化的消费(consommation)置于首位的逆流：它用两种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追求生活的紧张、刺激(耗尽、用光[consumation])，另一种是追求俭朴和节制；

◆ 企图从无所不在的金钱的专政下解放出来的尚显羞怯的逆流：追求用实现人类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来进行补偿，使利润的统治后退；

◆ 作为对暴力的泛滥的反动而产生的仍是显得羞怯的一个逆流：用关于灵魂和精神的调和的伦理学来滋养自己。

人们同样可以想到所有滋养了20世纪的重大的革命性的希望但又被欺骗了的那些向往，将会在新的追求休戚与共的关系和责任感的形式下复生。

人们同样可以企盼：今天鼓舞着人类的各个分散的部分的、引起保存种族的或民族的本征的意志的追根溯源的需要，在不自我否定它们自身的情况下，深化和拓广为对于作为地球—祖国的公民的人类本征的追根溯源。

人们可以企盼一个为人类存在服务的政策，它与一项关于文明的政策不可分，将开辟把地球文明化为人类共同的家和花园的道路。

所有这些思潮致力于在21世纪的进程中强化和扩张自己，建立许多改革的开端。但是真正的改革只能在下述条件下完成：这些不同的改革彼此相互改革，由此形成一个总体的改革，后者又将反馈作用于每一个改革。

2.3.2 在各种可能性的矛盾的游戏中

积极的演变的一个基本条件将是科学和技术固有的解放的力量能够战胜它们的致死的和奴役的力量。技术—科学的发展具有两重性。它们缩小了地球，使得全球所有的地点可以处于即时的通讯之中，提供手段养活整个行星的居民和保证他们一个最低限度的福利；但是它们又创造了最恶劣的致死的和破坏的条件。人们控制着控制能量的机器，但同时他们本身又被机器控制着。丹·西蒙斯的科学幻想的传奇故事《许珀里翁》设想：在未来的一个千年里，人工智能(I.A.)将制服人类，而人类还对此无知无识，准备着自己的被淘汰。小说描绘了令人惊愕的剧末高潮，在结尾时一个人类和I.A.产生的杂种，怀有诗人济慈(Keats)的灵魂，宣布了一种新的智慧。这就是从20世纪起提出的关键问题：我们将从属于"技术圈"还是我们将能与它合作共生？

生物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同样是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令人惊异的。关于人脑的遗传学和分子操纵技术将使得可能实现思想灌输和宣传工作还从未成功实现的人的正规化和标准化。但是它们也将使得可能实现消除妨碍潜能发挥的缺陷，一门预示医学，精神对自己大脑的控制。

变革的现有的规模和加速度看来预示如下一个转变，它比使新石器时代时没有国家、农业和城市的狩猎者—采集者的原始小型社会过渡到自八千年来泛滥及全球的文明历史的社会的转变更加可观。

我们也可以依靠人类爱情的不可穷竭的源泉。当然，20 世纪曾可怖地受苦于爱情的缺乏、漠不关心、冷酷和残忍。但是它也产生了过多的爱情用以献给骗人的神话、幻想、虚假的神明，或使自己沉醉在如搜集邮票的小的恋物癖中。

我们还可以对很大部分没有被加以开发的人类的大脑的可能性寄予希望：人类精神可能在智能、理解力、创造性方面再发展出我们尚不了解的能力。社会的潜能与大脑的潜能是相互关联的，无人能够断言我们的社会已经穷尽了它改善和转变的可能性和我们到达了历史的结尾。我们能够期待在人类、个人、集体、种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发生进步。

人类的、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进步的可能性恢复了期望的原则，但这是没有“科学的”确定性和“历史的”承诺的。这是一个大大取决于自觉意识、意志、勇气、运气……的不确定的可能性。因此，自觉意识变成了紧急的和首要的。

带来最坏的危难的东西也带来最好的企盼，它就是人类精神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思想的问题变成生死攸关的。

3. 地球的本征和意识

全球的联合是一个变小的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的最低限度的合理要求。这样一种联合需要一种意识和一种相互归属的感情，把我们联结于被视为最初的和最终的祖国的我们的地球。

如果祖国的概念包含有一个共同的本征，一个感情上归属于一个既是母性的又是父性的实体(被包含在“祖国”这个阴—阳性的词汇中)的关系、和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地球—祖国的概念。

如同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指出的，我们都有通过个人的、文化

的和社会的多样性而存在的共同的遗传的、大脑的、情感的同一性。我们源出于地球是其母体和奶妈的生命的发展。最后，自从20世纪以来，所有的人类都遭受着同样的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和被联系于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在地球上"存在在那里"(être-là)。学会存在在那里，这意味着学会生活、分享、交流、融洽相处；这是人们仅仅在和通过各个特殊文化而学习的东西。而我们今后也需要学会作为行星地球的人类而存在、生活、分享、交流、融洽相处。不仅是属于一个文化的，而且还是属于地球的。我们应该致力于不再是主宰，而是布置、改善、理解。我们应该在我们身上纳入下述品质：

◆ 人类学的意识：它使我们在我们的多样性中看到我们的同一性。

◆ 生态学的意识：这也就是与所有生存之物居住在同一个有生命的环境(生物圈)中的意识；承认我们与生物圈的共存的联系会导致我们抛弃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宇宙的梦想，从而滋生在地球上与万物共生的憧憬。

◆ 地球的公民的意识：这也就是对于地球的孩子们的责任感和相互依存性的意识。

◆ 对于人类地位的精神意识：它来自思想的复杂的应用，使我们能够同时相互批评、自我批评和相互理解。

我们应该教授不再是把普遍性与各个故土对立起来的，而是以同心圆的方式把我们的家庭的、地区的、国家的、欧洲的不同等级的故土联系起来，把它们整合到地球这个故土的具体的宇宙中。不应再用一个光辉的未来来与一个被奴役的和迷信的过去相对立。所有的文化都有它们的效能、经验、智慧，同时也有它们的缺点和它们的无知。一个人类群体是通过追溯他们过去的根源找到迎战他们的现在和准备他们的未来的能量。追求一个更美好的未

来应该与寻本溯源是互补的而不再是对立的。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群体应该通过归附祖先而追溯他的本征,在现在中确认他的需要,在未来中投注他的向往和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各个国家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如下的条件下:它们为着它们自身的利益接受放弃在所有关于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和特别是超出它们孤立的权能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的绝对主权。无论如何,赋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民族的充满效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不是应该使它们解体,而是尊重它们和把它们整合在总体中,并使它们尊重由它们构成的总体。

结成邦联的世界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应该是多中心的和无中心的。局部化了的西方会在自身感到对东方的需要,而东方在西方化时也坚持保存其自身。北方发展了计算和技术,但是它失去了生活的质量;而南方虽然在技术上落后,但仍培养着生活的品味。一种两重性逻辑应在今后使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互相补充。

连接应该代替分离,并借助于"共生学"(symbiosophie)——在一起生活的智慧。

统一、杂交和多样性应该被发展以抵制均一化和封闭。杂交不仅是从交会出发创造新的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也变成了联接和统一的产物和生产者。它把复杂性引入了(文化的或种族的)混合的本征的核心。当然每个人能够和应该在全球的纪元培植他的多重本征,后者使得可能在他的身上整合家庭的本征、地区的本征、种族的本征、国家的本征、宗教的或哲学的本征、大陆的[①]本征和地球的本征。但是杂合者本人可能在他的多重本征的根基找到家庭的两极性,种族的、国家的、甚至大陆的两极性,这些东西使得他可能在他身上构成充分的人类的复杂的本征。

① 或洲的。——译者注

人类学的双重的绝对要求树立在我们面前：保存人类的统一性和保存人类的多样性。以同心圆和多元的方式发展我们的本征：我们种族的本征、我们祖国的本征、我们的文明共同体的本征，最后是我们的地球公民的本征。

我们在人类的全球的范围内投入了作为对死亡的抵抗的生命的基本事业。使地球变得文明和团结，把人种改造成真正的人类，这变成不仅是向往着进步而且向往着人类的永存的任何教育的基本的和总体的宗旨。我们人类在这个全球纪元的意识应该引导我们达到每个人对每个人、全体对全体的相互团结和相互关怀。未来的教育将应教导全球性的理解的伦理学。[1]

[1] 参阅第六章。

第五章　迎战不确定性

神灵给我们创造了许多惊奇：期待之事不能实现，通向意外之事的道路被开通。

欧里庇得斯(Euripide)[①]

我们还没有把欧里庇得斯关于期待意外之事的启示纳入我们的头脑。但是20世纪末有利于使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

前几个世纪一直相信一个或者是重复的或者是进步的未来。20世纪发现了未来的失落，亦即它的不可预见性。意识到这一点应该是与另一个相关的和反馈的意识相伴随的：人类历史过去是、今后仍将是一个未知的探险。理智的伟大的成功将是终于能够摆脱预言人类命运的幻想。未来保持为开放的和不可预测的。当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的、社会的和其他的决定机制，但是这些与无数使这个进程分岔或改道的偶然事变和随机因素发生着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关系。

传统的文明生存于循环的时间周期的确定性中，它们曾必须献出有时是由人类构成的牺牲来保证这个周期的正常运行。近代文明曾生活在历史进步的确定性中。意识到历史的不确定性是在今天关于进步的神话崩塌了之后达成的。进步肯定是可能的，但它是不确定的。在这之外还要加上由于我们全球纪元的复杂的和

---

①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公元前480—前406年。——译者注

随机的过程的速度和加速度所引起的所有的不确定性，它们是无论人类精神、超强电脑还是任何拉普拉斯妖都不能把握的。

1. 历史的不确定性

在1914年春天谁曾想到在萨拉热窝发生的一次谋杀掀起了历时四年的世界大战，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牺牲？

在1916年谁曾想到帝俄军队会瓦解，而一个很小的处于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党派会在1917年10月发动一场共产主义革命？

在1918年谁曾想到所签订的和平条约[①]本身含有诱发在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在1927年的繁荣中谁曾想到一场经济灾难在1929年从华尔街开始，后来在全球汹涌泛滥？

在1930年谁曾想到希特勒在1933年会合法地取得政权？

在1940—1941年除了几个不现实的人谁曾想到纳粹对于欧洲的稳如磐石的统治，然后是Wehrmacht[②]在苏联风驰电掣的进展直抵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口，但在1942年却出现了完全倒转的形势？

在1943年苏联与西方结盟的高潮中，谁曾想到三年过后在这同一些盟友之间发生了冷战？

在1980年除了若干极有远见者谁曾想到苏维埃帝国会在1989年从内部崩溃？

在1989年谁曾想到海湾战争和将使南斯拉夫瓦解的战争？

---

① 指1918年3月苏联与德、奥等国签订的妥协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译者注

② 德文：(1935—1945年的)德国国防军。——译者注

在1999年1月谁曾想到1999年3月对塞尔维亚的空袭，而在我书写这几行字的时刻里，谁能预测其结果？

在我书写这几行字的时刻里无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也可能在整个21世纪它们都仍将是无答案的。如同帕托卡(Patocka)说过的："变化在今后是充满疑问的，并将永远是这样。"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

2. 创造性的和破坏性的历史

新事物的突然出现是不能预言的，否则它将不是新事物。一个创造的突然发生也是不能预知的，否则就将没有创造。

历史在前进，但不是像一条河流那样正面直行，而是由于内部的革新或创造或者外部的事件或变故而曲折行进。内部的变革从首先是局部的、甚至微小的创造开始，在起初局限于若干个人的环境中进行，表现为对正规性的偏离。如果这种偏离未被粉碎，那么它可能在经常是由危机形势造成的有利条件中使抑制它或镇压它的控制机构陷于瘫痪，然后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发展、传播，并形成一种日益强大的产生新的正规性的倾向。所有的技术发明——挽具、指南针、印刷术、蒸汽机、电影、直到电脑都历经这一情况；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所有产生于释迦牟尼、摩西、耶稣、穆罕默德、路德的个人说教的伟大的举世流传的宗教也是如此；所有产生于一些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头脑的伟大的举世流传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专制国家和极权政体知道携有异见的个人构成潜在的离经叛道的危险，它们消除他们和消灭任何离经叛道的微小策源地。但是专制者终于会衰弱，而离经叛道者会突然出现，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国家的顶峰，经常意外地出现在一个新的君主或一个新的总书记的头脑中。

任何进化因此是成功的离经叛道的结果，它的发展改变了它由以诞生的系统——它在瓦解该系统中把它加以重组。重大的转变都是形态生成的、创造新形式的，它可能形成真正的巨变。总而言之，没有进化在它的转变的或形态生成的过程中不是瓦解的/重组的。

不是只有革新和创造，也存在着破坏。后者可能出自新的发展，因此，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导致破坏传统的文明。大规模的和野蛮的破坏来自外部，发生于消灭古代的帝国和城邦的征服和大屠杀中。16世纪，西班牙人的征服构成了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帝国的十足的灾难。20世纪经历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崩溃和苏维埃帝国的内部爆炸。此外，由于历史大动乱许多既得成果永远丧失了。被记录在书籍中的如此之多的知识、如此之多的思想成果、如此之多的文学杰作曾经随着这些书籍一起被销毁。人类已获得的经验只有十分微小的部分被保存，而很大的部分都丧失了，它们是在每一代消散的。事实上在历史上存在着既得成果的巨大耗散。最后，许多有益的观念没有被吸取，而是相反地由于规范、忌讳、禁忌被抛弃了。

历史因此向我们既展现了叹为观止的创造——比如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同时产生了民主制和哲学——又展现了可怖的不仅是对社会、而且是对文明的摧残。

历史因此并不构成直线式的进化。它经历动荡、分岔、漂泊、静止阶段、停滞、继潜伏阶段之后的大扩张——比如基督教，在经两个世纪的孵育后一举占领整个罗马帝国——还有感染极快的过程，如伊斯兰教的传播。这里有相互碰撞的变化的交迭，伴随着随机因素、不确定性，包含着进化、退化、进展、倒退、断裂。而当它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历史时，这个历史如同人们见到的包含着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政体的崛起。历史是一个有序、无序和组织的复合体。它同时遵从决定论和偶然性，在后者中不断涌现"噪

音和狂乱”。它总是展现两副相反的面孔：文明和野蛮，创造和破坏，创生和致死……

3. 不确定的世界

人类的不确定的历险过程只是在它的范围内继续宇宙的不确定的历险过程，后者产生于一个对我们不可思议的事变，并在创造性的和破坏性的变化中继续进展。

在20世纪末我们了解到对一个服从无懈可击的秩序的宇宙的观点应该被这样一种宇宙观所代替，在其中这个宇宙是处于有序、无序和组织之间的一种两重性逻辑（同时是对抗、竞争和互补的关系）的游戏和博弈。

地球，可能起源于一堆由太阳爆裂产生的宇宙碎屑，本身也在有序←→无序←→组织的两重性逻辑的游戏中自我组织。在这过程中它不仅遭受了火山爆发和地震，而且遭受陨石的剧烈冲撞，其中一次可能引起从地球分出月亮。[①]

4. 迎战不确定性

一个新的意识开始涌现：在一切方面面临不确定性的人，被带入一个新的探险。必须学会迎战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的时代，在其中价值是两义的，一切是相连的。因此，未来的教育应该重新考虑与认识有关的不确定性（参阅第二章），因为存在着：

◆ 一个大脑—精神的不确定性的原则，它出自任何认识所固有的翻译/重构的过程；

---

① 参阅第三章“教授人类地位”中之1.3节“地球条件”。

◆ 一个逻辑的不确定性的原则，如同帕斯卡已经如此清楚地所说的："矛盾既不标志虚假，不矛盾也不标志真理。"

◆ 一个理性的不确定性的原则，因为合理性（rationalité）若不保持它的自我批评的警惕性，将跌翻到合理化（rationalisation）之中；

◆ 一个心理学的不确定性的原则：存在着完全意识到在我们精神的机构中发生的事情的不可能性，我们的精神总是保持着某些基本上无意识的东西。因此存在着批评性的自我审察的困难，对于这种自我审察，我们的真诚并不是确定性的保证，并且还存在着任何自我认识的极限。

如此之多的问题可悲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想到世界不仅处于危机之中，而且处在致死的力量和求生的力量相互激烈对抗的这种可称之为"垂危"的状态之中。人类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仍然互为敌人，种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仇恨的泛滥一再引起战争、屠杀、暴行、仇恨、鄙视。种种过程都是对一个在这里有数千年、在那里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世界的破坏者。人类终于还未曾达到把"人类"分娩出来。我们还不确知这到底是预告一个新世界的降生的旧世界的垂危，还是一个必死的垂危。一个新的意识开始涌现：人类被投入一个未知的探险。

4.1　现实的不确定性

因此，现实并不是显然地清晰易辨的。观念和理论并不反映现实，而只是翻译现实，它们可能以错误的方式来进行翻译。我们的现实不过是我们对于现实的观念。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适应直接的现实），也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非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逃避现实的约束），重要的是做一个复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者：认识到现实的不确定性，知道在现实中存在着看不见的可能性。

这向我们表明在知道现实主义在哪里之前必须先说明现实。

又一次我们触及了关于现实的不确定性，现实用不确定性来打击现实主义，有时揭示出表面的非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

4.2 认识的不确定性

认识因此真正是一个不确定的冒险，在它本身永久地包含着幻觉和错误的危险。但是，在空论家的、独断论的、褊狭的确定性中存在着最坏的幻觉；相反地，对认识行为的不确定的特点的意识构成了最终达到恰当的认识的可能条件，这种认识需要审察、检验和会聚各种征象。因此在填字游戏中，人们达到对填写出每个词的正确性既依据每个词与其定义的相符又依据它与其他包含有共同字母的词的交汇；然后，在所有词汇之间建立的普遍协调构成了一个总体的检验，它肯定了被写下的不同的词汇的合理性。但是生活不同于填字游戏，包含着无定义的格子、虚假定义的格子，特别是缺乏一个封闭的总体框架。只是在这里，人们可以脱离一个框架和处理可以归类的元素，如同在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那样，最终达到某种确定性。我们又一次重复说：认识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海洋里穿越一些确定性的群岛的航行。

4.3 不确定性和行动的环境论

人们有时觉得行动是简单的，因为在有几种行动方案时，是由人来决断、由人来取舍。但是，行动是决断、是选择、但也是博弈。而在博弈的概念中，存在着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意识。

在此出现了“行动的环境论”的概念。从一个人采取一个行动起，无论这个行动是什么，它都开始逃脱这个人的意向。这个行动进入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天地，而最终是环境把它攫住，亦即它可能

变得与原来的意向背道而驰。经常这个行动如同飞镖返回击中我们的头部。这迫使我们跟踪行动,努力纠正它(如果还来得及),有时还要销毁它,如同 NASA[①]的负责人在一个火箭脱离其轨道的情况下令其爆炸。

行动的环境论总的说来就是要考虑到它所设定的复杂性,亦即随机因素、偶然性、主动性、决断、意外之事、不可预见性、对飘移和变迁的意识。[②]

20 世纪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了关于认识的有限性的定理,它们既涉及理性推理(哥德尔 Gödel 定理、蔡丁 Chaitin 定理),又涉及行为。在行为的领域里,我们提请注意阿罗(Arrow)[③]定理,它建立了把许多个人利益聚合为一个集体利益——如同从个人幸福的积聚出发来定义集体幸福——的不可能性。更广义地说,存在着建立在人类问题中的最佳化算法的不可能性:追求最佳化超越了任何可以利用的研究手段,而最终使对最佳状态的研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是可悲的。人们被引导至一个介于追求最大的善和追求最小的恶之间的新的不确定性之中。

此外,冯·诺依曼(von Neumann)的博弈论也向我们指出:对于超过两个理性的对手的对抗,我们不能以确定的方式决定最优的战略。但是,生活的竞逐罕有只涉及两个对手的,而完全遵循理性的对手更属罕见。

说到底,我们必须迎战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我们称之为行动的环境论的东西,它包含如下四个原则。

---

①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译者注

② 参阅 E. 莫兰:《复杂思想导论》,ESF 出版社,巴黎,1990 年。

③ 美国经济学家,生于 1921 年,提出“不可能理论”,获 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4.3.1 风险←→预防的圆环

这是出自风险与预防的双重必然性的不确定性的原则。对于任何在不确定的环境内采取的行动，存在着在风险的原则与预防的原则之间的矛盾，但二者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能够不顾它们的对立而把它们联系起来，根据伯里克利(Périclès)①所说的下述话："我们都知道既表现出极大的果敢又只在成熟的思考之后采取任何行动。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大胆是无知的后果，而思考导致犹豫。"(见修昔底德 Thucydide 所写《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书)。

4.3.2 目的←→手段的圆环

这是目的和手段的不确定性的原则。由于手段和目的彼此之间是相互—反馈—作用的，下述之点基本是不可避免的：卑鄙的手段为高贵的目的服务会败坏目的并最终取代目的。为了解放的目的而使用的控制的手段不仅会玷污这个目的，而且会以自身为目的。但是，为一个正义的事业服务的诡计、谎言、暴力也可能拯救这个事业而不污染它，只要它们是一些非常的和临时的措施。反过来说也存在这种可能性：邪恶的手段正是由于它们引起的对它们的反击，导致有益的结果。因此所谓纯洁的手段导致期望的目的和肮脏的手段必然招致不祥的下场，对此也没有绝对的确定性。

4.3.3 行动←→背景的圆环

任何行动都逃脱它的作者的意志而进入它所介入的环境中的相互间的—反馈的—作用的游戏。这就是行动环境论特有的原则。行动不仅冒着失败的风险，而且有可能改变方向或与初始的宗旨背道而驰，它甚至可以返转回来攻击它的发起者。在西班牙

---

① 古代雅典政治家，约公元前495—429。——译者注

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国王的即位,根据佛朗哥将军的意图是巩固他的独裁秩序,却相反地有力地促进了西班牙走向民主。

因此,行动可能有三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同海施曼(Hirschman)所清理出的:

◆ 逆反效果(意外的有害效果多于所期望的有益效果);

◆ 革新的落空(愈是促使它变化,它愈是保持为同一事物);

◆ 使既得成果陷于危境(人们希望改善社会,但只是成功地取消了自由或安全)。

5. 长期的不可预测性

人们肯定可以想像或预估一个行动的短期后果,但它的长期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因此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连锁后果都是出乎意料的:恐怖时代,然后是热月政变,然后是第一帝国,然后是波旁王朝复辟。更广而言之,法国大革命的欧洲的和世界的后果直到 1917 年的十月革命都是未曾预见的。此后 1917 年十月革命的后果也是不可预见的。

因此,没有一个行动被保障在初始意图的方向上继续实施。

但是行动的环境论没有敦促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敦促我们进行认识到其风险的博弈和制订使得可能修改甚至取消已采取的行动的策略。

5.1 博弈(pari)和策略(stratégie)

确实存在着两个不可缺少的对付行动的不确定性的法宝。第一个是对任何决断所包含的赌博成分的充分意识,第二个是借助于策略。

一旦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作出一个决断之后,充分地意识到不确定性变成充分地意识到一场赌博。帕斯卡承认他的信仰属于

一个赌博。赌博的概念应该被扩展到任何信仰，包括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信仰、对于博爱或正义的信仰以及任何道德的决定。

策略应该优于程序(programme)。程序建立一个行动的序列，这些行动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不加变化地加以执行；但是一旦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程序就得停车。策略是相反地在审察形势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大的可能性和不大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制订的行动方案。方案可以和应该根据在行动中途搜集到的信息、遭遇到的偶然事变——临时受阻或大好机遇——作出修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策略内部应用一些不长的程序化的序列，但是对于任何被实行于一个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中的行动，使用策略是必不可免的。它应该有时强调谨慎，有时强调大胆，如果可能的话同时强调两者。策略可以和应该常常实行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普遍的答案。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风险：或者是不妥协导致失败，或者妥协导致丢失利益。在策略中，根据背景或依照它自身的发展，总是以特殊的方式存在着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两重性逻辑的问题。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制订为一个复杂的目标——如同箴言“自由、平等、博爱”所指出的目标——服务的策略的困难。上述互补的三项同时又是对立的：自由趋于破坏平等，而如果把平等树立起来，它又趋于破坏自由；最后博爱既不能被颁布，也不能被树立，而只能被激励。一项策略将应根据历史的条件来促进或是自由、或是平等、或是博爱，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真正与另两项对立。

因此对于行动的不确定性的应战由深思熟虑地选择一项决定、意识到进行博弈和制订一个策略构成。这个策略考虑到它自己的多重目标固有的复杂性，能够在行动的中途根据随机因素、情报、背景和变化进行修改，能够考虑当该行动沿着有害的进程发展时取消它。因此我们能够和应该与行动的不确定性作斗争。我们甚至能够在短期和中期制胜它；但是无人能够自认在长时期中克

服它。策略，如同认识，永远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海洋中穿越确定性的群岛的航行。

清除不确定性的欲望可能对我们显得是我们精神固有的一种病症，而任何向伟大的“确定性”行进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精神性妊娠。

思想因此应该自我武装和自我磨炼以便迎战不确定性。任何包含运气的东西也包含着风险，而思想应该认识到遭受风险的运气如同遭受运气的风险。

放弃被“历史的规律”所保障的进步并不是抛弃进步，而是认识到后者的不确定的和脆弱的特点。放弃最美好的世界绝不意味着放弃一个较好的世界。

在历史中我们经常惋惜地看到可能的东西变成不可能的，并且我们隐感到人类最丰富的潜能仍然处于不可能实现的状态。但是我们也看到意料之外的事变成可能的并实现了。我们经常看到与其说是可能性大的事不如说是可能性不大的事实现了。因此我们知道等待和为实现可能性不大的事而努力奋斗。

第六章　教授相互理解

我们地球上的形势是矛盾的。相互依存性大大增加了;对于生死相关的意识今后把人类彼此联系在一起;通讯取得全胜,我们的行星被网络、传真、手提电话、调制解调器(modems)、互联网所穿越;但是,互不理解还是普遍的。肯定在相互理解上存在着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进步,但是互不理解的进展似乎更加巨大。

相互理解已变成对于人类的关键性问题。以此理由,它应该成为未来的教育的目标之一。

我们要想到,从电话到互联网没有一种通讯技术本身可以带来理解。理解是不能被数字化的。教育理解数学或某一门学科是一回事,教育人类的相互理解是另一回事。人们在此重新找到了教育特有的精神使命:教授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人类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相依共存的条件和保障。

相互理解的问题包含着两个焦点:

◆ 一个焦点是变成全球性的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因为个人、文化和从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相会和关系在增长着。

◆ 个人的焦点,即亲近的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焦点。这些关系越来越被不理解所威胁(如同我在下文将指出的)。"人们愈是亲近,就愈是相互理解"的公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性,我们可以提出相反的公理与它相对立:"人们愈是亲近,就愈少相互理解",因为亲近的人之间可能滋生误会、嫉妒、进攻性,包括显然在理智上最有教养的环境中。

1. 两种理解

联系没有带来理解。

信息，如果它是被很好地传输和理解的，会带来可理解性，这是理解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存在着两种理解：一种是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另一种是人类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理解(comprendre)意味着在理智上抓住整体，一起把握(文本及其背景、部分与整体、多样因素和一个总体)。理智的理解经由解读和说明来实现。

说明(expliquer)，这是考察一个必须作为对象来认识的东西和向它应用所有的客观认识的手段。说明当然对于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是必要的。

人类间的理解超越了说明。说明对于对非人的和物质的事物的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是足够的。但是它对于人类间的理解是不够的。

后者包含主体对主体的认识。因此如果我看到一个孩子在哭泣，我将理解他，不是通过测定他泪水中含盐量的浓度，而是通过把他同化于我和把我同化于他，在我身上重新发现我孩提时的悲伤。他人不仅仅是客观地被认识的，而是作为另一个我们可以加以同化和我们可以被同化于他的主体来认识的，在这过程中，ego alter[①]变成了 alter ego[②]。在理解中必然包括移情、同化、投影的过程。相互理解总是主体间的，它需要开放、同情和宽宏。

① 拉丁文：另一个自我。——译者注

② 拉丁文：自我的另一个。——译者注

2. 关于理解的障碍的教育

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的外部障碍是多种多样的。

理解他人的话语、思想和世界观的含义总是受到无所不在的威胁。

◆ 总是存在干扰信息的传输的噪音，创造着误解或失听。

◆ 也存在一个概念的多义性，使它在一个意义上被说出，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被理解。因此“文化”这个词是条真正的概念的变色龙，它可以意味着任何不是自然地被赋有的、而必须经过学习在后天加以掌握的东西，也可以意味着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习俗、价值、信仰，还可以意味着所有由人文科学、文化、艺术、哲学所带来的东西。

◆ 存在着对他人的惯例和习俗的无知，特别是礼节方面的，这导致无意识地伤害他人或在他人面前失去信任。

◆ 也存在着对在另一个文化内部通行的绝对价值规范的不理解，比如在传统社会中对老年人的尊敬、孩子的无条件的服从、宗教的信仰，或相反地在我们当代的民主社会里，对个人的崇拜和对自由的尊重。

◆ 也存在着对一个文化固有的道德律令、对部族社会中的复仇的律令、对发达社会中的法律律令的不理解。

◆ 也经常存在着置身于一个世界观的内部去理解另一个世界观的观念或论证的不可能性，如同置身于一个哲学内部不可能去理解另一个哲学。

◆ 最后特别是存在着一种思想结构去理解另一种思想结构的不可能性。

内在于两种理解中的障碍是巨大的。它们不仅是彼此不感兴趣，而且是自我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己放置于世界的中心，而把任何外在的或远离

的东西看作次要的、无足轻重的或敌对的。

2.1　自我中心主义

自我中心主义保持由自我辩护、自我赞美产生的 self-deception[①]，亦即对自己本身的欺骗，和把所有坏事的原因都推在外部的或非外部的他人身上的倾向。Self-deception 是一种复杂的在谎言、真诚、信服、伪善之中旋转的游戏，它导致我们以贬抑的方式观察别人的话语和行为，选取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消除对他们有利的东西，选取使我们满意的记忆，消除或改变丢面子的记忆。

伊恩·皮尔斯（Iain Pears）写的《十字架的圆圈》（*Cercle de la croix*），通过对于同一些事件和同一个凶杀案的四种不同的叙述，很好地表明了在这些叙述之间不仅由于掩饰和说谎，而且由于先入之见、合理化、自我中心主义或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不相容性。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另一次的幻梦剧》（*Féerie pour une autre fois*），是对作者的狂热的自我辩护倾向、他的无能自我批评、他的偏执狂的推理的一个卓绝的表现。

事实上，不理解自我是不理解他人一个十分重要的源泉。人自己对自己掩饰其缺陷和弱点，这使得他对他人的缺陷和弱点毫不留情。

自我中心主义在约束和义务松弛的情况下扩大了，这些约束和义务过去使个人在其愿望与父母或配偶的愿望相抵触时加以放弃。今天，不理解扫荡了双亲—子女、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它像日常生活中的癌症一样到处扩散，引起诬蔑、袭击、心理上的凶杀（望人死亡）。知识分子、作家或大学教师的世界本应是最能理解人的，而现在由于需要被神化和取得荣耀引起自我极度膨胀，受到的腐蚀最深。

---

① 英文：自欺。——译者注

2.2 种族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

它们滋生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可能发展到取消异己者的人的性质。因此,进行真正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最好是反对它的自我—社会中心的根源,而不是其症状。

从任意的前提、狂热的自我辩护、无能自我批评、偏执狂的推理、妄自尊大、排斥异己、蔑视他人、制造和谴责替罪羊出发而产生的先入之见、合理化是同时出自自我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最坏的不理解的原因和结果。

不理解产生愚蠢如同愚蠢产生不理解。愤慨省略了审察和分析。如同克莱芒·鲁塞(Clément Rosset)所说,“由于道德方面的原因失去信誉使得失去信誉的对象可能避免作任何理智的努力,以致于一个道德的判断总是表现了对分析的拒绝,甚至对思想的拒绝。”[①] 如同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②]所指出的,“道德愤怒的突出特点仍然是本能的以怨报怨的愿望”。

无能认识一个复杂事物和把对总体的认识还原为对它的一个部分的认识,在人类关系的世界中比在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中引起更加不幸的后果。

2.3 还原的精神

把对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化归为对它的一个被认为足以说明问题的要素的认识,在伦理学中具有比在物理认识中更糟糕的后果。但是在这里也是占统治地位的还原的和简化的思维方式与不理解的机制相结合,后者决定了把在本性上是多样性的人格还原

① C.鲁塞:《同义反复的精灵,继之以五个道德剧》,Minuit 出版社,1997 年,第 68 页。

② 芬兰社会学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1862—1939。——译者注

为它诸多特点中的惟一的一个。如果该特点是令人欢喜的,就存在着对于这个人格的消极方面的忽略;如果该特点是使人厌恶的,就将存在对他的积极特点的无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将存在着不理解。理解要求我们比如说不要把一个人封闭在、化归为他的罪行,即使他犯了几个罪行也不要把他视同他的罪恶性。如同黑格尔说过的:"抽象的思维只在杀人犯身上看到这个(从他的复合体中抽取出来的)抽象的品质,并凭借这惟一的品质,在他身上(消灭了)他人性中所有其他的东西。"

此外,我们还想到:被一个观念、一种信仰所占有,绝对地确信它的真理性,这消除了理解其他观念、其他信仰、其他人格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理解的障碍有许多并具有多种形式,最严重的障碍由下述因素构成:自我中心主义←→自我辩护←→自我欺骗的圆环,狂信和还原,以及报复和复仇。它们是一些难以磨灭的扎根在人类精神中的结构,精神难以排除它们,但是能够和应该战胜它们。

理智的与人类的不理解、个人的与集体的不理解的并存,构成了对于改善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障碍。

并不是只有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文化的方式将促进相互理解的渠道,还存在着理智的方式和伦理的方式将能发展理智的和人类的双重理解。

3. 理解的伦理学

理解的伦理学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它首先要求我们超脱利害关系地理解。它要求作出巨大的努力,因为它不能期待任何回报:一个被狂信者以死相威胁的人理解这个狂信者为什么想杀掉他,同时知道狂信者永远也不会理解他。理解了不能理解我们的狂信

者，这就是理解了人类的狂热信仰的根源、形式和表现。这就是理解了人们为什么和怎样相互仇恨、相互鄙视。理解的伦理学要求我们理解不理解的现象。

理解的伦理学要求进行论证、反驳，而不是诅咒、驱逐。把具有更广阔的理解头脑的人闭锁在叛徒的概念中，这阻止认识到错误、迷途、意识形态、漂移。

理解既不辩白也不控告，它要求我们避免专断的、无法挽回的谴责，仿佛人们自己从未遭逢失败和犯过错误似的。如果我们知道在谴责之前进行理解，我们将处于使人类关系人性化的道路上。

促进理解的东西是：

3.1 "明智地思考"(bien penser)

这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使得可能一起领会文本和背景、存在物与其环境、局部与整体、多方面的东西，一句话，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行为的条件。它使我们可能同时理解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自欺、被一种信仰支配、狂热性和歇斯底里)。

3.2 内省

经常性的自我省察的精神实践是必要的，因为理解我们自身的弱点或缺失是理解他人的同样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都是可能犯错误的、脆弱的、有缺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互相都需要理解。

批评性的自我省察使我们可能把我们相对地移开由我们自身构成的中心，因此认识到和判断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它使我们不再把自己设立为任何事物的法官。[①]

---

① "这是个屄"，"这是个流氓"，是两个既表现了完全的不理解又表现了想成为理智的和道德的至上者的奢望的俗语。

4. 对人类复杂性的意识

理解别人需要一种对人类复杂性的意识。

我们能够从传奇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吸取这种意识：人们不应把一个人化归为他自身的最小部分，或他既往的最坏的片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仓促地把犯下一个罪行的人封闭在罪犯的概念中，同时把他的生活和人格的所有其他方面还原为这惟一的特点，而我们将在莎士比亚的强盗般的国王和黑道电影的国王般的强盗身上发现他们的许多方面。我们能够在像让·瓦尔让[1]和拉斯柯尔尼科夫[2]这样的人物身上看到一个罪人怎样能够转变和赎罪。

我们最后能够从中学到生活中的最重大的教训，对于所有被侮辱的人的痛苦的怜悯和真正的理解。

4.1 主观上对他人的开放(同情)

我们对被珍视的亲人是开放的，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对他人保持为关闭的。电影，通过投射和同化促进最充分地调动我们的主观性，使我们同情和理解那些通常对我们显得陌生和讨厌的人。在街上碰到流浪汉感到厌恶的人，会在电影中以整个身心同情流浪汉卓别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形体上或精神上的悲惨现象几乎无动于衷，但是在阅读小说或观看影片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同情和怜悯。

4.2 宽容的内在化

真正的宽容不是对种种观念的漠不关心或被普遍化的怀疑主

① 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角。——译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主角。——译者注

义。它在以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伦理学的选择为基础的前提条件下,同时接受与我们相反的观念、信念、选择的被表达。宽容意味着接受消极的或根据我们的观点看起来是有害的观念的表达所引起的痛苦,以及承受这种痛苦的意志。

存在着如下四个等级的宽容。第一个等级是伏尔泰(Voltaire)所表述的宽容,它迫使我们尊重别人说出我们感到卑鄙的言论的权利——这不是尊重卑鄙性,这是避免我们强行树立我们自己关于卑鄙性的观念以禁止一种言论。第二个等级与民主的选择不可分离:民主的特性就是它被不同的和对立的意见所滋养。因此民主的原则促使每个人尊重与他的观念相对立的观念的表达。第三种等级是遵从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深刻的思想的对立面是另一个深刻的思想,换言之,在与我们的思想对立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真理,对于这个真理我们必须尊重。第四个等级来自意识到人类被神话、意识形态、观念或神祇所支配,还意识到漂流把个人带到距他愿意前往之处很远的和不同的地方。宽容当然是对各种观念有效,而不是对侮辱、攻击和杀害的行为有效。

5. 全球性的理解、伦理学和文化

我们应该把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伦理学与全球纪元的伦理学联系起来,后者要求把相互理解世界化。将能为人类服务的惟一真正的世界化就是理解的世界化,人类在理智上和精神上的相依共存的世界化。

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学习。骄傲的西方文化曾经自立为进行教导的文化,现在也应该变成进行学习的文化。理解,这也是不断学习和再学习。

不同的文化怎样交流？丸山孙郎给予我们一个有用的指示。[①] 在每个文化中有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分是种族或社会中心主义的，亦即或多或少对其他的文化关闭的。但是在每个文化的内部也存在着开放的、好奇的、非正统的、偏离正轨的思想成分，也存在着一些杂合物即杂交的产物，它们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自然的桥梁。经常，偏离正轨者是一些作家或诗人，他们发出的启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传扬。

当关系到艺术、音乐、文学、思想的时候，文化的世界化不是起均一化作用的。它由一些跨越国家的巨大浪潮构成，这些浪潮在它们内部同时促进民族的独特性的表现。过去在欧洲，古典主义、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些浪潮含有类似的关系。今天，日本的、拉丁美洲的、非洲的小说在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出版，而欧洲的小说也在亚洲、东方、非洲和南、北美洲出版。小说、散文、哲学书籍从一个语言向另一个语言的翻译，使得每个国家可能接触其他国家的作品和用世界的文化滋养自己，同时又用它特有的作品滋养全球文化的培养基。当然，后者汇集了多种多样的文化的独创的成果，但它在每个国家还被限制在不同的有限的范围里。但是它的发展已经是标志着 20 世纪后半叶的一个特点，而在 21 世纪它应将扩大，这将是促进人类之间互相理解的一个王牌。

同时，东方的文化也在西方引起了各种好奇心和探询。西方早已在 18 世纪就翻译了《阿维斯陀》(Avesta)[②]和《奥义书》(Upanishads)[③]，在 19 世纪翻译了孔子的作品和《老子》，但是那时亚洲

① 丸山孙郎：《思想境界：管理中的个人与文化》，载《管理探究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1993 年第 2 卷第 138—154 页，Sage Publicatiou 出版社。

② 波斯古经，古波斯瑣罗亚斯德教经典。——译者注

③ 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所依据。——译者注

产生的思想仍只是博学家考察的对象。只是在20世纪非洲的艺术、伊斯兰教的哲学和神秘、印度的圣书、“道”的思想、佛教思想才变成西方的灵魂的生动的源泉；这时西方的灵魂在行动主义的、生产本位主义的、效率的、玩乐的世界中被驱使和受束缚，向往着内心的宁静和身心和谐的关系。

西方文化的开放性可能对某些人显得既是不理解的又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开放的和自我批评的合理性源出于欧洲文化，使得可能理解和融入那些在其他文化中发展了而在它自身中衰退了的东西。西方也应该在它身上融入其他文化的美德以便纠正无节制的行动主义、实用主义、数量主义、消费主义，这些东西在它的内部和外部泛滥。但是也应该保存、再生和扩张它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它的文化产生了民主制度、人权、对公民的私人领域的保护。

社会之间的理解以开放的民主社会为条件，这意味着不同文化、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理解之路要经由开放的民主社会的普遍化。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即使在开放的民主社会里仍然存在着理解的认识论的问题，为了在那里能够有不同的思想结构之间的理解，应该能够过渡到一个思想的元结构里去，这个思想的元结构理解彼此不理解的原因并能超越它们。

理解既是人类交往的手段又是目的。全球需要在一切方面的相互理解。鉴于教育理解对于所有的教育层次和所有年龄的受教育者的重要性，发展理解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思想状态的改革。这应该是未来的教育的工作。

第七章　人类伦理学

如同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人类的复杂概念包含着“个人←→社会←→族类”的三联式。个人不仅是人的族类的繁殖过程的产物，而且这个过程也是由个人在每一代中生产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而社会又反馈作用于个人。文化，在总体的意义上从这些相互作用中涌现，又重新连接这些相互作用和给予它们以价值。因此，“个人←→社会←→族类”在丰富的意义上彼此维系：相互支持、相互滋养和相互连接。

如此，“个人←→社会←→族类”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彼此是共同产生者。每个这一项都既是其他项的手段又是其他项的目的。人们不能将其中任何一项绝对化和使它单独成为三联式的最高目的；是三联式本身旋转地成为它自己的目的。这些要素又不能因此被理解为是分离的——任何人类的概念都意味着个人的自主性、对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和归属于人的族类的感情这三者的联合的发展。在这个复杂的三联式中涌现了意识。

从而，一个特有的人类的伦理学，亦即人类伦理学(anthropo-éthique)，应该被考虑为是“个人←→社会←→族类”这三项的圆环的伦理学，从这里涌现了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特有的人类精神。这就是教授未来的伦理学的基础。

人类伦理学以如下的自觉的和明确的决心为前提：

◆ 在我们的存在的复杂性中自觉地接受“个人←→社会←→族类”的人类处境。

◆ 在我们的个人意识中完成我们身上所具有的人类性。

◆ 承受人类命运的矛盾性和丰富性。

人类伦理学告诉我们接受新千年的人类使命：

- 为人类的人性化而努力；
- 实行全球的两个示范工作：顺从生命，引导生命；
- 实现全球在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 尊重他人与自己的区别和与自己的同一性；
- 发展相依共存的伦理学；
- 发展相互理解的伦理学；
- 教授人类的伦理学。

人类伦理学因此负载着完成作为全球的意识和公民资格的人类性的期望。它因此如同任何伦理学一样包含着一个向往和一个意志，但也包含着一个在不确定性中的博弈。它是超越个人性的个人意识。

1. 个人←→社会的圆环：对民主的教育

个人和社会是相对存在的。民主制度使得个人←→社会之间可能存在丰富和复杂的关系，在其中个人与社会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调整、相互控制。民主制度建立在被控制者对于权力机器的控制的基础上，从而减少屈从(这个屈从是不遭受它所控制的人们的反馈作用的权力所造成的)。在这个意义民主制度胜似一种民主制度，它是下述复杂的反馈的圆环的持续的再生：公民们产生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产生公民们。

与依靠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负责化而运行的民主社会不同，专制的或极权的社会侵占只是作为臣民的个人。在民主制度中，个人是公民、负责任的法人，他一方面表现他的意愿和他的利益，另一方面他是负责任的和与他的国家休戚与共的。

1.1　民主制和复杂性

民主制度不能以简单的方式来定义。人民作为公民的主权同时包含着对这个主权的自我限制，因为需要遵从法律和把主权转移给当选者。民主制度同时包含着对国家的统治的自我限制，这表现为权力的分割、保障个人的权利和维护私人生活。

民主制度显然需要公民中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和遵守民主规则。它需要最大多数的公民信任民主制。但是，民主制在需要一致意见的同时，也需要多样性与对立性。极权政体的经验突现了民主制度的关键特点——它与多样性的必不可少的联系。

民主制度以利益的多样性以及观念的多样性为条件同时又滋养着它们。尊重多样性意味着不能把民主制与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视为同一，它应该包含少数派和抗议者的存在和表达的权利，它应该使异端的和离轨的观念的表达成为可能。如同必须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以捍卫生物圈一样，必须保护观念和意见的多样性以及信息来源和信息手段（出版业、新闻媒体）的多样性以捍卫民主生活。

民主制度同时需要观念和意见的冲突，它们给予它生命力和创造性。但是冲突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只能在服从民主的规则的范围内充分发展。民主的规则调节对立，用观念的战斗来代替肉体的战斗，并通过辩论和选举来决定相冲突的观念中的暂时的胜利者；后者作为交换条件，有义务说明其观念的应用。

因此，民主制度同时要求一致性、多样性和对立性，它是一个政治的组织和文明的复杂的系统。它滋养着个人的精神的自主性、他们的持有个人意见的和表达的自由、他们的公民责任感，又被这些东西所滋养。它滋养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又被这个理想所滋养，这个理想包含着它的不可分离的三项之间的创造性的对立。

民主制度因此在下述意义上构成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它生活在多元性、竞争和对立之中，同时仍保持为一个共同体。

由是，民主制构成了联合与分裂的统一，它容忍给它以生命力的对立，经常地、有时是突发地用它来滋养自己。它经验着多元性，包括在国家的顶峰(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应该维持这种多元性以便维持它自身。

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复杂性的发展滋养了个体性的发展，个人在这个环境中肯定了自己的权利(人权和公民权)，在这之中获得了存在的自由(对配偶、住处、消遣活动等等的自主的选择)。

1.2 民主的两重性逻辑(dialogique)

因此，民主制度的所有重要特征都具有一个以互补的方式联结对立的项目的两重性逻辑的特点：共识/对立，自由⟷平等⟷博爱、国家共同体/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最后，民主制度取决于依赖着它的行使的条件(公民精神，对民主游戏的规则的接受)。

民主制度是脆弱的，它生活在冲突中，而后者可能把它吞没。民主制度还没有在整个行星上普遍化，我们的地球还含有许多专制政体和20世纪的极权制度的残余或新极权制度的萌芽。它在21世纪仍将受到威胁。此外，现有的民主政体并不完满，还是不完全的或未完成的。

西方的民主化曾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某些领域如妇女获得与男人在配偶关系中、在工作上、在获得公职的机会上的平等，进展很不规则。西方的社会主义未能成功地使我们社会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民主化。企业仍然是等级制的专制的系统，只在基层通过一些委员会或职工会实现了很局部的民主化。当然在某些其效率建立在服从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组织，如军队里，存在着民主化的极限。但是人们可以寻思，是否如某些企业所发现的那样，

人们可能依靠个人或班组的首创性和责任感获得另一种效率。总而言之，我们的民主制度包含着缺陷和空白。因此，有关的公民未在比如说有关交通的选择方案(高速火车、大型运载飞机、高速公路等等)上受到咨询。

并不是只有民主制的未完成的问题，还存在着民主倒退的问题。后者趋向于阻止公民们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理由是这些决策的采取十分“复杂”，应该由治国的高级技术“专家们”来把握)，使他们的能力衰退。这威胁着多样性，使公民责任感下降。

这个倒退的过程与问题的复杂性在增长而仍用残缺的方式来处理它们有关。政治被分割为不同的领域，把它们一起加以认识的可能性在减弱或消失。

同时，存在着政治的非政治化的趋向，它自我消解到行政管理、技术(专业知识和技能)、经济、量化的观念(民意测验、统计)中。破裂的政治失去了对生活、痛苦、忧虑、孤独、不能量化的需要的理解。所有这些促进了民主的巨大倒退，公民们变得被剥夺了关心国家的基本问题的权利。

1.3　民主的未来

21世纪的民主制将越来越面临由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问题，在这个机器中科学、技术与官僚制度紧密联结。这个庞大机器并不是只产生知识和明智，它也产生无知和盲目。科学的学科性的发展不是只带来了劳动分工的好处，它也带来了超级专业化、知识的分裂和隔绝的弊端。知识愈益变成行业性的(只有专业人员可以触及)和非人化的(被集中在数据库里，由一些隐名的机构为国家的第一首脑加以利用)，另外，技术知识被保留给专家们，他们在一个封闭的领域内的能力伴随着在该领域受到外部影响的干扰或被一个新事件的发生改变时所产生的无能。在这种条件下，公民失去了认识的权利。他们有经过专门安排的学

习获得一个专业知识的权利，但是他们被剥夺了作为公民拥有任何总体的和恰当的观点的权利。比如核武器，完全剥夺了公民思考它和控制它的可能性。它的使用一般都交由国家领袖一人的决断，不需咨询任何正规的民主机构。政治愈是变成技术的，民主的权能愈是倒退。

问题并不仅仅由于危机或战争而存在，它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技术官僚制度的发展在所有的领域里建立了专家的统治，而这些领域在此以前都属于政治的讨论和决策的范围。现在在向关系到父性、母性、出生、死亡的问题的生物学操纵开放的领域里，专家统治排挤了公民。这些问题在20世纪既未进入政治意识也未进入民主讨论之中，除了若干例外。

更深刻地说，在超级专业化的深奥的技术科学和公民之间的加深的鸿沟，造成了认识者——他们的知识是被分割的，不能背景化和总体化——和无知者亦即全体公民之间的二元性。这样，在一个“新阶级”和公民们之间的社会分裂被创生。同样的过程也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在掌握新的通讯技术方面进展。

公民们被抛离日益由“专家们”大权独揽的政治领域，“新阶级”的统治实际上阻止了认识的民主化。

在这种条件下，把政治还原为技术和经济，把经济还原为增长，失去了方位标和视野。所有这些导致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削弱，逃避到私人生活中，交替处于麻木状态和激烈反叛中。这样，民主的制度尽管被保持着，民主生活在衰败。

在这种形势下，在被视为民主的社会内部存在着重新产生民主的必要性，而在世界的很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产生民主的问题。而全球的需要要求我们在它的范围内产生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可能性。

民主的再生以公民感的再生为条件，而公民感的再生以共生

意识和责任心的再生为条件，而这就意味着发展人类伦理学。[1]

2. 个人⟷族类的圆环：教授地球公民资格

个人对人的族类的伦理学联系从古代文明起就被肯定。是拉丁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ce）[2]在公元前 2 世纪让他的作品《自己的刽子手》中的一个人物说："homo sum,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类，没有任何人类的性质跟我是无关的"）。

这个人类伦理学曾被各种封闭的文化的伦理学所遮掩、变模糊、缩小，但它不断地在普救主义的伟大宗教中被保持，并在世界主义的伦理学、在人道主义、在人权、在康德的绝对命令中重新涌现。

康德已经说过：我们地球的地理上的有限性给它的居民们规定了一个善待普天下客人的原则，承认别人有不被作为敌人对待的权利。从 20 世纪起，地球命运共同体给我们规定了相依共存的根本原则。

---

① 我们最后可以思考学校是否可能实际地和具体地成为民主生活的实验室。当然，这涉及有限的民主，因为教师不能由他的学生们来选举，学生必要的集体的自律不能取消要求他们服从的纪律，这也是因为不能取消在教导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原则上的不平等。

但是（总而言之，少年人的班级所获得的自主性也有这个需要），权威不能是无条件的。并且还可能建立一些规则对被认为是专断的决定进行质疑，这主要由建立被学生选举出来的班级委员会来进行，或甚至借助一个外部的仲裁机构。在 1999 年进行的法国中学的改革中建立了这种机制。

但是班级尤其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所，学生在那里学习进行论证的辩论，掌握辩论所必要的规则，意识到理解别人的思想的必要性和程序，倾听和尊重少数者和异议者的声音。因此，学习理解应该在对民主的学习中起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

② 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公元前 186/185—161。——译者注

3. 表现为全球共同命运的人类性

全球命运的共同体使得可能承担和完成人类伦理学的这个部分,它关系到个别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之间的关系。

它应该为下述目标努力工作,使人类在不停地保留为人的生物—繁殖的实体的同时,在个人和社会的协助下,发展和最终具体地产生作为人类的共同意识和全球的相依共存性的人类性。

人类已停止成为一个单纯生物学的概念,同时又应该充分地承认它是被不可分离地包含在生物圈中的。人类也停止成为一个无根的概念:它是扎根于一个"祖国"[1],即地球的,而地球是一个处于危险中的祖国。人类已停止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个生存的实在,因为今后它将第一次被死亡所威胁。人类也已停止作为一个仅仅是理想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只有对于这个共同体的意识可以把它引向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性今后尤其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它是那应该被全体人和所有每个人实现的东西。

当人类在自我毁灭的威胁下继续他的探险的时候,伦理学的绝对律令变成:通过实现人类性来拯救人类。

肯定的是,人类的统治、压迫、野蛮在我们的星球上依然存在并且在加重。这涉及根本的人类—历史的问题,对之没有先验的解决办法,但是存在着改善的可能性。只有能够处理多方面的过程的方法趋向于使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社会以及地球文明化。

---

① 或故园。——译者注

只有一个为了人的政治[①]、一个关于文明的政策[②]、一个思想改革、人类伦理学、真正的人道主义、对地球—祖国的意识，它们联合起将减少世界上的丑行。

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参阅第三章)，个人的充分发展和自由表现构成全球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目标。这以下述两者为条件："个人←→社会"的关系在民主意义上的发展和"个人←→族类"的关系在实现人类性的意义上的发展。这意味着个人总是被整合在"个人←→社会←→族类"这个三联式的各项的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打开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大门的钥匙。我们也不知道被画好的路线。"El camino se hace al andar"[③](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④])。但是我们可以指出我们的目标：经由获得地球公民籍，从原人进化过程(hominisation)进入到人类进化过程(humanisation)。为着实现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全球共同体：这难道不就是一个真正的"联合国组织"的使命吗？

---

① 参阅埃德加·莫兰：《为了人的政治之导论》，新版，Seuil 出版社，"Points"丛书，1999 年。

② 参阅埃德加·莫兰和萨米·纳伊尔(Sami Naïr)：《关于文明的政策》，Arléa 出版社，1997 年。

③ "在行进中开辟道路。"(原文为西班牙文。——译者注)

④ 西班牙抒情诗人，1875—1939。——译者注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这个建议和思考的文本不包含参考文献目录，一方面是因为《七种知识》的范围所依据的可观的参考文献不可能纳入这样篇幅的出版物中，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硬性地提出一个简短的经过筛选的参考文献目录。对于任何感兴趣的读者，允许他们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判断。最后，每个国家都拥有源出于它们自身文化的著作，不存在在认为需要筛选的情况下把它们加以排除的问题。

构造得宜的头脑

此书献给全体人和每个人，但可能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特别有助益。我尤其寄希望于被教育者，当他们有幸看到此书时如果正值教育令他们感到厌倦、沮丧、被压垮或绝望之际，他们可以利用本书的提示把他们的自我教育掌握在手中。

前　　言

> 我如此向往继续进行我的纯粹人文的学习，但是知识既未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也未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是啊，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所有事物的和谐有多好哇！但是任何科学的开端和结尾不都是被晦暗所笼罩吗？或者我应该使用我所有的资质、精力、甚至毕生来认识某种昆虫，或知道把某个植物归入一系列的类别之中吗？
>
> 克莱斯特(Kleist)[①]：《致一友人书》

我最近十年的历程导致我完成这本书。由于愈益坚信改革思想的必要性以及从而产生的改革教育的必要性，我利用各种机会反复思考有关的问题。我曾经在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雅克·兰(Jack Lang)的建议下，发表了《关于现代的〈爱弥尔〉的几点看法》。我还曾经考虑写一本《小学生、教师和公民的教科书》，并且至今没有放弃这个计划。此外，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和一些外国大学为我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我都根据情况在我的讲话中表达我关于教育的理念。

1977年夏季受聘担任《教育世界》杂志关于大学的专刊的"特邀主编"时，我开始系统地提出我的观点。嗣后在12月，教育部长克劳德·阿莱格尔(Claude Allègre)邀请我主持一个筹划改革中学

---

① 德国作家和戏剧家，1777—1811。——译者注

的知识教育的"科学委员会"。得力于迪迪埃·达肯阿-卡斯泰尔(Didier Dacunha-Castelle)的支持，我组织了借以表现我的设想的可行性的几个专题讨论日。[1]但是这些设想后来遭到了如此强烈的抵制，以致包含我的提议的报告被彻底推翻。

但是我的思考不可抗拒地继续前行，目前这本书就是我继续工作所得到的结果。[2]

我希望在书中我是从我认为最紧迫又最重要的问题出发，并且指出了解决它们的途径。

我希望我是立足于社会的目标，并表明了小学的、中学的和大学的教育如何可能为这些目标服务。

我希望表明对问题的解决和对目标的追求必然导致改革思想和改革教育制度。

没有读过我的书而根据狭小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判断我的人认为我思想古怪，因为我提出一种名为复杂性的神奇药水作为包医精神百病的药剂。其实正相反，复杂性对于我来说只是我一向主张加以迎接的挑战。

本书实际上同时探讨了培育(éducation)和教育(enseignement)的问题。这两个词汇在相互涵盖的同时也相互区别。

"培育"是一个含义较深的词，意为："实施适宜的手段以保证一个人的养成和发展，以及这些手段本身。"(《罗贝尔(Robert)词典》)"养成"(formation)一词具有塑造和规范化的含义，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教导的任务是在唤醒、激起和促进精神的自立的过程中鼓励自我教导。

---

① 这些讨论日中的报告由 Seuil 出版社在 1999 年以《连接知识》为名集书出版。

② 我感谢让-路易·勒穆瓦(Jean-Louis Le Moigne)和克里斯蒂娜·佩隆-邦让(Christiane Peyron-Bonjan)在重读我的文稿中所提出的批评意见。

“教育”是向一个学生传授知识使之加以理解和掌握的艺术或行动。此词的含义比较狭窄,因为只涉及认识的问题。

老实说,“教育”一词对我是不够的,而“培育”一词又包含着一个过分之处和一个不足之处。在本书中,我将在这两个词语间曲折穿插,脑子里想着培育式的教育。

这个教育的任务不是传授纯粹的知识,而是传授使我们据以理解我们的地位和帮助我们进行生活的文化;它同时促进一种开放的和自由的思维方式。

克莱斯特说得有理:“知识既未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也未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

但是培育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优秀,而如果没有变得更加幸福的话,至少也教会我们担承我们生活中的散文般枯燥乏味的部分和享受其中诗歌般充满情趣的部分。

第一章　挑　　战

我们当前的大学在全世界培养了比例过大的各个学科的专门家，这些学科是预先被确定的，因而是人为地被限制了的。然而当今的大部分的社会活动，包括科学的发展本身，都要求既具有广阔得多的视角、又能够深刻地对问题进行聚焦的人才。此外新的进步也在不断地打破学科间历史的疆界。

里希纳诺维奇(Lichnerowicz)①

我们的知识是在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现实或问题愈益变成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

在这种局势下下述事物被掩盖了：
复杂的整体，
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互动和反馈作用，
多维度的实体，
最根本的问题。

事实上超级专业化(hyper-spécialisation)②阻止看到(被它分

① 法籍波兰裔数学家，1915 年生。——译者注

② 亦即把自己关闭在自身之中的专业化，它不允许把自身整合到关于对象的总的研究领域或整体观念中，它只是看到该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

割为碎片的)整体的东西和(被它消解的)根本的东西。但是根本的问题从来不是片段的,而总体问题愈来愈带有根本性。此外,所有的特殊问题只能在其背景中被正确地提出和思考,而这些问题的背景本身也应该愈益在全球中的背景被标示出来。

同时学科的剪切也使得不可能理解"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亦即复杂性(根据此词原始的含义)。

整体性的挑战因此同时是复杂性的挑战。确实,当构成一个整体的不同成分(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情感的、神话的因素)不可分离时,当在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反馈的组织时,就存在着复杂性。而为我们的世纪和我们的全球纪元所特有的各种发展使我们愈来愈经常地和愈来愈不可避免地面对复杂性的挑战。

如同奥雷利奥·帕契伊(Aurelio Peccei)[①]和池田大作[②]所说:"还原论的研究在于依赖惟一系列的因素来解决由我们当前经历的多方面的危机所提出的问题的整体,它与其说是一种解决方法,不如说是问题本身。"[③]

的确,只知分解的理智把世上的复杂事物割裂为分离的片段,把问题加以切分,把多方面的事情单方面地加以对待。它扼制了理解和反思的可能性,也消除了获取一个可修正的判断或一个长远的观点的可能性。它对于处理我们最严重的问题的缺陷构成了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从而,问题愈是成为多方面的,它愈是不能思考它们的多维性;危急局势愈是进展,思考危机的无能为力也愈是进展;问题愈是变为全球性的,它们也愈是变得难以思

① 意大利企业家,"罗马俱乐部"的两个创始人之一,1900—1983。——译者注

② 日本佛教思想家,国际创价学会会长,1928年生。——译者注

③ 《对于21世纪的报警呼喊:奥雷利奥·帕契伊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录》,PUF出版社,1986年。

考。一个不能考虑背景环境和全球复杂性的理智将导致盲目、轻率和不负责任。

因此，科学的学科性的发展不只是带来了劳动分工的优点，它也带来了超级专业化以及知识的分割和隔离的弊病；它不只是产生了知识和明了，它也产生了无知和盲目。

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用起矫正作用的东西来抵制这个发展，而是服从于它。从小学起它就教我们孤立对象(于其环境)、划分学科(而不是发现它们的联系)、分别问题(而不是把它们加以连接和整合)。它训导我们把复杂化归为简单性，也就是说分解联系起来的东西，进行解析而不是进行合成，消除任何给我们的知性带来无序或矛盾的东西。[①]

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头脑会失去他们把知识加以背景化和在它们的总体中把它们加以整合的自然的禀赋。

而合理的认识是这样一种认识，它能够把任何信息都在其背景中和(如果可能的话)其所属的整体中加以定位。人们甚至可以说认识主要不是依靠精确化、形式化和抽象化而进步的，而是依靠实行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而进步的。因此，经济科学是最精确化和最形式化的人类科学，但是经济学家们很难在他们的预言上取得一致，而这些预言又常常是出错的。为什么？因为经济科学自我孤立于与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人类的和社会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如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所说："今天的许

① 进行解析、隔离的思想使得专业人员和行家在他们的箱格中可以很有效能地工作，在认识不复杂的部门(特别是关系到人造机器的运转的部门)中也能有效地进行合作。但是如果他们所遵循的逻辑扩展到社会和人类关系中，那人造机器的非人性的约束和机制，他们的决定论的、机械论的、量化的和形式主义的世界观，会无视、遮蔽或消解任何主体的、情感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东西。

多功能障碍都来自经济政策的同一缺失：拒绝面对复杂性"[①]……此外经济科学还不能思考不能量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的热情和需要。因此经济学同时是数学上最先进的和人文上最落后的科学。海克(Hayek)[②]说过："没有一个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大经济学家。"他甚至补充道："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会变得有害无益，甚至构成一个真正的危险。"

因此我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应该从下述两个考虑出发：一方面是知识的箱格化和无能把它们彼此连接起来所导致的愈来愈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是背景化和进行整合的能力本是人类精神一个基本的品质，它应当得到发展而不是使之衰退。

在整体性和复杂性的挑战的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挑战，这就是不可控制的知识膨胀的挑战。知识的不间断的增长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巴别塔(tour de Babel)，其中散发出不和谐的各种语言的喧嚣。[③]塔楼统治着我们，因为我们不能统治我们的知识。T.S.艾略特(Eliot)[④]说："我们在信息中失去的知识在哪里？"知识只是作为信息间建立联系和把信息纳入背景的组织才成为知识。信息则构成分散的知识的碎片。到处，在科学中如同在传播媒介中，我们被信息所淹没。甚至最狭小的学科内的专家最终也不能理解他们领域中的信息。知识的空前激增愈来愈逃脱人类的控制。

此外，如同我们讲到过的，被分割的知识只适于技术应用。它

---

① 见其书：《被禁止的辩论：货币、欧洲、贫困》，Arléa 出版社，1995 年。

② 英籍奥裔经济学家，1899—1992。——译者注

③ 巴别塔与《旧约·创世纪》中的故事有关。诺亚的子孙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在巴比伦)地方计划修建一座大塔，上可通天。上帝不喜欢他们的目的和做法，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说话互相不懂，塔就无法建成。此后他们散居各地，各说各的方言，人类的语言从此不统一。造塔的地方名"巴别"，希伯来文的字根是"变乱"的意思。——译者注

④ 英籍美裔作家，1888—1965。——译者注

们不能相互结合起来以滋养一种能够考察人类在生命内部、在大地上、在世界中的地位和能够迎击我们时代的伟大挑战的思想。我们进而不能整合我们的知识以指导我们的生活,从而展现了艾略特话语的第二部分的意思:"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智慧在哪里?"

我们上面指出的三个挑战把我们引导到关于知识的组织的基本问题上,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考察。我们在此揭示从上述三个挑战中产生的下述连锁性挑战。

文化的挑战

文化从此不仅被剪裁为散开的碎片,而且被分裂为两大块。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巨大分裂从19世纪开始而在20世纪更加严重,这给两者都招致了严重的后果。人文文化是一种总体文化,它通过哲学、杂文、小说滋养了一般智能,回应人类的伟大探询,刺激对于知识的思索和促进认识的个人的整合。科学文化具有另一种本性,它分割了认识的领域;它产生了可赞叹的发现、天才的理论,但是没有导致对人类的命运和科学本身的变迁的思考。人文文化趋于变成失去被磨的谷粒而空转的磨盘,这些谷粒原是由关于世界和关于生命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构成的,后者本应滋养人文文化的伟大探询;而科学文化失去了对普遍的和整体的问题的反思性,甚至变得没有能力反思自身和思考它提出的社会的和人类的问题。

技术的和科学的世界只把人文文化看作装饰物或审美的奢侈品,而实际上人文文化促进西蒙(Simon)[①]所说的 general problem

---

①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16年生。——译者注

solving，亦即人类精神应用于各种特殊场合的一般智能。人文文化则在科学中只看到抽象的或令人生畏的知识的集合体。

社会学的挑战

遭受三个挑战的领域不断扩展，这是由于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的认识的特点在增长，特别是由于被不适宜地称为信息技术的人工脑—神经系统的普遍化的和多样性的发展，这些系统已开始与我们所有的活动共生。从而下述情况愈演愈烈：

信息成为认识必须掌握和整合的原料；

认识必须不断地被思想复核和修正；

思想前所未有地成为个人和社会的最珍贵的资本。

对公民的挑战

总体观的削弱导致责任感的削弱，因为每个人都力图只对他的专业化的任务负责，此外这还引起共存意识的削弱，因为每个人不再感受到他与他的国家和同胞的有机的联系。

由于专家、行家、技术人员把对日益增多的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处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民主的亏损在不断增长。

知识变得愈来愈深奥（只有专家可以问津）和抽象（量化和形式化）。同样地，技术知识被保留给专业人员，而他们在一个封闭领域内的技能与他们在该领域受到外部影响干扰或被新事件改变时所产生的无能相伴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公民失去了认识的权利。他们有着在特设的学校中获得专业知识的权利，但是他们被剥夺了作为公民应该具有的任何总体性的和合理的观点。如果说他们还有可能在交际的咖啡馆里讨论国家的事务，他们已不再可能理解爆发亚洲金融崩溃的原因和阻止这个金融崩溃引起严重的

经济危机的方法;再说,专家们本身也在对形势的诊断和在应该采取的经济对策的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如果曾经可能利用插在地图上的小旗来跟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那么现今已不可能想像预测战争情景的电脑的计算和模拟。原子武器完全剥夺了公民思考它和控制它的可能性。它的使用被交给惟一的国家首领的个人决断来决定,无须咨询任何正规的民主决策机构。政治愈是变成技术性的,民主的权能愈是萎缩。

当前的技术—科学化过程(也是科学家本身的意识和意志不能控制的盲目的过程)的继续,导致了民主的大幅度的倒退。因此,在专家们丧失了设想整体的东西和根本的东西的能力的时候,公民们失去了认识的权利。从这时起,知识的被剥夺只是得到大众传播媒体的通俗化宣传的很差劲的补偿,这提出了今后至关重要的关于认识的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历史性的问题。

当前不可能把在本性上被隔离的和行业化的知识加以民主化。但是难道今后不可能考虑一种思想的改革,它使得我们可能走出如下的二者择一的两难困境:或者接受由报纸、广播、电视每天如下雨般向我们倾注的无数信息所构成的爆炸,或者让我们去信赖这样一些学说,这些学说只保留那些证实它们的观点或从它们的观点看来是可理解的信息,而把所有否认它们的观点的或从它们的观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信息作为错误或幻想抛弃掉。思想改革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对日常生活的世界的认识中,而且也存在于对任何人类事物的认识中和科学认识的本身之中。

挑战的挑战

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迎接我们刚刚加以考察的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

只有思想的改革使我们可以充分运用我们的智能来回应这些

挑战，并使我们可能把两个分离的文化连接起来。有关的改革不是程序上的，而是范式上的，它关系到我们组织知识的能力。

迄今设想的所有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的，在这个黑洞中存在着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从而还有我们的教育的深刻的需要。这些改革没有觉察到这个黑洞的存在，因为它们源出于需要加以改革的那个类型的理智。

教育的改革应当导致思想的改革，而思想的改革应当导致教育的改革。

第二章　构造得宜的头脑

人们并未教人们如何做一个明哲的人，而教了他们所有其他的东西。

帕斯卡(Pascal)

我们学校的目标是教会对思想进行反思，重新审察以为已知的东西和怀疑自己的疑问，这是开始相信某种东西的最好方式。

胡安·德·迈雷纳(Juan de Mairena)

教育的第一个目标是由蒙田(Montaigne)[①]提出的：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胜过一个充满知识的头脑。

"充满知识的头脑"的含义是清楚的：在这个头脑里知识被堆积、装满，但不具有一个给它们以意义的选择和组织的原则。"构造得宜的头脑"意味着：与其积累知识，更重要得多的是同时具有下述两者：

提出和处理问题的一般能力，

一些能够连接知识和给予它们以意义的组织原则。

一般能力

我们想到 H. 西蒙所说的人脑是一个 GPS，即 general problems

①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1533—1592。——译者注

setting and solving。与当今广泛流传的意见相反，精神的一般能力的发展使得可能更好地发展特殊的或专业的技能。一般的智能愈是强，处理特别的问题的能力就愈是大。教育应该促进精神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自然的禀赋，和相应地激励一般智能的充分运用。

这个充分运用必然包含着幼年期和青少年期的最充沛和最生动的天性的自由的发挥；这涉及十分经常地被训导所扑灭的好奇心，[①] 而问题是应该相反地刺激这个好奇心，或者唤醒它（如果它仍沉睡）。问题是从早年起就要鼓励和磨砺探询的禀赋，并把它引导到关于我们自身地位和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上去。

这种品质当然不能被编写在一个程序中，它只能由教育者的热忱来激发。

一般智能的发展需要把它的发挥与怀疑联系起来，[②]后者是任何批评行动的酵母，它如同胡安·德·迈雷纳所指出的，使得我们能够"反思思想"，而且它还包含着"对于自身的怀疑的怀疑"。它需要借助 ars cogitandi[③]，后者包括正确使用逻辑、演绎、归纳——推理和论辩的艺术。它还包含着古希腊人称之为 metis[④]的智能，[⑤] 即"思想态势的总体……它组合了嗅觉、洞察力、预见、思想的灵活性、多谋、警惕、窥伺机会。"还必须借鉴伏尔泰（Voltaire）和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机智，然后研习古生物学家和史前学

① 让我们回想一下好奇心在整个被培养的年代里逐渐被窒息的悲惨状况，它或者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这个范围也就是未来的成年人的专业化的范围。

② 蒙田引用但丁的话说："怀疑令我愉悦不亚于知晓。"

③ 拉丁文：思想的艺术。——译者注

④ "杂拌"。——译者注

⑤ M.德蒂埃纳（Detienne）和 J.P.韦尔南（Vernant）：《智慧的狡黠：古希腊的杂拌》，Flammarion 出版社，1974 年；"Champ"丛书，1986 年。

家的技艺，以便学会“发现意外珍奇事物的本领”(sérendipidité)，这是把表面上不起眼的细节转变为一些可以再现整整一段历史的征象的艺术。

因为明智地使用一般智能在人文文化以及科学文化的所有领域都是必要的，当然更不要说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应该突出“明智地思维”(bien penser)，而这决不会导致变成事事想到的(bien-pensant)。

显然包含计算的数学教育将既在计算之内又在计算之外进行。它应该表明数学内在的探索的本性。计算是数学推理的工具，而数学推理实施于 problem setting (建立问题)和 problem solving(解决问题)，而这都关系到表明“完美的严谨性和不可更易的逻辑”[①]。在整个教学的年代里，应该逐步阐明数学思维与科学认识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说明形式化和量化的极限。

哲学应该卓异地协助发展质疑的精神。哲学首先是一个探询和反思的力量，指向关于认识和人类地位的重大问题。哲学在今天已经狭窄化为一个基本关闭在自身之中的学科，它应该重建与自亚理士多德到柏格森和胡塞尔视为自身使命的那个哲学使命的联系，而并不因此抛弃它特别的研究。因此，哲学教授在进行他们的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应该既在科学知识上又在文学和诗歌上实施他们的反思和探询的能力，同时又以科学和文学滋养自身。

---

① 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马尔多罗的歌声》，见其《全集》，Losfeld 出版社，1971 年，第 114 页。

知识的组织

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是善于组织知识从而避免知识的无效堆积的头脑。

所有的知识同时构成一种翻译和一种重构，它们从信息、符号和象征出发，采取表象、概念、理论、表述的形式。知识的组织（它依据的原理和规则不在此处审视）[①]包含连接（结合、包含、蕴涵）和分解（区别、对立、选择、排除）的操作。过程是循环的：从分解过渡到连接，从连接过渡到分解；此外，从分析过渡到综合，从综合过渡到分析。换言之，认识同时包含着分解和连接，分析和综合。

我们的文明从而我们的教育注重分解而忽视连接，注重分析而忽视综合。连接和综合在这里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因此，分解和无联系地积累知识受到重视，以致忽略了连接知识的组织的作用。

由于我们的认识模式把对象彼此分开，所以我们需要设想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由于我们的认识模式把对象孤立于它们的自然环境和它们构成其部分的整体，所以出于认识的必要性，我们需要把特殊的知识放置到它们的背景中和把它们在一个整体中定位。确实，认知心理学证明了认识的进步主要地与其说是由于特殊知识的精确化、形式化和抽象化，不如说是由于愈益能够把这些知识整合到它们的背景中和它们的总体中。因此，发展把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变成对教育的绝对要求。

背景化能力的发展趋向于促成一个"生态化"思想的涌现，所

① 参看莫兰《方法》第3卷《认识的认识》和第4卷《思想观念》，Seuil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236号和303号。

谓“生态化”思想意指这个思想把任何事件、信息或知识放置于它们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这个环境是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当然还是自然的。它不仅把一个事件定位于其背景，它也促使看到这个事件怎样或者改变这个背景，或者另样地说明这个背景。这样一个思想不可避免地变成复杂性的思想，因为它不满足于把任何事物或事件纳入一个“框架”或一个“视界”之中，而总是寻求在任何现象与其背景之间的相互的、反馈的作用的关系，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局部的改变怎样在整体上引起反应，和一个整体的改变怎样在各个部分上引起反应。这同时涉及看到多样性内部的统一性和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比如看到经由个人的和文化的多样性而存在的人类的统一性和经由人类的统一性而存在的个人的和文化的多样性。

最后，连接起来的思想使自己本身向各种背景的背景亦即全球性的背景开通。

为了走上这条途径，问题与其说是打开学科之间的疆界，毋宁说是改变产生这些疆界的东西——认识的组织原则。

帕斯卡早已提出进行连接的绝对要求，今天应把它们引入我们的任何教育之中，从小学开始：“任何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受到作用又施加作用，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所有事物，包括相距最遥远的和最不相同的事物，都被一种自然的和难以觉察的联系维系着。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思想录》，Brunschvicg 出版社，第 2 卷，第 72 页)为了进行局部的思考必须知道进行整体的思考；同样地，为了进行整体的思考，也必须知道进行局部的思考。

这个关键问题依然留存：能够说明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看清连接相距最遥远的和最不相同的事物的自然的和难以觉察的联系的原则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设想同一事物既是原因又

是结果、既承受作用又施加作用、既间接存在又直接存在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们将在第八章《思想的改革》中简要地指明它们。

一种新科学精神

20世纪的第二次科学革命①在今天可以促进形成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这个革命于60年代在好几个战线开始，实行了导致把直到当时被片段化和箱格化的知识加以连接、背景化和整体化的重大合并，使得此后可能非常有成效地把学科彼此连接起来。

科学的学科在以前的发展一直是愈益分割和隔离知识的领域，以致打碎了人类的重大探询总是指向它们的自然实体：宇宙、自然、生命和处于最高界限的人类。新的科学如生态学、地球科学、宇宙学都是多学科的或跨学科的：它们的对象不是一个部门或一个区段，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②形成一个有组织③的整体。

① 第一次科学革命在该世纪初发生于微观物理学的领域里(参看第5章第1节)。

② 系统论的概念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渐吞食还原论的知识的有效性的。一般系统论由冯·贝塔朗菲在50年代提出，它从下述事实出发：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大部分事物以及原子、分子、细胞、机体、社会、天体、星系都形成系统，亦即由一系列不同的部分构成的有组织的整体，从而重新发现了一个在过去也时常被提出的观念：一个整体大于构成它的部分的总和。在同一时代，控制论建立了关于具有信息程序和调节装置的机器的组织的最初一些原理，对于这种机器的认识也不能化归为对它的构成部件的认识。如同我已指出的(见《方法》第1卷《自然的自然》，Seuil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123号，特别在第101—116页上)，系统的组织产生部分在孤立地被认识时所没有的性质或特点——"涌现"(émergence)。因此，生物的特性是在它的孤立的分子构成成分的层次上不可认识的，它们在组织上和通过这个组织而涌现，它们还反馈作用于这个组织的构成分子。产生于学科性科学的陈规是如此强大，以致系统论的思想长期被闭拒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外，直到今日还依然处于边缘地带。

③ 如同我在其他地方(见《方法》第1卷，同上，第94—106页)指出的，系统和组织的概念是相互凭借的。

它们重建了从相互作用、反馈作用、相互—反馈作用出发构成的总体，这些总体构成了自我组织的复杂实体。同时，它们复苏了自然的实体：宇宙(宇宙学)、地球(地球科学)、自然(生态学)、人类(经由研究原人进化的漫长过程的新史前学加以说明)。

因此，所有上述科学打破了用基本元素进行解释的陈旧的还原论的教条，它们着眼于部分与整体在其中相互产生和相互组织的复杂的系统，而在宇宙学中，复杂性更超出了任何系统。

已经存在有多维度的科学，比如地理学，它的探究从地质学开始直到经济的和社会的现象。也有演变为多视角的科学，比如历史学。还有本来早已是如此的科学，如研究文明的科学(伊斯兰学、印度学、中国学)。从今以后出现了新的"系统论的"科学：生态学、地球科学、宇宙学。

生态学

系统的观念被插入这样一门科学之中，这门科学建立于 19 世纪末，然后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得到迅猛发展，生态系统的概念对它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生态学。生态系统的概念意味着在一个可确定的地球物理学的整体的内部，生物种群之间的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具有组织特点的复杂的统一体，这就是生态系统。如同人们所知，生态学研究从 70 年代起扩展到生物圈的全体，后者被看作一个自我调节的巨系统。它的内部包含着人类特有的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发展从某一时起扰乱着它。

以一个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家借助多种物理学科来认识群落生境，借助若干生物学科(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来考察生物群落。此外，它还应该借助人类科学来考察人类世界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因此极其不同的学科在生态科学中连接和合奏。

地球科学

在20世纪60年代，地球科学随着发现了大地的板块构造，把我们的行星看作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组织的复杂系统。它在自己的领域里把过去分离的学科衔接起来，比如地质学、气象学、火山学、地震学。它启示我们在源于季风的每年极度侵蚀的作用下，东南亚大陆边陲的负荷减轻怎样会引起安纳托利亚[1]西部的震摇，和会导致在希腊和意大利引发地震和火山爆发的推挤。

如同韦斯特布罗克(Westbroek)所强烈提示的，人们正在走向一个关于地球的地质—生物—物理学的概念，[2]在这个概念中人们把与生物起源有关的物理特性(如空气中的氧，含钙的石灰岩，等等)系统地整合起来，在其中生命不仅是地球物理学条件下的一个产物，而且是一个施加作用的因素。

地球科学和生态学的飞跃发展重振了原则上是一门复杂性科学的地理学，既然这门科学覆盖了地球物理学、生物圈和人类居住区。地理学曾经由于缺乏超越维达尔·德·拉布朗舍(Vidal de La Blanche)的可能论理论或拉特泽尔(Ratzell)的决定论理论的组织性思想，被一些高奏凯歌的学科排挤到边缘，现在它重现它的多维度的、复杂的和整体化的视角，[3] 此外它还向生态学和地球科学提供它的专业人员。它发展了它的地理政治学的延伸部[4]，以重

---

① 即小亚细亚或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译者注

② 彼得·韦斯特布罗克：《地球万岁：一个行星的生理学》，Seuil出版社，1998年。

③ 参阅雅克·莱维(Jacques levy)：《为着都市的世界——与阿尔弗莱德·瓦拉多(Alfred Valladao)的辩论》，Hachette出版社，1996年；米歇尔·鲁(Michel Roux)：《地理学和复杂性》，L'Harmattant出版社，1999年。

④ 参阅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地理学词典》，Flammarion出版社，1995年。

新担负起它原有的使命。如同让-皮埃尔·阿利克斯(Jean-Pierre Allix)所说:"我们必须是些通才"①。地理学扩大为了人类地球科学。

宇宙学

宇宙学曾经在20世纪初被爱因斯坦的时空概念所清算。它随着哈勃(Hubble)阐明星系的扩散和勒梅特(Lemaître)提出原始原子的假说而复苏,至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1965年发现了来自宇宙所有背景上的各向同性的辐射之后达于完成,这种辐射可以被解释为是原初热爆炸事件的古老残余物。从那时起确立了一个处于变化中的独特的宇宙的概念。为了认识这个宇宙,特别是设想原子核、原子的形成以及内在于天体中的相互—反馈作用,人们把天文物理学的观察和微观物理学的实验结果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关于无限小的学科结合于关于无限大的学科。某些宇宙学家如同帕斯卡沉思处于这两个无限之间的人类的地位,努力把生命和意识的可能性引入他们关于宇宙的概念中(人择原理)。

因此,从某时起,不同的学科(观察天文学、物理学、微观物理学、数学)加上准哲学的思考被反复运用,以便尽可能达到对我们宇宙的理解。

迟误

不幸的是多学科合并的革命远没有普遍化,在许多领域里它只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关系到人类存在的学科中。人类存在作

① 见其书《人类空间:邀请进入地理学》,Seuil出版社,1996年。

为在自然和文化之间、动物性和人性之间的巨大分割的牺牲品，一直被肢解于研究它的生物本性的生物学和研究他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本性的人类科学之间。

但是新创立的史前学自从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夫妇1959年在非洲奥尔德沃(Olduvai)峡谷关于原人化石的发现之后，使我们有可能实行处置横互在生物和人类之间的难题的第一次连接。它变成了多学科和多视角的科学，努力构想原人的进化——实现从动物到人类的过渡和从自然向文化的过渡的长达数百万年的历程。它需要借助生态学(刺激了原人进化过程的气候变化)，遗传学(从南方古猿到智人的连续的基因突变)、解剖学(两足行走、用手操作、身体直立和颅骨改变之间的联系)、神经科学(脑的增长和重组)、神话学(灵长类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博尔克(Bolk)理论(成年人保存着胚胎的非专门化特点和青年人的心理学特点)。[①]

在这里建立了生命科学和人类科学之间的第一个不可分割的联系。

另一个联系隐藏在认识科学中，位于脑(生物学器官)、精神(人类学实体)和计算机(人工智能)之间。但是直到如今，并列多于合并，与其说是对共同语言的追求，不如说是追逐霸权的学科斗争，这涉及神经科学、心理科学、信息理论、控制论、从网络出发的自组织概念，等等。最严重的问题是聚集经典科学本有的“正规”学科而形成的认识科学不知道它的关键问题：它的认识对象与它的认识手段具有同样的本性。因此认识科学只是构成聚合的第一阶段，正等待着它的哥白尼革命。

① 参看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的说明，该书属 Seuil 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 109 号。

至于生命科学和人类科学，情况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非凡进展使得可能构想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间的联系，既然生命是由于组织而不是由于质料而区别于物理—化学世界。但是人们把这个组织惟一地归结为ADN(脱氧核糖核酸)——→ARN(核糖核酸)——→蛋白质之间的游戏，那还是在以还原的方式设想它。其实直到那时在分子生物学和动物行为学或寄生虫学之间还有空隙有待填补。在分子生物学力图把任何行为都化归为遗传—化学的作用时，在生物科学的其他部门发展了动物行为学的观点，它揭示了不仅是动物的还有植物的策略行为的复杂性，高级猴类特别是黑猩猩之间的关系的融洽和复杂性，哺乳动物之中不是乌合之众而是真正的社会的存在。至于寄生虫学，它发现了寄生虫从一个物种渗透到另一个物种中去所用的令人惊愕的诡计，而这种如此复杂的行为不能被归结为遗传学上的偶然性。

因而生物科学在多条阵线上前进，但这些阵线没有彼此协调，它们导致不同的观念。生物学的联盟远未完成，它缺少决定性的粘接剂——自组织的观念。

另一方面，严格意义上的人类科学本身却是被箱格化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关于虚拟事物的科学、神话和信仰，它们只在某些非主流的研究者那里是互相沟通的。但是历史学已经趋向于变成多维度的科学，它把经济的方面、人类学的方面(整个风俗、习惯，关于生和死的礼仪)整合在它之中，并且在曾经相信必须把个别事件作为次要现象加以排除之后又重新整合个别事件。如同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ke Burgwcere)所正确指出的，①

① 见安德烈·比尔吉埃尔《从进化论的历史学到复杂的历史学》一文，载于莫兰主编《连接知识》一书，Seuil出版社，1999年。

历史学趋向于变成关于人类复杂性的科学。

绝对要求

因此在还原论和箱格化还占统治地位的地方，重大的合并遭遇了严重的迟误。但是宇宙学、地球科学、生态学、史前学、新的历史学使得可能把此前分离的学科彼此连接起来。它们每一个能够在它们的领域里和以它们的方式回答帕斯卡提出的绝对要求。

因此，由于新的科学精神的出现，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真正的思想改革正在进行，但它在各部门的进展是不均衡的。

根据这个精神必须把促进一般智能和探询的能力、实施知识的连接作为目标。在新的科学精神的上面应再加上被更新的人文文化的精神。我们不要忘记人文文化会促进向所有重大问题开通的才能，反思的和把握人类复杂性的才能，这种才能反思知识和把它整合于自己的生活之中，以便相应地更好地启迪自我的行为和认识。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在当代的条件下重新找到可能实现培育构造得宜的头脑的目的的途径。事关贯串不同的教育等级的整个连续的过程，在其间应让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都充分发挥作用。

培育构造得宜的头脑的教育结束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离，使得受教育者变得胜任回答日常的、社会的、政治的、国家的和世界的生活中存在的整体性的和复杂性的问题提出的巨大挑战。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根据它固有的绝对要求，恢复培育构造得宜的头脑的目标。

第三章 人类地位

我们真正的研究是关于人类地位的研究。

卢梭:《爱弥尔》

科学文化的贡献

对人类地位的研究不仅隶属于人类科学阐明的范围,它也不仅隶属于哲学的思索和文学的描述的对象,它也隶属于被更新了和合并了的自然科学即宇宙学、地球科学和生态学的研究课题。

这些科学不仅是向我们展现了把过去被分散和箱格化的知识组织起来的认识,而且它们还复苏了世界、大地、自然这些在我们文化的历史上不断引起我们探询和反思的概念,关于这些概念它们以新的方式提出下述基本问题:世界是什么?我们所从出的地球是什么?它们使得我们可能把有关人类地位的问题插入和定位于宇宙、地球和生命的范围之中。

我们处于一个细小的行星,这个行星是处于宇宙郊野的一个太阳的卫星,这个太阳是银河系的数亿恒星中迷失的侏儒小天体,而银河系本身又处于没有中心的膨胀的宇宙的周边地带。我们是宇宙的僻处一角的孩子,由物理世界的基本粒子、原子和分子组成。我们不仅是僻处边缘的,而且差不多是在宇宙中迷失的,差不多犹如异乡人,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识使我们可能觉察到这些……

同样地，地球上的生命在宇宙中也是极其罕有的，而我们在生命中又是罕有的。人类罕有地出现于动物世界中，而他的发展使他变得愈益罕有。我们(看来)是地球上生物中惟一拥有超级复杂的神经—脑器官的，惟一拥有双重分节[①]的语言在个人和个人之间进行通讯的，惟一拥有意识的……

宇宙向我们打开，这是使我们处于未知的冒险中，在其中我们可能同时是探察者和迷路人；自然向我们打开，这是把我们与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巨分子的组织问题连接在一起，因为它们处于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细胞内部；生命向我们打开，这也是向我们打开我们自己的生命——关于人的科学剥除了下述词语的任何生物学含义：青年人、老年人、妇女、男人、诞生、生存、有双亲、死亡，使这些词语只涉及社会文化范畴；只当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考虑它们时它们才重新具有生物学的含义，而把生命限定在个人生活中的人类学是一种失去生命的人类学。

生命是一种在水中和地表形成的霉菌。我们的行星产生了生命，生命在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多分支地发展，我们是这个进化的分支的分支之一，处于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之中，在我们身上蕴藏着最初的生物细胞的继承者、子女、兄妹。通过出生，我们加入生物的冒险；通过死亡，我们加入宇宙的悲剧。最常规的生活、最平庸的命运都参加着这个悲剧和这个冒险。

就像米歇尔·卡塞(Michel Cassé)在贝舍维尔(Beychevelle)城堡的宴会上回答一位出色的葡萄酒工艺学家问他一个天文学家在他斟满波尔多葡萄酒的酒杯里看见了什么时所说的："我看见宇

① "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是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 Martinet)所用术语，指话语连续体的双重切分。第一次切分为一系列的语法或意义单位，即词素。这些语法或意义单位本身又可划分为一系列语音单位，即音位。双重分节说明人类语言只需有少量音位(通常不超过50个)就可以构成无限量有意义的话语。——译者注

宙的诞生,既然我在其中看到了在最初几秒钟形成的基本粒子。我看见了先于我们的太阳而存在的一个太阳,既然我们的碳原子是在这个爆发的天体内部被锻造出来的。然后这些碳原子与其他原子相结合,在某种宇宙垃圾桶中,碎屑相互聚集形成地球。我在里面看到了巨分子的形成,它们的组合使生命诞生。我看到了最初的生物细胞,植物世界的发展,在地中海国家开始人工培植葡萄树。我看到选择葡萄苗木,围绕葡萄种植而操劳的千年以上的历史。我最后看到技术的发展使得今天可能以电子方式控制酿酒槽里的酒精发酵温度。我在这杯酒里看到了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历史,当然也看到了波尔多人的特别的历史。"

我们在我们本身内部蕴藏着物理世界、化学世界、生物世界,同时通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文化、我们又和它们分开。因此,宇宙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生态学使得可能给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两重人类地位定位。

认识人类,这不是把他从宇宙分离,而是把他放置在宇宙中。我们在上一章看到,任何认识应当把它的对象背景化从而成为恰当的。"我们是谁?"的问题离不开"我们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帕斯卡已经正确地把我们定位在两个无限之间,这一点已经充分地被 20 世纪微观物理学和天文物理学的两个飞跃发展所证实。今天我们知悉了我们在物理宇宙和生物世界的两重根基。

新的发现肯定会再次改变我们的认识,但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存在可能从其根基和从其脱离根基来认清人类的地位。

在宇宙演变过程的内部,在生物自组织的一个奇特的分支的非凡发展的峰巅,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进行着组织化的探险。不断遭到瓦解和离散的力量的侵扰的这个宇宙的组织化的伟业,也是一个连接的伟业,惟一地阻止宇宙在一产生之后就离散和消失。我们——生物和人类,是水、大地和太阳的孩子,我们是宇宙扩散

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物，是太阳系存在中的一些碎屑，是地球存在中的一棵细小的萌芽。

我们既在自然之内又在自然之外。我们同时是宇宙的、物理的、文化的、大脑的、精神的……存在。我们是宇宙的孩子，但是由于我们的人类性本身，我们又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的孩子。我们变成了我们所从出的宇宙的异乡人，而这个宇宙同时仍然隐藏地对我们是很密切的。使我们认识这个物理世界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又从而使我们疏远它。理性地和科学地考察宇宙这一事实本身把我们与它分开。

在我们的宇宙前史之外，在我们的物理构成之外，我们还应该考察我们在地球上的栖息地。地球是依赖太阳产生和组织起来的，自它的生物圈演化出来时起它就形成了一个生物—物理的复合体。确实从地球上产生了生命，而在多细胞生命的多样性的飞跃发展之中产生了动物界，以后动物世界的一个分支的最晚近的发展演变出了人类。后来我们控制了植物的和动物的自然，我们想变成地球的主人和拥有者，甚至成为宇宙的征服者。但是如同我们开始意识到的，我们生死攸关地依赖着地球的生物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十分物理学的又十分生物学的地球本征。

因此我们应该把人类的命运既整合到宇宙之中又加以区别。这个新的科学文化可能提供新的和最重要的认识给一般的、人文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文化，在后者中从蒙田到加缪(Camus)一直提出关于人类地位的问题。

·

史前学愈来愈变成关于原人进化的基本科学。原人进化过程本身包藏着连接动物性和人类性的难题。确实，长达六百万年的原人进化过程使人们可能设想从动物性出发达到人类性的涌现。原人进化同时是一个断续的和连续的变动过程。说它是断续的，因为一再出现新的种类——“能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智

人”，先前的种类依次消失，突然出现语言和文化；说它是连续的，因为下述过程相继而行：两足行走、用手操作、身体直立、大脑发展[①]、青春化（成年人保留胚胎的不专门化的特点[②]和青年人的心理学特点）、社会性复杂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严格意义的人类语言，同时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库藏、本领、信仰、神话，它们是后天获得的和可以代代相传的。如此，我们可以把仍然部分的有如谜语的关于原人进化的问题引入我们的思索，今天我们至少知道它在好几百万年前开始，它不仅具有解剖学的和遗传学的特点，而且具有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特点，从而可能从一定的阶段出发变成文化的。原人进化导致了一个新的开端：人类。

所有这些应该有助于形成一种关于人类归属的人文主义的伦理学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通过意识到地球对于生命和生命对于人类的母体的特点才能完成。

所有这些同样应该有助于抛弃由培根、笛卡儿、布丰（Buffon）[③]、马克思提出的征服宇宙和主宰自然的狂热的梦想，这个梦想鼓舞了西方技术的征服性的冒险。

新的知识使我们发现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地球—系统、盖亚[④]大地或生物圈、人类的地球—祖国，但是只要这些知识彼此分离就没有任何意义。地球，它不是一个物理的行星、一个生物圈和

---

① 南方古猿脑容量 508 cm^3，能人是 680 cm^3，直立人是 800～1100 cm^3，现代人是 1200～1500 cm^3。

② 参阅《迷失的范式》（前引书）关于人类非专门化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特点的表述（第 92—100 页）。

③ 法国博物学家（1707—1788），曾任法国植物园主任，皇家博物馆馆长，与他人合著《自然史》44 卷。——译者注

④ Gaïa，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译者注

一个人类的机械相加。地球,这是一个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的复杂整体,在其中生命是地球历史的涌现,人类是地球生命历史的涌现。人对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以还原的方式也不能以分离的方式来设想。人类是行星的和生物圈的实体。同时是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人类存在,应当在生物的和物理的自然中追溯其根源,但是他又通过文化、思想和意识从后者中涌现出来与后者相区别。所有这些使人们面对人类特有的双重和复杂的性质:**人类性决不能被还原为动物性;但是没有动物性,也没有人类性**。

在这个冒险犯难的过程中,人类的地位通过发展工具、掌握用火、涌现两重分节的语言和最后创造神话和想像中的事物等等而自我产生。因此新的史前学变成了使得可能恢复被学科的分割所化解了的人的科学本身。

人类存在在其复杂性中向我们显现:既是完全生物的又是完全文化的。我们用以思想的头脑,我们用以讲话的嘴巴,我们用以写字的手都同时是完全生物性的和完全文化性的器官。最为生物性的东西——性、出生、死亡又同时是最被文化浸透的东西。我们的最基本的生物行为——吃、喝、便溺都紧密地与规范、禁忌、价值、象征、神话、礼仪相连,也就是说与最为特定的文化的东西相连;而我们最为文化性的行为——说话、唱歌、跳舞、恋爱、沉思,又调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器官,其中包含大脑。

今后人的概念有两个入口:一个生物—物理学的入口,一个心理—社会—文化的入口,两个入口互相依赖。

我们以全息点的方式在我们的个别性的内部不仅蕴藏着整个人类、整个生命,而且还有几乎整个宇宙,包括宇宙的可能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神秘。

这就是新的科学文化可能带给人文文化的礼物:人类在世界

所处的地位——作为整体的极细小的部分,但在这个极细小的部分中又蕴藏着整体的存在。它揭示了人类同时归属于世界又异在于世界。因此,对于新的科学的启蒙教育同时变成了通过这些科学对于我们人类地位的启蒙教育。

人类科学的贡献

非常矛盾地,当前人类科学上对研究人类地位作出了最微薄的贡献,而原因正在于它们是分离的、被割裂的和箱格化的。这种情况完全掩蔽了个人/族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掩蔽了人类存在本身。如同生物科学的割裂消灭了生命的概念,人类科学的割裂消灭了人的概念。难怪莱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认为人类科学的目的不是揭示人,而是把他化解在结构之中。

不如说应该考虑一门被合并的人类—社会科学,由它来考察人类在人类学中的统一性和他在个人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的问题。

在等待所期望的但仍不是指日可待的人类科学的合并之时,重要的是对于它们之中的每一门的讲授要与它说明人类地位的那一部分挂钩。因此心理学应该指向人类存在的个人的和主观的命运,它应该向我们表明 Homo sapiens①同时又不可分离地是 Homo demens②, Homo faber③同时又是 Homo ludens④, Homo economicus⑤同时又是 Homo mythologicus⑥, Homo prosaicus⑦同时又是

① 拉丁文:智人。——译者注
② 拉丁文:狂徒。——译者注
③ 拉丁文:制造工具的人。——译者注
④ 拉丁文:进行游戏的人。——译者注
⑤ 拉丁文:从事经济的人。——译者注
⑥ 拉丁文:创造神话的人。——译者注
⑦ 拉丁文:散文般单调的人。——译者注

Homo poeticus[1]。社会学应该指向我们社会的命运,而经济学应该指向我们经济的命运。关于神话和宗教的教育应该指向人类的神话—宗教的命运。确实,宗教、神话、意识形态应该从它们对人类精神的作用和支配来考察,而不应再看成"上层建筑"。

关于历史学对认识人类地位的贡献,是必须把人类地位与人类的同时是决定的和随机的命运相连。人们将从意识到下述事实中得出所有结论:历史并不是服从不可抗拒的技术—经济的逻辑法则或被引向必然的进步的决定论的过程。历史遭遇变故、干扰和有时是可怕的对大批人口或文明的毁灭。没有历史的"规律",而只有介于决定性和无序力量之间的混沌的、随机的和不确定的两重性的逻辑,和一个经常在经济、社会、技术、神话和想像之间旋转的游戏。没有被允诺的进步,相反地进步可能偶然发生,但是它必须不断地被再生。没有任何进步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的。

历史学,虽然是一段排除了事件、偶然性和"伟人"的概念的时间,也深深地变得丰富起来了。因此在法国因编年史学派(école des Annales)而出名的这股思潮,其优点并非如它所认为的那样是摆脱了事件和偶然性,而是变成了多维度的,因为它在自身中整合了经济的和技术的基础、日常生活、信仰和礼仪、面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它刚刚开始重新认识事件和偶然性,而这两者三十年来出人意外地在宇宙学、物理学和生物学中被重新发现。

因此所有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和人类科学的,今天都可以被调动起来汇合于对人类地位的研究。

人文文化的贡献

人文文化对于研究人类地位的贡献仍然是最重要的。

---

① 拉丁文:诗意的充满想像的人。——译者注

首先是对语言的研究。语言在它最完美的形式亦即文学和诗歌的形式下，把我们直接引向人类地位的最独特的特点，因为正如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①]所说："正是词语以其预想的能力，使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地位。"并且博纳富瓦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在其"影响力"，而不是在"其运行的规律"。[②]

关于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弗朗索瓦·邦（François Bon）正确地观察到："人们与作为人类在他的宇宙中自我反思的文学断绝联系，而使文学为作为媒介的语言服务……在那里它变为受制的和次要的。"[③]应该恢复文学的完全的权能。

我们文化固有的漫长的写随感的传统，从埃拉斯穆斯（Erasmus）[④]、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蒙田开始，中经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⑤]、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⑥]、狄德罗（Diderot），直到加缪和巴塔耶（Bataille）[⑦]，构成了丰富的关于人类地位的反思的贡献。同样地，小说以及电影向我们提供了在人类科学中看不到的东西，人类科学遮蔽了或消解了人类存在的生存的、主观的、情感的特点，而实际上人类一直经验着他的热情、他的眷爱、他的憎恨、他的允诺、他的梦想、他的幸福、他的不幸，遭遇着幸运、厄运、欺骗、背叛、偶然性、命运、宿命……

是小说和电影给我们看到人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的关系。19 世纪的小说和 20 世纪的电影把我们带入历史，越过大陆进入

① 法国诗人，1923 年生。——译者注

② 伊夫·博纳富瓦：《诗歌教育》，载于《在中学中教授什么知识》一书，法国国民教育部编，CNDP 出版社，1998 年，第 63—67 页。

③ 弗朗索瓦·邦：《传播文学：障碍》，载于莫兰主编：《连接知识》，Seuil 出版社，1999 年。

④ 荷兰人文主义文学家，1469—1536。——译者注

⑤ 法国散文作家，1645—1696。——译者注

⑥ 法国伦理作家，1613—1680。—译者注

⑦ 法国作家，1897—1962。——译者注

战争和进入和平。一部宏伟的小说和一部宏伟的电影中的奇迹般的故事,在沉入位于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个人命运的独特性中的同时,揭示了人类状况的普遍性。因此,圣一日耳曼市郊小地方的一个世俗之徒的传闻,在《追忆似水年华》[①]中变成了关于人类状况的深刻缩影。

昆德拉(Kundera)[②]在《小说的艺术》[③]中说得非常好:小说胜似一部小说。我们知道从19世纪开始,小说充满了个人的生活(包括最平庸的个人的生活)的所有复杂性。它给我们看到最普普通通的人也有几重生活,扮演几种角色,生活在一个部分是幻想、部分是行动的生活中。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力地表现了主体与他人的关系的复杂性、"我"的不稳定性。

如同作家哈日·卡姆奥朗(Hadj Garm' Oren)所指出的,正是文学向我们表明:"任何个人,即使是最为闭锁在最平庸的生活中的个人,在其自身中都构成一个宇宙。他在他身上蕴藏着他内在的多样性,他的潜在的几重人格,许许多多幻想的人物,处于现实和想像、睡眠和清醒、服从和反抗、公开和隐秘之间的多重存在,在其难以探测的洞穴和深渊中幼虫般蠕动的各种念头。每个人在他身上含有梦想和幻觉的星系,欲望和爱情的未曾满足的冲动,不幸的深渊,灰心的无边的荒漠,有如燃烧天体的热情之火,仇恨的怒涛,低能的迷惘,明智的闪电,狂乱的风暴……"[④]

既属于文学又超越文学的诗歌把我们引导到人类存在的富于诗意的方面。它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不仅散文般单调地——服从于功利和效率的原则——而且如诗般美好地生活在地球上,必定遭

①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Proust, 1871—1922)的代表作。——译者注

② 法籍捷裔作家,生于1929年。——译者注

③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Gallimard出版社,1986年;并收入"Folio"丛书,1995年。

④ 见其未发表的手稿。

遇美妙的事物、爱情和陶醉。它使我们通过语言的能力与超越可表述的东西的神秘相沟通。

艺术把我们引导到人类存在的美学方面。有一个谚语说自然模仿艺术作品向它提示的东西,艺术则教会我们更善于以审美的方式看世界。

最后我们揭示在任何文学的、电影的、诗歌的、音乐的、绘画的或雕塑的伟大作品中,都存在着关于人类地位的深刻的思想。

我们补充说,任何关于文学、诗歌、音乐的教育特别应该意识到下述事实:从 19 世纪起在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次文化的分离。当资产阶级的成年男性的世界投身于追求效率、控制、技术、利润,而无产阶级遭受劳动的奴役时,青少年和妇女的世界的一部分承担起同情心、爱情、忧伤,并仿佛在任何其他文明中或历史阶段上都不曾有过地表达人类灵魂的渴望与痛苦——这正是雪莱、济慈、诺瓦利斯(Novalis)[①]、赫尔德林、奈瓦尔(Nerval)[②]、兰波(Rimbaud)[③]所陈述的东西。当西欧的列强扑向世界、在其所有的战役中欢呼胜利之时,这些诗人唱出遭受世界和生命的暴行的人类的痛苦。贝多芬在他最后的弦乐四重奏中,不可分离地把表示压抑不住的反叛之情的"muss es sein?"[④]和表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顺从的"es muss sein!"[⑤]连接起来。舒伯特的五重奏向我们表现了一种痛苦,但它在不断地令人感受痛苦之时,又使人圣化到崇高之中。[⑥]

最后是哲学,如果它重新建立与它的对知识和认识的所有方

---

① 德国浪漫派诗人,1772—1801。——译者注
② 法国作家,1808—1855。——译者注
③ 法国诗人,1854—1891。——译者注
④ 德语:它必须是这样吗?——译者注
⑤ 德语:它必须是这样!——译者注
⑥ 参考贝多芬的箴言 durch leiden freude(德语:穿过痛苦有愉悦——译者注)。

面进行反思的天职的联系，将能和应该把它众多的考察手段汇聚到关于人的地位的问题上来。

因此尽管尚无一门关于人的科学来协调和连接许多门关于人的科学(或者不如说尽管对于在这一方向上已实施的工作[①]还无人注意)，教育可以有效地试图把自然科学、人类科学、人文文化和哲学汇聚到对人类地位的研究上来。

今后它能够导致对我们全球纪元特有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人类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① 我的下述书籍进行了这一工作：《人和死亡》(Seuil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77号)和《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Seuil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100号)，以及E.莫兰和M.皮亚特里(Piattelli)主编的集体著作《人的统一性》三卷(Seuil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91、92和93号)。

第四章　学会生活

我想教会他生活。

卢梭：《爱弥尔》

我们希望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诗人，首先在最细小的事情上做到这一点。

尼采

如同杜尔克姆(Durkheim)[1]说得极为出色的，教育的任务不是给予学生不断增多的知识，而是“在他那里形成一种内部的深刻的状态，一种类似灵魂的聚焦的东西，使他不仅在童年而且在一生中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前进。”[2]他清楚地指出了学会生活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在学生自己的精神存在中把获得的知识转变为智慧[3]和把这个智慧融入他的生活中。艾略特说：“我们在信息中失去的知识是什么，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智慧(wisdom)是什么？”这涉及在教育中要把信息转化为知识，把知识转化为智慧；而这样做是根据在本书中确定的目标取向的。

---

① 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1858—1917。——译者注

② 杜尔克姆：《法国教育的演进》，PUF出版社，1890年，第38页。

③ “智慧”(sapience)是一个古词，它包括“明智”(sagesse)和“学识”(science)的意思。

生活学校和人文的理解

在我们考察"人文文化"这个词组时，应该注意从其人类学的含义上来理解"文化"一词：一个文化提供为人类生活确定方向和指引道路的知识、价值、象征。人文文化曾经是和现在仍然是进入生活的预备教育，但今后它应变得不再只是对于精英人物而是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文学、诗歌和电影应该被看作主要不是进行语法的、句法的或符号学的分析的对象，而是如同生活的学校，这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

语言的学校：通过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揭示语言的所有特质和可能性，使得正在吸取这些财富的青少年能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充分地表达自己。

如同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说的关于生活的诗意的特点的学校，并且相关地是关于审美感情和美好事物的学校。

发现自我的学校：在其中青少年可以通过小说或影片中的人物的主观生活发现他们自己的主观生活。他们不仅可以在一本有关思想观念的书里，而且有时更深刻地在一首诗或一部小说里，发现对他们的憧憬、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真情的揭示。书籍在我们身上构成"对真情的经验"，揭示了我们在心中一向怀有而不知道的、被掩蔽的、深刻的、未定型的真情并将之明确显示。这使我们获得双重的喜悦，因为我们在对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真情的发现中又发现了我们自己的真情，这个外在的真情和我们的真情汇合、融为一体并变为我们的真相。[①]经常在这类作品中，比如《在地狱中的一

---

① 愿读者允许我吐露下述关于书籍和生活的关系的心里话：我从未停止被生活推着走，但是书籍在我的生活中无时不在并影响着它。书籍总是激励、照亮、指引我的生活；反过来，我的生活永远保持为是讯问的，它不停地求助于书籍。

季》(*Une saison en enfer*),按照赫拉克利特关于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所说的妙极了的话:"不肯定,不隐瞒,只是暗示。"促进这样的发现有多好啊!

人类复杂性的学校:我们在此重新触及这个在上一章中指出过的东西,因为对人类复杂性的认识构成对人类地位的认识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个认识也是对我们在生活中与复杂的事物和形势打交道的启蒙教育。

如同自莎士比亚以来人们所知的,和如同热纳维埃夫·马蒂斯(Geneviève Mathis)所说的,"一部文学作品隐藏有包含着科学、历史、宗教、伦理……的无限的文化。"[①]是小说把表述的王国伸展至我们主观生活的无限的复杂性,运用词语的极端确切性和分析的极端微妙性来表现心灵和感情的生活。是在小说或影片中人们认识到爱情的真实的时刻、被撕裂的心灵的痛苦。如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人们发现了本性的深刻的不稳定性;如同在普鲁斯特那里,同一个人物有多重内心世界。如同在《高立欧老爹》[②]或《战争与和平》中,人物转变着,他们面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命运,被事件的激流卷走,这些事件可以使人们变成英雄、烈士、懦夫或刽子手。是在小说、戏剧、影片里人们察觉"智人"同时不可分离地是"狂徒"。是在小说、影片、诗歌里,人类展现了他的渺小和悲剧性的伟大,时常与失败、犯错误和变疯狂的危险相伴。是在我们的主角的死亡中我们自己尝受了第一次死亡的经验。因此通过文学,关于人类地位的教育可以采取生动的和活跃的形式,给每个人照亮他自己的生活。青少年不需要所谓的为了年轻人而被淡化的文学,如同伊夫·博纳富瓦所说,"这些青年人等待着蕴含神秘性和严重

---

① 热纳维埃夫·马蒂斯:《文科教学核心中的复杂性》,在"为着复杂思想的拉丁语系国际大会"上的报告,里约热内卢,1998年9月。

②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文通行译本名《高老头》。——译者注

性的重大征象在他们面前升起，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将必须面对生活的神秘性和严重性。”①

在这里，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应进一步肯定任何个人，即使是最闭锁于最平凡的生活中的个人，都在他自身中形成一个宇宙，如同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

人类的学校：在阅读和观赏电影演出中，书籍或影片的魅力使我们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理解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仅仅以外在的方式觉察他人，而在银幕上和透过书页，这些人向我们显示出他们的主观的和客观的所有方面。

文学“惟一地知道如何表现和说明未曾沟通的形势、固闭于自身、喜剧的或悲剧的误解。读者也发现了误解的原因并学业会理解未被理解的东西”(热纳维埃夫·马蒂斯)。②

我们在其中可以了解到人们不应把一个人化归为他本身最渺小的部分，或他往昔的最恶劣的片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匆忙地把罪人定性为犯有罪行的人，把他生活和他人格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归结为这惟一的特点，而我们将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强盗般的国王和黑道影片中国王般的强盗身上发现他们多方面的人性。我们可以看到罪人能够改变和赎罪，如让·瓦尔让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街上遇到流浪者感到厌恶的人，会在电影中以他的整个身心同情流浪汉卓别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所见的形体上或精神上的悲惨现象几乎无动于衷，但是在阅读小说或观看电影时我们会感到同情、怜悯和天良发现。

我们能够最终在那里学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教训，对所有人类的痛苦的同情，和真正的理解。

---

① 伊夫·博纳富瓦：《诗歌教育》，载于《在中学中教授什么知识》一书，法国国民教育部编，巴黎，CNDP 出版社，1998 年。

② 引同前注。

文学、诗歌、电影、心理学、哲学应该汇聚起来以变成理解的学校。关于人类理解的伦理学大概构成我们这个普遍互不理解的时代的关键性的需要：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仅异国人之间不理解，而且在同一社会、同一家庭的成员之间，在一对配偶的两个伴侣之间，在孩子和父母之间不理解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想一想：以教条的和简化的方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传播的心理—精神分析学的解释(自卑情结、恋母情结、妄想狂、精神分裂症、施虐—受虐狂，等等)是否没有在造成简化的理解方式时加重互不理解的现象。

如同狄尔泰(Dilthey)[①]所说的，说明对于理解是不够的。说明，这是动用所有认识的客观的手段，但是这不足以理解一个主观的存在。人类的理解在我们身上发生只当我们把人类作为主体来感受和认识之时；它使我们变得向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开放；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他人身上的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存在的喜欢自是的自我中心机制，以及使最微小的口角蜕变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正反馈机制(在此词的控制论的含义上)。只有从理解出发人们才可能与仇恨和不相容作斗争。

解决有关人类彼此理解的困难的问题需要借助的不是一些分离的教育，而是一个汇总了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的努力的联合的教育学，而这还要与关于清醒意识的启蒙教育相结合。

---

① 德国哲学家，1833—1911。狄尔泰的著名论题是“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提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性质迥异。前者是关于物质的原因和结果的知识，只须说明因果关系。而后者的对象涉及活生生的、具体的、流动的生命或精神，必须加以同情的体验才能理解其意义或本质。——译者注

对清醒意识的启蒙教育

对于清醒意识的启蒙教育本身是与对于到处存在的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启蒙教育分不开的。

应该讲授并且是从小学开始：任何知觉都是从感觉末端开始、由大脑实行的重构性的对现实的翻译，没有任何认识可以不需要解释而存在。因此，我们能够从关于同一事件的矛盾的见证出发，表明比如在对一个汽车事故的观察中，可能存在错误的知觉，后者还经常包含着虚幻的理性合理化。人们可以说明不完善的知觉的情况：或者是按惯例行事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充分，或者是对一个被认为无足轻重的细节没有当心，或者是对一个不常见的因素作了仓促的解释，特别是没有看到全景或者缺乏深思。必须说明过于肯定的回忆的情形，它通过重复走样的记忆而自我肯定。同样地，必须指出：不积极地追求可理解性导致无视一个事实或一个事件的含义，而过分积极地追求可理解性导致改变有关的含义的理性合理化的错误。我们将给出灾难性的决策的例子，它们的被采取不仅是由于短视、轻率或缺乏责任心，而且也是由于荒谬的理性合理化或为着保持我们精神的安宁而无意识地自我蒙蔽的心理过程。

逐步地在中学教育中人们可以阐明合理化(rationalisation)、缺乏经验基础的解释性逻辑系统、和努力把经验与和谐性结合起来的合理性(rationalité)之间的对立。在高等教育中，人们应该讲述逻辑学的局限性和一个不仅是批评的、而且是自我批评的合理性的必要性。

这样我们就从认知心理学和不断地把这个心理学应用于自我，过渡到认识论即过渡到对认识的批评性的认识。后者将借助认识科学，尽管它的合并很差劲。

学习自我批评构成了学习清醒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精神的反思能力使他能够自我双重化和考察他本身。这种能力被某些作者象蒙田和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卓绝地行使过,它应该在所有人那里被鼓励和激发。可能应该经常教导学生每个人怎样会产生欺骗自己的谎言或self-deception。需要不断举例说明自我证明有理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诿过于人的倾向如何导致这种幻觉,筛选记忆时清除使我们难堪的东西和美化对我们有利的东西的做法也促成了这一点(为了激励自己可能要每天写日记,在其中反思经验过的事件)。

最后需要说明学习理解和学习清醒意识的过程不仅永远不会完结,而且应该不断地重新开始(更新)。

进入精神圈

不幸地是现在还没有精神学(noologie),这门科学用于研究想像的事物、神话、神祇、观念[①]的领域,亦即精神圈。

我们用我们的信仰或我们的信念培养着出自我们精神的神话或观念,这些神话或观念具有坚实性和控制力。我们不仅是观念的拥有者,我们也被观念所拥有,能够为了一个观念而殉难或杀人。

因此我们应能帮助青少年的心灵在精神圈中游动(这是个生动的、虚拟的和非物质的世界,由信息、表象、概念、观念、神话组成,这些要素拥有相对的自主性,同时又依赖于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文化),帮助他们建立与他们所有的观念的共生,但从不忘记把后者保持在它们的中介作用中,而防止把它们视为与现实同一。

---

① 参阅E.莫兰:《方法》第4卷《思想观念》,Seuil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303号。

观念不仅是与现实沟通的手段，它还可能变成遮蔽现实的手段。学生们应该知道人不仅会在其偏见盛行的黑夜中杀人，而且也会在其合理化统治的光明中杀人。

生活的哲学

学习生活应该同时被赋予两个意识：其一是兰波所说的"真正的生活"并不是存在于无人能够脱离的种种实际的需求中，而是存在于自我的充分发展和生活的诗意的特点中；其二是生活需要每个人既有清醒意识又有理解心，更广而言之是让所有的人类潜能得到调动。

因此为了帮助学会生活，哲学的教育将会复兴。于是作为获得成功的手段它可以提供两个欧洲文化最珍贵的产物：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合理性，正是它使得人们可以自我督责和具有清醒意识，二是不确定的信仰，这将在下一章考察。

哲学因此在促进对于人类地位的意识和学会生活中，重新找到了它伟大而深刻的使命。如同工作间和咖啡馆里的哲学已经表明的，哲学关系到每个人的存在和日常生活。哲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探询和思索的力量，不仅指向认识和人类地位，而且指向生活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应在到处激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清醒意识的不可替代的酵母，并在到处鼓励人类的理解——文化的基本任务。

第五章　迎战不确定性

(《学会生活》之续篇)

神灵给我们创造了许多惊奇：
期待之事不能完成，
通向意外之事的道路被开通。

欧里庇得斯(Euripide)：《美狄亚》之结尾

全体教师应该走向最前哨，面临世界的永恒的不确定性所构成的危险。

马丁·海德格尔

如果你不希望有意外之事，你将不会发现它。

赫拉克利特

将要到来的纪元将向我们展现处于规律之后的混沌。

J.A.惠勒(Wheeler)

20世纪认识的最伟大的成就是认识到认识的极限。它所给予我们的最大的确定性是关于不仅在行动里、而且在认识中的不确定性之不可消除性的确定性。诗人萨拉·斯泰蒂埃(Salah Stétié)对我们说："在(往昔的绝对的确定性的)倾覆中留下的差不多惟一确定的符号，就是疑问号。"

这两个明显的挫折——实际上是人类精神的真正的征服——的主要结果之一，是把我们置于迎战不确定性的地位上，更总括地

说是迎战每个个人和全体人类的不确定的命运。

在此,适于汇集各种教育,调动多门科学和学科,以教导迎战不确定性。

物理学的和生物学的不确定性

20世纪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由波尔兹曼(Boltzmann)的热力学肇始,被量子的发现所推动,进而瓦解了拉普拉斯式的宇宙,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它侵蚀了决定论原则的绝对有效性的基础。[①]它推翻了主宰世界的"秩序",这个上帝的"完德"的巨大的后遗症,而代之以有序和无序之间的两重逻辑性(既互补又对抗)的关系。它揭示了经典逻辑学的同一性公理的极限。它把可计算的和可测量的东西缩小为不可计算的和不可测量的东西之中的一个局部领域。它使科学的合理性变成探询的过程,这一切由巴什拉(Bachelard)、皮亚杰、波普尔、拉卡托斯、库恩、霍尔顿(Holton)和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著作作了阐明。

我们知道了所有存在之物只是在混沌和旋涡中才可能产生,它们必须不断抵抗巨大的破坏力量。宇宙在自我瓦解中自我组织。宇宙的历史是一个浩大无比的创造的和毁灭的演变过程,一开始可以说就被物质消灭反物质所标志,以后被无数太阳的燃烧和自我毁灭、星体和星系的相撞标明进程,这个演变过程的一个微小情节由在位于宇宙的郊野的一个小太阳的第三颗行星上出现了生命而构成。

生物也面向它的不确定性。如果说生命的出现对应于一些巨

① 甚至在服从非线性的动力学的决定论现象的内部也存在着难以预言的不确定性,这是由于缺乏关于初始状态或关于众多的缠绕在一起的相互—反馈作用的完全的信息。这就是决定论的混沌。

分子的旋涡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组织,后者能够自我重组、自我修复、自我繁殖,并适于从其环境中汲取组织、能量和信息,那么它的发生看来不遵循任何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仍然是一件神秘的事,关于它不断有人制订出新的解说。[①]总而言之,生命曾是只能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混合中产生,我们不能确定混合的比例。[②]对于生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或偶然的,必然的或奇迹般的特点,我们还是深深地把握不住的,而这种不确定性显然影响到关于我们人类生命的意义的问题。[③]

---

① 参阅 M.艾根(Eigen):《物质的自组织和生物巨分子的进化》,载《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杂志,第 58 卷,第 465 期。此外必须加上克里克(Crick)提出的关于生命的外星起源的设想。

② 关于这些概念,参阅 E.莫兰《方法》第 2 卷《生命的生命》,Seuil 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 175 号,第 177—192 页。

③ 生命的出现是由于偶然性的高度不可几的积累而导致的惟一的事件,还是相反的是如果不说必然的至少也是高度可几的进化过程的结果?

在可几的方面存在下述论据:

生命特有的巨分子在某种条件下自发地形成,这种条件人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重现;

在陨星上发现了作为生命的氨基酸的前驱的氨基酸;

普里高津的热力学证明了在某些不稳定的条件下会有组织的自发的形成,也就是说存在在适当的热力学条件(涡流)下巨分子实行愈益复杂的有组织的组合的可能性;

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相遇的条件下和在很长的时间过程中,实行着有利于形成 ARN(核糖核酸)/蛋白质的互补的分子集团的选择过程,这些分子集团最后变得能够自我复制和新陈代谢;

也存在下述的很高的可几性:在一个存在着数十亿又数十亿个天体的宇宙里,与地球相似的行星有几百万个,因此有在宇宙其他区域存在生物的可能性。

在不可几的方面存在下述论据:

在最复杂的巨分子组织和自主的—依靠环境的—反复进行的—组织的生物体之间的质的/量的跳跃(最微小的细菌也是几百万分子的集合体)和根本的非连续性,使得后者成为不可几的;

生物组织本身在下述意义上在物理学上是不可几的: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生物体的分子构成部分的消散才遵循物理学的可几性,而这实际上只是在死亡时才发生;

生物门类和物种的产生如果相应于遗传学上的重组或基因突变,那么它包含有随机的成分。生命的演进本身是一个起伏曲折的历史,包含有引起物种中群体灭绝的灾变和新物种的突然涌现。在这个演化内部,一些类人猿的分支的分支的分支,由于幸运或不幸,延伸为新的原人进化的探险……

太阳在达到它要爆炸的温度时放射光明,而生命在接近它要被毁灭的温度时进行自我组织。自大草原向热带森林推进,直到气候温和的地区进入冰期,人类如果不是曾经不得不回应如许的致命的挑战,也许将不可能得到发展。原人进化的探险历程穿越匮乏和艰辛而完成。人类是 Poros①和 Penia②的儿子。所有生存之物都需要不断地自我再产生:太阳、生物、生物圈、社会、文化、爱情。这经常是我们的不幸,但也是我们的受恩和我们的特惠:所有在地球上珍贵的东西都是脆弱的、罕有的和注定遭受不确定的命运的。我们的意识同样是如此。

因此,如果我们保有了和发现了新的确定性的群岛,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是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

很多迹象提示生命可能只产生了一次,也就是说现存所有生物只有惟一的祖先,这加强了关于在生命的起源上存在一个极其不可几的偶然性的假说;

在太阳系中没有任何生命的征象、痕迹,宇宙中也未向我们传来任何有关的信息;

此外,关于可能存在其他行星具有与我们的行星相似的条件的论据也不再起作用,如果在这个地球上生命是一次闻所未闻的偶然事变的结果。

我们也不能排除第三个假说。在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组织,具有自主的、理智的甚至思想的特性,但是它们可能不是建立在核蛋白的组织的基础上,因此可能不能(当前? 永远?)为我们的知觉和我们的理智所了解。

① 希腊文:资源。——译者注

② 希腊文:匮乏。——译者注

人类的不确定性

人类地位被两个大的不确定性所标志：认识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不确定性。

在认识中存在着三个不确定性的原则：

第一个是大脑方面的：认识永远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总是翻译和重构，也就是说包含有产生错误的危险；

第二个是心理方面的：关于事实的认识总是要求助于说明；

第三个是认识论上的：它肇始于先是哲学中的(从尼采开始)后是科学中的(从巴什拉和波普尔开始)确定性的基础的危机。

认识和思想，它们最终不能达到一个绝对确定的真理，而是与不确定性对话。

历史的不确定性与人类历史的内在的混沌的特点相连。历史的探险已开始了一万多年，它充满了叹为观止的创造和无法挽回的破坏。现在埃及的、亚述的、巴比伦的、波斯的帝国以及曾经似乎将永恒存在的罗马帝国都已荡然无存。在巨大的文明的和经济的退步之后有暂时的进步。历史总是遭逢事变、扰动和有时是恐怖的对人类群体和文明的摧毁。[①]

人类历史肯定遭到社会的和经济的决定性因素的十分强烈的作用，但是它可以被事件或变故拉得偏离或转向。不存在历史的规律。相反地，存在着下述种种努力的失败：把人类历史加以冻结，从中清除事件和变故，使之遭受经济—社会的决定论的约束或

① 参阅格鲁辛斯基(Gruzinski)的出色文章《历史上的事件：事变、灾难、分岔》，载于《连接知识》一书中，Seuil 出版社，1999 年。

使之服从被遥控的进步。

我们终于获致了20世纪末的伟大启示：我们的未来不是被历史的进步所遥控的。未来学的预言的脆弱性，经济学预言(尽管它有数学的精确性和由于它有数学的精确性)的无数次失败，被保障的进步的崩溃，未来的危机，当前的危机，它们到处引入了不确定性的蛆虫。

我们注定遭受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宣布拯救、包括地上的拯救的宗教曾经以为控制住了这个不确定性："布尔什维克不愿意或不能够理解人是脆弱的和不确定的存在，他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完成着不确定的事业。"①

从人类的黎明起，从历史纪元的黎明起，我们已经处于不可知的探险之中；现在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是这样，而我们应该对这种处境有清醒的意识。全球纪元的历史所遵循的进程根本脱离了传统文明时代的可重复行事的轨道，从而进入了不是"进步"的被保障的道路，而是不可探测的不确定性之中。

20世纪的所有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沙俄帝国中的苏维埃革命，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两者的胜利，1939年签署德苏条约的戏剧性事变，法国的崩溃，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顽强抵抗，所有这些都是出乎预料的；如此直到1989年的意外事件——柏林墙的倒塌，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南斯拉夫的战争。今天我们处在黑夜和浓雾中，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

从而历史知识应该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命运的既被决定又随机的特点，而且向我们启示未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应为应对我们的不确定的世界做好准备，随时警惕意外

---

① D.科西克(Cosic)：《苦难的时代》，Âge d'homme出版社，1990年，卷1，第186页。

事件的发生。

三个借以获取成功的手段

准备好自己面对我们的不确定的世界与在被普遍化的怀疑主义之中听天由命是相反的。

这是努力完善地思考，这是使我们变得善于制订和实施策略，最后，这是全神贯注地进行我们的博弈。

努力完善地思考，就是实行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不断尽力地使自己获得的信息和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不断注意与错误和自欺的假象作斗争，这再一次把我们引回有关“构造得宜的头脑”的问题。

这同时意味着意识到行动的环境论。

行动的环境论包含的第一个原则是：任何行动一旦发起，就进入了一个在它被实施的环境内部的许多相互作用和反馈作用的游戏之中，这个游戏可能使它脱离它的目标和甚至导致一个与预定的结果相反的结果。因此，法国18世纪末的贵族的反动发动了一场民主革命，而1935—1936年在西班牙的革命的推进却引发了反动的军事政变。

行动的环境论的第二个原则告诉我们：行动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预见的。因此1789年在法国无人能够预见到恐怖时代[①]、热月政变[②]、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而20世纪的俄国革命是其全部影响还没有穷尽的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间接后果……

---

①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从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雅各宾党人专政的这个阶段。——译者注

② 热月是法兰西共和历的11月，在1794年热月第9日即公历7月27日，热月党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政府。——译者注

这把我们引导到第二个借以获取成功的手段：策略(stratégie)。

策略与程序(programme)相对，虽然它可以包含被程序化的成分。程序是为实现一个目标预先决定的行动的序列。程序在人们可以确切确定的稳定的外部条件下是有效的。但是在这些条件下最微小的扰动都会使程序的实行失常，从而不得不停止下来。策略象程序一样是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建立的；但是它将建立若干可能的行动方案，然后根据它对不确定的环境的了解而选择实行其中之一。策略不断努力搜集信息，检验它们，并根据在进展途中搜集到的信息和遭遇到的偶然事变改变其行动。

我们的任何教育都是导向程序，而生活向我们要求策略，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发现意外珍奇事物的本领(sérendipidité)和艺术。这确实是为了准备迎接不确定性的时代而必须实行的一个观念的颠倒。

第三个借以获取成功的手段是博弈。

一个策略本身包含着对它将迎战的不确定性的意识，从而同时包含着进行一场博弈的准备。它应当充分意识到这场博弈，以便不把赌注倾注到一个虚假的确定性上去。一向是虚假的确定性蒙蔽了将军、政治家、企业家，把他们引导到惨败。

博弈，这是把不确定性整合到信念中或期望中。博弈的运作不限于发生在比运气的游戏和冒风险的企业中，它实际上关系到我们对生活投入的基本方式。因此，帕斯卡在意识到不可能给予他的上帝以绝对肯定的证明时，认识到博弈的不可避免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①]对于无阶级社会的来临所主张的。不确定的信仰，如同在帕斯卡、陀思妥耶夫

① 法国哲学家，1913—1970。——译者注

斯基,乌纳穆诺(Unamuno)[①]、阿多尔诺、戈德曼那里的,是欧洲文化产生的最珍贵的借以获取成功的手段之一;另一珍贵手段是自我批评的合理性,它构成我们抵抗错误的最好的免疫抗原。

每个人都应该充分意识到他个人的生活是一场冒险,即使他认为他被公务员的职业保障所封闭着。任何人的命运都包含着不可化解的不确定性,包括处于绝对的确定性中的事即他的死亡,既然他不知道死亡的日子。每个人都应充分意识到在参与人类的探险,这个探险活动今后将以愈益加快的速度把我们投入未知的领域。

① 西班牙作家,1864—1936。——译者注

第六章 公民的学习

教育应该对人格的自我形成(懂得和担承人类的地位、学会生活)和学会成为公民作出贡献。一个公民,在一个民主制度中,是通过他与祖国的休戚与共的关联和对祖国的责任性来确定的。这意味着国家的本征扎根在他身上。

但是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国家?这些首要的问题在任何教学大纲或教科书中都找不到回答。人们当然可以在宪法和国际法中找到有关的提示,但没有本质的东西。因此我现在冒昧地触及这个问题以表明它是必须加以处理的。

国家—民族[①]

国家—民族的巨大身影在两个世纪以前还不属于现实的主流,自那以后它已经遍及我们的行星和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人们对它还是认识得很少,更加缺乏深入的思考。历史学家们描述了各个国家—民族的形成、它们的发展,但是除了汤因比(Toynbee)之外,没有人思索过它们的本性。社会学家们论述过各种范畴的社会(传统的、工业的、后工业的),但是无视这些社会的国家本性。马克思主义缩小了国家的现实,因为它阐明使国家分裂的东西(阶

---

① 原文为 État-Nation。état 指政治含义的国家, nation 也可译为“国家”,但它多强调国家在社会文化、语言方面的统一性。在下文中 nation 经常出现,根据情况有时译为“国家”,有时译为“民族”。——译者注

级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使之统一的东西。①

考察国家—民族问题的一个主要困难在于它的复杂的特点。确实，完整的国家—民族的概念同时是一个领土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神话的和宗教的存在。

国家是一个拥有诸多附属机构(军队、警察、法院，或许还有教堂)的机器，这要求首先阐明机器的概念。②

共同体/社会

国家—民族是一个从领土上被组织起来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双重本性上，在其中我们必须不仅把gemeineschaft③或“共同体”的概念与gesellschaft④或“社会”的概念对立起来，而且也从根本上联合起来。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于它的各种利益关系、竞争关系、争夺、野心、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之中。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共同体，一个面对外国特别是敌人具有一致的态度和反应的共同体。20世纪初的历史同时揭示了西方大国内部有时甚至走向内战的极大的冲突性和它们面对外部敌人的极大的团结性。

---

① 但是也有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把国家现象看为命运共同体的尝试，此外斯大林也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的论著。

② 请在我的《方法》卷1《自然的自然》(Seuil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第123号)中参考我对于机器概念(第239—247页)和国家机器的概念(第239—249页)的分析。

③ 德语：共同体。——译者注

④ 德语：社会。——译者注

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具有文化/历史的特质。由于共同的价值、风俗、礼仪、规范、信仰,它是文化的;由于在时间长河中遭逢的曲折和考验是历史的。根据奥托·鲍威尔的用语,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个命运共同体在家庭、歌曲、音乐、舞蹈、诗歌和书籍中被记忆、怀念、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最后学校把民族的过去融入孩子的思想,使国家历史上的痛苦、悲悼、胜利、光荣以及烈士和它的英雄的功绩在其中复生。于是对往昔的自我认同使命运共同体成为永远是现存的。

神话的实体

命运共同体由于被一种神话中的手足之情所凝聚而更加深刻。确实,国家—民族是一个祖国、一个母性/父性同体的实体,在它的女性中包含着父系的男性。它把属于同一起源地的人们之间的亲如一家的温暖感情扩展到常常出自十分多样的民族的包含数百万人口的广大的群体中。民族,作为女性的实体,在它身上包含着大地—母亲(母亲—祖国)和家园的性质;它在共同体的环节中引起人们经常自然地对母亲体验到的眷爱的感情。国家,它则是父性的实体;它拥有人们必须加以服从的父亲—家长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权威。对于国家—民族的敬父爱母的联系当面对敌人时在“祖国的孩子”身上激起神奇的同仇敌忾的感情。

祖国神话被两极化。在第一极上所有的是“祖国的孩子”之间的手足之情的精神特点;在第二极上,神话中的手足之情表现为生物学上的手足之情,它把他们作为同一血统的存在联系起来,而这倾向于导致第二个(和在生物学上虚假的)关于共同“族类”的神

话。因此民族的观念中含有潜在的种族主义的因素，当第二极占了上风时它便会由潜在变为现实。

国家的“宗教”

敬父爱母的神话引起了真正的国家—民族的宗教，它具有它的赞颂仪式，它的圣物(旗帜、死者纪念碑)，它景仰母亲—祖国的崇拜，它对于英雄和烈士的个人崇拜。如同所有的宗教它被热忱所滋养，这种热忱可以激发狂热和仇恨。

国家—民族扎根于支承它和构成它的领土的土地的物质基础之中，同时又在这里找到它的神话的基础，即大地—母亲的和母亲—祖国的基础。在这里仿佛存在着一种不间断的旋转：从地球—物理学旋转到神话学，同时从政治旋转到文化和宗教。神话不是民族的上层建筑，它是产生团结精神和共同体的东西；这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凝聚剂，而在复杂的社会里，它是对付个人的离散倾向和人际争斗的破坏性的扩展的惟一有效的解毒剂。因此，在整体产生其构成元素和构成元素产生其整体的这种自我产生的回旋中，神话产生把它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国家—民族本身。

走向“超越”

今天一切都向我们指示国家—民族的绝对权力可能和应该被超越。首先是因为在国家的内部框架本身，国家由于它本身的技术—官僚化的发展已变得过于抽象和同质化。更重要地是因为现在所有重大的问题都需要多国的、跨国的、大陆性的甚至全球性的解决办法，这使得超国家的联合的、联邦的或邦联的制度成为必

要。

但是，如果说下述事实十分明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定数量的欧洲国家，进攻性/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在彼此沟通的过程中已经大大减轻，那么国家—民族远未变成历史的古董这一事实看来也并非不明显。首先人们完全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1989年后民族主义激情的复兴可能从东欧传染到西欧。即使幸而相反地在东欧民族主义安定下来，国家—民族无论是对于其范围内的分权自治还是对于多国性管理机构的产生，仍将进行多种形式的相当强烈的抵制，以减缓甚至阻止创造一个欧洲邦联制度和一些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的进程。

昔日的国际主义曾经低估了国家—民族的强有力的神话—宗教的实在性。今后的问题是不仅要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注意不要力图消除它。问题在于把它相对化，如同省的实体在国家的实体中被相对化了但未被消灭。但是为了这样做，必须使欧洲的休戚与共的感情得到强化和扎下根来。同时必须使民族的神话的/宗教的基础、它的热爱母国的品质被扩展，不仅扩展到我们大陆的范围——这个大陆已经被它所创造的文明和一个愈益明显的命运共同体所标志，而且扩展到我们的整个行星，这个行星今后被认识到是人类惟一的家园(home, Heimat[1])，而它现在正遭受由人类自身制造的最大危险的威胁。全球共同体如同国家共同体一样有其敌人，而根本的区别是这个敌人存在于我们身上，所以难于看出它和迎战它。所有这些使得我们处于只是意识到这些问题和建立新的休戚与共关系的初步摸索阶段。

---

① 德文：家园（或祖国）。——译者注

法兰西本征(identité)

历史的教育对于国家本征的扎根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国家历史的重要性应该被充分恢复。它可能使孩子被融合到祖国所构成的复杂而生动的整体中。或者不如说,孩子和青少年被融入充满波折、胜利、失败、悲悼、光荣的历史中真正地把他们变成了“祖国的孩子”。

法国历史拥有一种被教科书所忽略的独特性,现在应该把它突现出来。

法国的四次诞生

法国的神话的一实在的起源有着非同寻常的复杂性的特点。第一次公认的国家的诞生是高卢人的。而高卢人直到罗马来征服前都是四分五裂的,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对抗侵略者。因此其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在未来的历史上被公认为是第一个民族英雄。但是国家形成后不久就瓦解了,既然韦辛格托里克斯被打败和杀死,高卢人就变成了罗马人。但是,在我们的民族神话中,罗马人并不被看作敌对的占领力量,而是在两个成分的相互融合中发生的第二次诞生的共同创造者,这是一个被正确地称为高卢—罗马人的实体的诞生。它的克尔特—高卢的基质吸收了在语言上和文明中的拉丁要素。

接在这第二次诞生之后的第三次诞生发生于混乱动荡的高潮,当时罗马帝国土崩瓦解,而入侵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克洛维(Clovis)是这第三次诞生的神话般的操作者。这个法兰克国王将给以法国它的名字,这个名字看来面对日耳曼特性建立了法兰西特征,既然克洛维被后来的编年史作者们公认是在托尔比阿克

(Tolbiac)战役(公元496年)中打败了阿拉曼人的征服者。他皈依基督教,并在法国兰斯(Reims)被以宗教仪式加冕,将显示为基督教的法国的缔造者。事实上不是克洛维打败了阿拉曼人,战役也很可能没有在托尔比阿克发生,克洛依皈依的背景看来也不是军人向上帝感谢使他成为战胜者。归根到底,法兰克人一度曾是日耳曼的人民,因其语言那时是日耳曼语。其实克洛维促成法国的第三次诞生是通过在它里面融入日耳曼的因素和建立基督教制度。

第四次的和真正的诞生是在公元987年随着于格·卡佩(Hugues Capet)的统治而发生的。这次诞生是不合常情的,因为这是一个领土被分割为许多事实上独立的封地的时代,其范围从布列塔尼伯爵领地到上洛塔兰吉(Lotharingie)公爵领地,从弗朗德勒(Flandre)伯爵领地到普罗旺斯伯爵领地。真正王室的领土只包括法兰西岛、奥尔良省和桑利(Senlis)地区。

法兰西化的进行

法国是从卡佩王朝的国王开始通过把不讲法兰西岛语的人口法语化而形成的。法兰西岛语是在法兰西岛和奥尔良省流行的奥依语的方言之一,它被强加和凌驾于奥依语和奥克语的许多其他方言之上,而变为法国语。

这就是说法国是经过历时数百年的把极其多样的民族和种族法语化的过程而形成的。这些民族和种族的异质性举例来说远远超过了前南斯拉夫。而德国国家是通过统一日耳曼语的区域而形成的,意大利是通过联合其大部分感到自己是意大利人的人口而形成的。

法兰西化不是仅仅温和地实行的,但它也不是仅通过强力实行的。有过在一个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搅拌和融合,但是也没有丧

失一些变为局部性的本征(identité)。法国本征不引起局部本征的消解,它使这些局部本征从属于它。它在本身中包含了被整合的局部本征,因此它具有双重本征。

确定的法国的概念

法国大革命给法兰西化带来某种超过历史上所完成的事业的东西,即通过用新的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它实行主权的更换——人民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自己,他们宣布自己是"伟大的国家"。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是这样一个时刻,所有省份的代表庄严地和象征性地宣布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意志。从此法国在它的本性中并入一种精神和一种意志。法兰西,在不停止仍然是一个地上的存在的同时,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存在。这一点由于《人权宣言》所发出的信息而更为确定;法兰西的概念成为这样一个概念,此后在它的个别性存在中包含着普遍性的观念,这就是法兰西的概念所启示给世界上如许的被排斥的、被侮辱的和被迫害的人们的博爱的观念。

法德之间在19世纪对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争执加强了关于法兰西本征的精神概念。德国认为这个语言和文化上的日耳曼土地属于它,法国则根据该地区人民选择归附它的精神和意志把它看成是属于自己的。这正好是第三共和国[①]据为己有的法兰西的唯意志主义和唯精神主义的观念,法国用它战胜了反共和党用以与之对抗的推尚种族、血统和土地的观念。

在整个19世纪存在着此后在法国的概念本身中彼此对立的

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导致他所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后建立,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法国战败投降德国而宣告终结。——译者注

两极：民族主义的一极和爱国主义的一极。一方面是君主制的、天主教的、排外的法国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共和国的、非教会的、开放的法国的概念。还需要1871年的失败、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和特别是非教会的共和国的双重胜利——1905年教会与国家的分离，1906年德雷福斯(Dreyfus)上尉的被平反①——来把反动党派抛置到反对党的地位，后者怒不可遏但是无济于事直到1940年，以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君主主义者、天主教徒、排外分子就逐步分裂了。

融合入境移民的法兰西化

因此在第三共和国的总体背景下，刚刚开始的20世纪看到法兰西化以全新的方式继续进行，即不再是立足于附属的或归附的领土，而是立足于来自邻国的移民。当时法国是欧洲惟一的一个人口在下降的国家，而且境内最贫瘠的土地都被其居民抛弃。这种形势吸引了最初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移民潮。第三共和国当时制订了入籍法规，允许出生于法国的外国人的孩子自动变为法国人，并方便其双亲的入籍。在同一时代建立的非教会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小学使得法律上的融合可以与精神和心灵上的融合相伴而行。我见证了这一切：作为入境移民的儿子，是在学校和通过关于法国历史的教育在我身上实现了一个思想认同的过程。我把我看成是法国人，我为它历史上的苦难而痛苦，我为它的胜利而欢悦，我景仰它的英雄，我吸收了那种使我能够处于它之中和归属于它的基质，因为它融合于自身的不仅是不同的和外来的东西，而

---

① 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军方诬告向德国武官出卖情报，以间谍案定罪。著名作家左拉等发起进行救援，使法国社会分裂为两派引起巨大动荡，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被平反。——译者注

且是普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叫小非洲人结结巴巴地背诵“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一事不应只是被看到它的蠢笨之处。这些传说中的高卢人是抵抗罗马侵略的自由人，但是又在卡拉卡拉(Caracalla)[①] 的诏书之后接受在一个变成世界性的帝国中的文化适应。在法兰西化的过程中，孩子们接受了卓越的祖先，后者同时向他们讲述自由和融合，即他们的变为法国公民。

这意味着回溯法国的起源，当它是在这种历史的逻辑中采取的时候，不是一个排外的和闭守的步骤。

因此，我们的历史是一个逐步法兰西化的历史，它把开始时十分异质的民族特性加以局部化，依靠共和国的发展，使入境移民的孩子们可能认同法国本征。

欧洲本征(identité)

国家的历史不可能孤立于欧洲的历史被理解。应该表明近代欧洲从中世纪的茧壳中钻出，在这时失去了古代世界(拜占庭城的陷落，1453 年)，发现了“新世界”(1492 年)和改变了世界观(哥白尼，1473—1543 年)。它在历史的旋涡中发展，其中无序和对抗(国家斗争、阶级斗争、宗教斗争、观念斗争)远非阻碍了发展，而是促进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当然以巨大的耗费为代价。民族国家相对于任何居于其上的政治实体变成绝对的主权所有者，它们不断地交战，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它们组成同盟和重新组成同盟，以阻止惟一的一个国家称霸欧洲。应该表明经过战争的欧洲，发展和传播了一种欧洲的文化，它不是建立在一种模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由返回古希腊的源泉所引起的探询精神的复苏的基础上，它造成了哲学的复苏和科学的飞跃。同时这个

① 罗马皇帝，188—217，在位公元 211—217 年。

文化也是建立在以宗教和信仰为一方、以理性和怀疑为另一方的两方之间的两重性逻辑(既对抗又互补)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这里人们可以跟踪一种科学的、技术的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的飞跃,在其中涌现了一种关于人的人道主义的和解放的观念,这与欧洲当时使世界上其他部分所遭受的巨大的压迫和统治适成反照。人们将指出伟大的近代文化潮流的泛欧洲的特点,它们源于起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oscane)地区影响及于圣彼得堡的文艺复兴运动,起自巴黎的启蒙运动,起自耶拿的浪漫主义运动,一句话,所有穿越整个欧洲的伟大的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潮流,直到超现实主义思潮。

伟大的欧洲主题从西边传播到东边:民族国家,取消奴役,人道主义,民主政治,技术—经济发展,科学发展。但是,东欧并不曾只是接受者,它也是文明的创建者。伟大的俄罗斯在19世纪产生了最丰富的诗歌的、文学的、音乐的文化。在16和17世纪两次威胁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像任何帝国一样,同时是压迫者和文化传播者。它允许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共存,而这一点是西方的任何帝国或王朝所不能接受的。欧洲在它的全部富藏中必然包含有东欧的、北欧的、还有地中海沿岸的南欧的贡献。

欧洲曾经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直到20世纪中叶,包括战争中的年月。这些战争使民族国家对立和使它们强化,通过转换盟友,它们阻止形成一国对其他国家的霸权。今天他们从对于共同命运的意识和意志出发努力进行自我建构。因此,归属于欧洲本征的意识可能促进发展欧洲公民身份。

地球本征(identité)

最后,我们需要了解人类的通史,它不是开始于1492年,而是已经有好几万年,随着智人散居在整个行星上(包括在太平洋的岛

屿上)而开始的。在这次散居之后,人类的各部分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分离。亚洲和欧洲基本上彼此封闭,非洲的中心、大洋洲和两个美洲都闭锁地生活着。但是各处都有伟大的文明在形成。一个新的全球历史随着哥伦布和伽马[①]而开始。应该说明,从16世纪起已经有两个世界化在进行,它们既相联系又相对抗:一个是控制的、殖民化的和剥削的世界化,另一个是人道主义的、解放的、国际主义的理念的世界化,它蕴藏着人类的共同意识。

在20世纪的后半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广岛、长崎的两次原子弹毁灭事件之后,涌现了对于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如同米莱伊·德尔马-马尔蒂(Mireille Delma-Marty)所说,"五十年以来我们开始把我们考虑为一个人类"。

今天我们可以同时认识到下述几点:

1. 一个从下述意义上来理解的命运共同体:所有的人类都遭受(继续在扩散的)核武器的同样的致命的威胁,同样的随着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增长引起的"温室效应"而更加严重的生物圈中的生态灾难,产生我们的共有的氧气的巨大热带森林的被大规模砍伐,养育我们的海洋和河流的贫瘠化,无数的污染,无边界的灾难。在这些之外还要加上新病毒和老的增强了的微生物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世界经济的不可控制的变化,最后特别是掩饰和产生两种野蛮之间的联盟的多种形态的威胁——这两种野蛮一是来自古远年代的破坏的和死亡的野蛮,二是技术—经济世界的非人性的和冷酷的野蛮。

2. 共同的人类本征:尽管在对基因、地域、共同体、礼仪、神话和观念的归属上有如此之多的差异,智人(Homo sapiens)具有一个它的所有的代表者共有的本征:他们从属于族类的遗传统一性,这使得在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无论他们的"种族"是什么,

① 葡萄牙航海家,约1460—1524,发现经好望角赴印度的航线。

都可能通过交媾而繁殖;这种遗传学上的统一性延伸为形态学的、解剖学的、生理学上的统一性。智人的脑的统一性表现在他的大脑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卓异的组织上。最后存在心理学上的和情感上的统一性:当然,欢笑、眼泪、微笑是根据文化多样性地被规定、禁止或展现的,但是无论加于其上的这些文化和性格类型所造成的极端多样性,欢笑、眼泪和微笑是普遍的;它们的内在性的特点特别表现在天生的聋、哑、盲人身上,这些人微笑、哭泣、欢笑不可能是模仿任何人。

3. 起源于地球的共同体:这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和类人猿的、哺乳动物的、脊椎动物的前身,它们使我们成为生命的孩子和地球的孩子。

关于我们的归属和我们的地球本征的意识和感情在今天是极其重要的。只有这种归属于我们的地球祖国的意识的进展和扎根,使得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在地球的不同地区,发展一种使人类关系文明化所必需的互相联合与休戚与共的感情(各种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幸存者"[Survival international]、"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绿色和平"[Greenpeace],等等,都是地球公民资格的开拓者)。这是第二个世界化的灵魂和心脏,它是第一个世界化的对立产物,惟一可能使这个世界化变得人道的力量。

在发展我们的人类意识和我们对于地球的祖国的意识之间有关联性。地球的祖国包含着维护各个不同的祖国;这许多祖国可以很好地扎根于一个更加深刻和更加广泛的"祖国"的概念中,只要它们是开放的,而对于地球—祖国的归属意识是它们的开放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应该促进法国公民的自我形成,给予有关"国家"(nation)的含义的知识和意识。但是我们需要拓广公民的概念使

之适宜于尚不拥有完成的体制的实体，如对于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使之适宜于还完全不拥有共同的政治体制的实体，如行星地球。这样一种培养应该可能使得国家的本征、欧洲的本征、地球的本征在自我内部生根。

我们说，当人们感到休戚与共和负责任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是公民。休戚与共和责任性不能来自好心的劝诫和对公民的训导，而只能来自一种深刻的归附的感情，对于母国的爱情。这种感情应该以同心圆的方式围绕法国、欧洲、地球加以培养。

第七章　三个等级的教育

现在我们来简要地审视一下怎样对于三个等级的教育确定我们在前几章中陈述的目标。

小学

与其粉碎任何刚刚觉醒的意识所具有的自然的好奇心，不如把它引向最初的探询：什么是人类、生命、社会、世界、真理？

"构造得宜的头脑"的目标将由一个探询的教学大纲来促进，后者从人类存在出发。

在询问何为人类时人们将发现其双重本性：生物的和文化的。一方面，人们从生物学入门；从那里，在辨别生物组织的物理的和化学的方面的时候，人们就给物理的和化学的领域定位，然后物理科学将引导我们把人类存在插入宇宙。在另一方面，人类将发现人类存在的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方面。这样，从一开始，各门科学和学科将是连接的，彼此成为对方的分支，教学将可以在对各局部的认识和对整体的认识之间穿梭运行。以这种方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可以互相区别，变成不同的教材，但是不再互相隔离，既然它们一直被置于它们的背景之中。

为了理解何以把人类纳入物理的和生物的世界，何以又使人类与它们相区别，人们应该讲述宇宙的演化历程如同人们现在所

能刻画的那样(同时指出哪些是假说，哪些是未知的，哪些仍然是神秘的)：基本粒子的形成，物质聚集为原星系，然后是星系和恒星的形成，碳原子在先于我们的太阳的太阳的内部的形成，然后是在地球上可能借助了来自陨星的材料构成了巨分子。人们再提出生命产生的问题(连同在第五章中指出的它的未解之谜)，然后是生命的具有众多分支的进化发展。

从原人进化的探险历程出发(同时指出它还包藏的所有未解之谜)，将提出智人、文化、语言、思想的涌现的问题，这一切又可能使心理学和社会学涌现。

应该提供关于生物—人类学的接合的课程，指出人类既完全是生物的、又完全是文化的；在生物学中研究的脑和在心理学中研究的精神是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并强调指出精神的涌现以语言和文化为前提条件。

这样，从小学开始人们就实现了把对人类地位的探询和对世界的探询连接起来的举措。

在各教材相互区分和独立的同时，要学会在既区别又联结、既分析又综合中进行认识。人们由此将学会考察事物和原因。

什么是事物？必须教导说：事物不仅仅是事物，[1] 而且是连接不同部分形成一个统一体的系统；[2] 没有封闭的物体，而只有与其环境不可分割地相连的实体，它们只有在被纳入其背景中时才能真正被认识。关于生物，它们相互之间和与其环境之间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构成它们的组织和它们的本性本身的一部分。

---

① 罗贝尔·帕盖(Robert Pagès)说过：事物不是事物。

② 教授系统概念告诉我们的东西(参阅莫兰《方法》第1卷《自然的自然》第94—151页)。

什么是原因？应该学习超越“原因——→结果”的线性因果性。学习双向的相互关联的因果性、循环的因果性（反馈的、回归的），以及因果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同样的原因并不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这时原因所影响的系统的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的原因可以引起同样的结果）。

因此将能形成一种能够迎战复杂性的认识。

学习生活可以按照两条途径进行，一个内部的途径和一个外部的途径。

内部的途径经由自我审察、自我分析、自我批评。自我审察应该从小学开始教授并延续于这整个阶段。人们特别要讲授在最真诚和最可信的见证中出现错误或曲解的可能性；人们应该学习自己的精神遮蔽不利于他对事物的看法的事实的方式，这表明这个对事物的看法更多地取决于思想模式的结构方式而不是来自事物的信息。

外部的途径将是引导认识传播媒介。由于孩子们很早就被沉浸在传播媒介文化、电视、电子游戏、广告等等之中，教师的作用不是揭露，而是让学生认识这种文化的生产方式。应该说明对被拍摄的或被电视播放的影像的处理、特别是剪辑，怎样可能任意地给予一个现实的印象（比如在一系列连续的镜头中人们本是孤立地分别看到捕食的动物和它的猎物在奔跑，但是却可以给予人一个印象：人们同时看到追捕者和被追捕者的竞逐）。教师可以对学生在课外收看的电视节目和所玩的游戏进行分析和评论。

当然，对法语、拼写、历史、计算的教学在小学的阶段中仍完整地加以保留。

中学

中学是学习应该成为真正的文化的东西的场所,它建立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对话,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对科学的成果和变迁进行反思,而且把文学看作生活的学校和经验总汇。历史学应该在中学教育中起一个关键的作用,使学生能够把自己融入他国家的历史中,进而在欧洲的和人类的历史变动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在他身上发展一种掌握人类现实的多方面的或复杂的特点的认识的模式。

应该用方向指导代替现行的教学大纲,以便让教师能够在新的背景——宇宙、地球、生命、人类——中确定各学科的位置。帮助教师实行这种课程整合的进修可以安排在经过改革的 IUFM(教师培训大学学院)的框架内进行,或在培训期在专门设立此项计划的其他大学的学院中进行。

从而,在一个哲学教授或一个多面手教员的主持下,各门科学的教育可能找到它们的汇合点,即在物理的和生物的世界的内部认识到人类的地位。

人类科学的合并教育应该根据各个学科围绕下述轴心建立:人类存在的个人的命运、社会的命运、经济的命运、历史的命运、想象的和神话学的命运。

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不是被牺牲,而是被提升。(中学教育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人文文化)。第三章和第四章已经向我们阐明人文科学怎样引导学生在认识人类地位和学会生活上入门。

哲学应当作为其核心之一包含对于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认识的反思,对于在我们的社会中日益变得主要的技术—科学的作用的

反思。

在整个中学阶段,数学将被作为实行运算操作的逻辑思维方式加以教授。对于任何专业方向选择作为结尾的哲学教育将引入对合理性问题的探究,阐明合理性(rationalité)和合理化(rationalisation)之间的对立。

最后,有关国家历史的教育对于培养公民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个历史被设想为沉浸在欧洲历史中的法兰西化的历史,而欧洲历史又创造了全球纪元的历史,并在往后融入它之中。

此外,中学教员有义务在青少年的世界及其文化的问题上进行自我进修。事实上在"阶级合作"的名义下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一方是掌握权力的教师,另一方是学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后者创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进行各种违规的细小活动(抄袭、考试作弊,等等)。应该了解在城郊的悲惨生活条件下,阶级斗争如何更加严重。

应该了解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青少年世界在家庭文化和学校文化方面所获得的自主性,了解青少年群体的社区形式和特定规则,从在某些地方(郊区)发生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的瓦解到形成一些青少年部族,后者构成真正的小社会,具有自己被神圣化的地盘,自己报仇的法规,自己的行为规范。

总之,事关在两个世界的相互认识和再认识中前进,这两个世界虽然彼此搭接,却互不认识。

最后,教育领域不应该关闭于自身,如同在传媒文化汹涌澎湃的形势下被围困的城堡。这种传媒文化外在于学校,被知识世界所不理睬和鄙视。但是认识这种文化很有必要,不仅有助于理解多种形态的文化的产业化和超级商业化的过程,而且有助于了解

传媒的主题所反映和透露的我们的“时代精神”[1]所特有的向往和顽念。在这个问题上，教师与其不加理睬而让他们的学生任其滋养，不如说明这些电视系列片透过它们的俗套和千篇一律的观点，如同戏剧和小说一样讲述的是我们生活中的憧憬、担忧和顽念：爱情、仇恨、不理解、误会、邂逅、分离、幸福、不幸、疾病、死亡、希望、权力、狡诈、野心、欺骗、金钱、逃避、毒品。

大学

大学保存、记忆、整合、持守知识、观念、价值的文化遗产；它通过把后者重新研究、实现、传授而不断再生后者；它也产生将归入遗产中去的知识、观念和价值。因此大学是保存者、再生者、创造者。

以此身份，大学具有穿越世纪的久远使命和功能，使之从过去经由现在走向未来。它具有不顾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关闭倾向而保留下来的跨国使命。它拥有使它可能实行这一使命的自主性。

根据“保存”一词的两个含义，大学的保存者的特点可以或者是极其重要的，或者是效果微小的。如果“保存”意味着保护和保藏，那么它就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在保藏过去的情况下才能准备未来，而我们又处在一个多种强大的瓦解文化的力量发生着作用的时代。但是如果“保存”是教条的、僵固的、刚性的，那它就是成效微小的；比如 17 世纪的巴黎大学曾经反对它那个时代的所有科学进展直到整个下一世纪，这引起近代科学的大部分是在大学之外形成的。

---

① 《时代精神》(*L'Esprit du temps*)：这是我用于论述这个文化的一本书的题目(Grasset 出版社，以后列入“ Biblio Essais”袖珍书丛书，1983 年。)

大学终于知道回应科学发展的挑战而在19世纪实行了自身的大转变,这是从1809年洪堡(Humboldt)在柏林大学实行的改革开始的。大学非教会化,建立相对于宗教和政权的内部自由,从而它向从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伟大的探询开放、探询世界、自然、生命、人类、上帝。大学变成了欧洲近代文化固有的探询精神运作的场所本身。在它向欧洲之外的文化开放时更加深刻地投入了它穿越世纪和横贯国家的使命。

改革把近代科学引入了它创立的那些系里。大学从此使两个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共存而不是相互沟通。

在创立各个系的时候,洪堡很清楚地看到了把各门科学整合在大学教育中的穿越世纪的长远性质。因此他认为,大学不应有进行职业培训的直接使命(这是适宜于技术学校的),而应有培养研究态度的间接使命。

从而产生了大学的自相矛盾的双重职能:适应科学的现代性和将它整合于自身;回答培养的基本需要,向新的职业提供教员,但是还要特别提供一种超越职业的、超越技术的教育亦即文化。

大学应该适应社会还是社会应该适应大学?在这两个任务——适应社会和使社会适应自己——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对立性,二者互相凭借形成一个应该是创造性的圆圈。问题不仅是使文化现代化,而且是使现代性文明化。

在此我们重新发现了穿越世纪的使命,在其中大学呼吁社会采取它发出的信息和它的规范,它要给社会接种一种不是为了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而具有临时的或短暂的形式的文化,但却是能够帮助公民们应对他们此时此地的生活的命运的;它在社会的和政治的世界中捍卫、说明和促进内在于大学文化中的价值:意识的自主性,探询精神(其后果是研究应保持为开放的和多元的),真理高于功利,知识的伦理学。从而得出海德堡大学回力球场墙上镌刻的这句题词所表述的天职:“保持生气勃勃的精神!”

大学应该既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又实行它的穿越世纪的保存、传播、丰富文化遗产的使命，没有这些文化遗产我们将不过是生产和消费的机器。

但是，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的，20世纪向这个双重任务发出了许多挑战。

首先存在一种有关超级适应性的压力，它促使教育和研究顺应此刻的经济的、技术的、管理的需求，使自己符合最新的方法、社会上最新的模式，缩小通才教育，把人文文化排挤到边缘。但是在生活中和在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对于一定条件的超级适应性不是生命力的象征，而是由于失去发明和创造的活力而走向衰老和死亡的预兆。

其次在学科之间存在知识的根本的分离，在这些学科之间建立常规的桥梁遇到巨大的困难(参阅第一章)。

同样存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分离，科学文化包含了科学和学科之间的箱格化。两种文化的互不沟通对彼此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参阅第一章)。

大学改革不能满足于大学教育的民主化和学生地位的普遍化。**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改革，它关系到我们组织知识的能力，亦即思想的能力。**

思想的改革要求大学的改革。

这个改革将包含通过建立一些新学院、系或研究所来实行的普遍重组，首先涉及已经围绕系统的组织核心进行过一次多学科合并的科学(生态学、地球科学、宇宙学)。我们再说一遍，生态学、地球科学、宇宙学确实是一些不是以某一区域或某一部门为对象、而是以一个复杂的系统为对象的科学：生态学的对象是生态系统或更广泛地说生物圈，地球科学的对象是地球系统，而宇宙学的对

象是形成和毁灭星系系统和太阳系统的宇宙的奇特的倾向。为此，人们可以设想建立一个宇宙学院（包含其哲学部门）、一个地球学院（包含地球诸科学、生态学、物理的和人文的地理学）。

改革还将建立认识学院，它集合认识论、有关认识的哲学和认知科学。虽然在认知科学中已经进行了合并，但在其中并列和争执多于真正围绕对于认识的认识的问题进行反思形成一个核心。

生物诸科学现在一部分由分子生物学实行了还原性的统一化，另一部分则处于无所统属的箱格化状态，应该建立一个生命学院。

不要等待不可避免的未来的合并，重要的是现在就创建一个人类学院（集合史前学，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人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诸科学，整合有关个人/族类/社会的问题。）

历史学应该有一个充分的和完整的学院；人们在那里不仅教授国家史和世界史，而且教授亚洲、非洲和美洲的伟大文明的历史。

人们还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世界化问题学院。

最后，对文学院的保存将伴随如前面（第三和四章）所建议的那样深化它的教学和向艺术和电影开放的措施。

这样的设置本身将能保证培养具有多学科或超学科的文凭和毕业论文的学生。

为了建立可能实行改革的思维方式并使之在各知识部门具体化，适于在所有的大学和学院建立认识论的或超学科的什一税制[①]：提取10%的课程时间用于一种共同教育，它探讨不同知识

① 这是根据由Ciret（国际经济趋势概况研究中心。——译者注）和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者注）组织的洛迦诺（Locarno）国际大会（1997年4月30日—5月2日）提出的建议《明天的大学是怎样的?》作出的。

的前提条件和使它们彼此沟通的可能性。因此这个“什一税”可以用于：

认识认识的规定性和前提，

合理性、科学性、客观性，

解释，

论证，

数学思维，

人类世界、生物世界、物理—化学世界、宇宙本身之间的联系，

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沟通(根据皮亚杰，科学的环路加强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

在不同类型的认识中的复杂性问题，

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

文学和人类科学，

科学、伦理学、政治，

等等。

它将制订一些具体措施使得可能进行人类—社会诸科学和自然诸科学之间的沟通。

人们还可以考虑在每所大学设立一个关于复杂性和超学科性问题的研究中心，以及一些进行复杂的和超学科的探索的研究室。

第八章　思想的改革

启蒙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取决于启蒙。

康德

我知道一切，但我什么都不理解。

勒内·多马尔(René Daumal)

让我们回想一下笛卡儿《方法论》的第二和第三个原则：[①]

"把我研究的每一个困难问题分解为尽可能多的部分，这将是更好地解决它们所需要的……"

"按秩序推进我的思想，从最简单和最易于认识的对象开始，以便渐渐地好象上梯级，直到达到最复合的认识……"

第二个原则本身潜在地含有分离的原则，而第三个原则含有还原的原则，它们将支配科学的认识。

还原的原则包含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把对于整体的认识还原为对于其要素的加和的认识。但是今天，人们愈益接受下述观点，如同已经援引过的帕斯卡的话所指出的：对部分的认识依赖于对整体的认识，而对整体的认识依赖于对部分的认识。因此，在认识的许多阵线上涌现出系统论的概念：整体不能被还原为部分。

① "第一个原则是永不接受任何事物为真，除非我明显地认识到它是如此；这也就是说要小心地避免仓促和成见……最后一个原则是在一切情形中做最完整的统计和最全面的审察，以致我确信没有一点遗漏。"

还原原则的第二个分支倾向于把可认识的东西局限在可测定的、可量化的、可形式化的东西上，这是根据伽利略公理得出的：现象只应该依靠可测定的数量来描述。从此，还原为可量化的东西的原则禁止使用任何不能通过测量来表现的概念。但是无论是存在物、存在活动还是进行认识的主体都不能被数学化也不能被形式化。海德格尔称之为“吞吃计算的本质”的东西嚼碎了存在、性质和复杂性，而导致了“迷信数量分析”（索罗金 Sorokin）和“算术狂”（乔治斯居-勒冈 Georgescu-Roegen）。这个原则继续在技术—科学领域内享有权威；但是它变成深刻地成问题的，因为技术—科学本身已变成深刻地成问题的。

今天，这些原则被揭示了它们的极限，人们必须求助于我们在此重新引述的帕斯卡的原则：“任何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受到作用又施加作用，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所有事物，包括相距最遥远的和最不相同的事物，都被一种自然的和难以觉察的联系维系着。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种思想方式：

它懂得对部分的认识依赖于对整体的认识和对整体的认识依赖于对部分的认识；

它能够辨识和处理多方面的现象，而不是以肢解的方式使每个方面孤立于其他的方面；

它能够辨识和处理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斗争的实在（如民主政体本身，它是一个以对立和对对立的调节滋养自身的体制）；

它既尊重差异性又看到统一性。

对于一个进行孤立和分割的思想，应该代之以一个既区分又连接的思想。对于一个分解的和还原的思想，应该代之以一个关于复杂性的思想；按照 complexus 一词的原始含义，复杂的东西是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

其实思想的改革将不会从零出发，它在人文文化、文学和哲学中已有其先行经验，它只是准备进入科学。

科学

20 世纪的两次科学革命准备了思想的变革。

第一次科学革命是在量子物理学中开始的，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它引起了拉普拉斯宇宙的崩溃，决定论的教条的毁灭，任何关于作为宇宙的基础的简单构成单元的观念的倒塌，把不确定性引入科学认识。它特别由于巴什拉和波普尔引起了对于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的认识论问题的意识。

第二次科学革命实行了科学的大合并，引起了对有组织的集合体或系统的重视，这不利于在整个 19 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还原论的教条。还有如同我们已看到的（在第二章）像宇宙、自然、人类这样的完整的实体的复苏，过去它们被像红肠一样切割开、终于被瓦解，由于所谓的它们属于前科学的天真的意识，而实际上是由于它们在它们内部包含着分解/还原的思想方法所不能对付的复杂性。

虽然这两次革命的后果还没有完全展现，而第二次革命在许多领域（生命科学、人文的和社会的科学）里还保持着未完成状态，复杂性沿着过去它被逐出的各条道路重新侵入世界。大部分科学都发现了不同的领域，在其中简单的陈述是虚假的，“偏好规律的成见变得无益”①。此外，复杂性的理解原则已经形成：从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出发，自组织的概念已被制订，它适于设想自主性，而这对于经典科学曾经是不可能的。从巴什拉、波普尔、库恩、

① F.海克（Hayek）：《复杂现象的理论》，载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一书，Routledge and Kegan 出版社，伦敦，1967 年。

霍尔顿、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的著作开始，合理性与科学性已开始被重新定义和复杂化。因此，人们可以期望一场思想的变革平缓地展开。

在两个文化之间已开始建立联系。科学的思想家占据了由蜷缩在自身之内、停止反思科学带来的知识的哲学家遗留下的空位。这些思想家向一般文化贡献了从自己的知识出发作出的思考。因此雅克·莫诺、弗朗索瓦·雅可布、伊里亚·普利高津、亨利·阿特朗(Henri Atlan)、于贝尔·雷弗斯(Hubert Reeves)、米歇尔·卡塞(Michel Cassé)、贝尔纳·德斯帕尼亚(Bernard d'Espagnat)、巴萨拉布·尼科莱斯居(Basarab Nicolescu)、让-马克·莱维-勒布隆(Jean-Marc Lévy-Leblond)和许多其他人重建了两种分离的文化之间的联系，这引起产生了一种新的一般文化，比以前的更加丰富，适于处理现代人类的基本问题。

文学和哲学

在19世纪，当科学无视个别的东西、特殊的东西、具体的东西、历史的东西的时候，文学、特别是小说，从巴尔扎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再现了它们和揭示了人类的复杂性。诸科学完成自认为是它们的使命的东西，即消解表面的复杂性以揭示现实的被掩盖的简单性。文学事实上给予自己的任务是揭示被掩藏在简单表象之下的人类复杂性，它揭示个人受欲望、热情、梦想、癖好的支配，投入爱情的、竞争的、仇恨的关系之中，沉浸在他们的社会的或职业的环境里，遭遇事件和变故，经历他们不确定的命运。

所有文学杰作都是关于复杂性的杰作：对处于个人的独特性中的人类地位的揭示(蒙田)，现实被想象的事物所感染(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人类的激情的游戏(莎士比亚)。

不仅如此，文学还揭示了隐喻的认识价值，而隐喻是被唯科学主义的精神轻蔑地加以抛弃的。如同克尼阿泽娃(Knyazeva)和库尔狄莫夫(Kurdymov)所说："隐喻是文本或思想中一个局部的非线性状态的指示器，它是一个文本或思想向各种解释或再解释开放的指示器，以便在一个读者或对话者的个人的思想中产生共鸣。"①

隐喻唤醒了变成陈词滥调的观点或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诗人说："现实是一个我们通过隐喻得以摆脱的陈词滥调。"文学的隐喻建立了相距遥远和十分不同的现实之间的类比的关联，使人能够对它带来的解读产生强烈的感受。隐喻通过产生类比波，克服了事物之间的非连续性和隔离。它经常带来纯粹客观的或陈述性的语言所不能带来的精确性。因此人们更好地了解一个酒的品质不是通过物理—化学方面的说明，而是通过人们谈论酒的衣衫、身体、香味、腿肢。②

我们补充指出甚至在科学中也存在着启发性强的概念从一个学科向另一个学科的移植(参阅附录Ⅱ)。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③说过："一个概念没有比一个隐喻更多的价值，通常来说，它所有的价值要少。"而笛卡儿在他主要还不是一个笛卡儿主义者的时候说过："人们可能惊异于深刻的思想出现在诗人的作品里而不是出现在哲学家的作品里。理由是诗人运用了激情和发挥了形象的力量"(笛卡儿：《私人思想录》[Cogitationes Privatae])。

最后，我说复杂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人类的思想总是面对

---

① E.N.克尼阿泽娃和S.P.库尔狄莫夫：《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交会点上的协同性》(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克尔德什应用数学研究所。

② 这涉及用隐喻方式表达的品酒专家们的行话，分别表示酒的颜色、味道、气味等等。——译者注

③ 西班牙抒情诗人，1875—1939。——译者注

复杂性,而试图或是把它化简或是把它翻译。伟大的思想家总是作出对复杂性的一个发现。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规律如万有引力定律也是使得可能连接而不是化简不同的现象如物体的坠落运动、月亮不坠落的绕地运动、潮汐运动。任何伟大的哲学都是对于复杂性的一个发现,但是然后它在围绕所揭示的复杂性把其体系封闭起来时,它就闷杀了其他的复杂性。

根本性的改革

必要的思想改革将产生一种关于背景和关于复杂性的思维方法。它将产生一种进行连接和迎战不确定性的思维方法。

进行连接的思想将用环形的和多向度的因果性来代替直线的和单向度的因果性,它将用能够设想既互补又对立的概念的两重性逻辑(dialogique)来纠正经典逻辑的僵硬性,对于把各部分整合到一个整体中去的认识它将补充以把整体融化于各部分内部的再认识。

对于所有人类现象,它将把说明(explication)和理解(compréhension)联结起来。我们在此重复讲一下说明和理解的区别。说明是把认识对象仅仅作为对象来考察,对它应用所有解释的客观手段。因此存在一种客观的说明性的知识,它只考察必须确定其形式、性质和数量的对象,该对象的行为通过机械的和决定论的因果性被认识。说明对于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当然是必要的,但它对于理解人类是不够的。

另一种认识是理解性的,它建立于主体间的交流、感情移入、甚至同情的基础上。

因此我理解眼泪、微笑、欢笑、害怕、气愤,看到 ego alter 如同 alter ego,是通过我感受与他同样的感情的能力。理解因而包含主体对主体的同化和投影的过程。如果我看到一个孩子在哭泣,我

能理解他不是通过测量他眼泪的含盐量的浓度，而是通过在我身上重新发现了我孩提时的悲伤，通过把他同化于我和把我同化于他。理解，总是主体间的，需要开放和宽宏。

七个原则

我们可以提出进行连接的思维方法的七个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互相补充和相互依赖的。

1. 系统论的或组织性的原则：它把对于部分的认识和对于整体的认识联结起来，根据帕斯卡的指示进行来往穿梭的认识："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系统论的观念对立于还原论的观念，指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原子到恒星，从细菌到人类和社会，一个整体的组织产生被孤立看待的各部分所没有的崭新的性质或特性：涌现（émergence）。因此生物的组织产生在它的物理—化学的构成成分的层次上未知的特性。我们补充指出整体也同样小于部分之和，这时部分的特性被整体的组织所抑制。

2. "全息的"原则[①]：它展现了复杂组织的这个明显的悖论：不仅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而且整体也被纳入部分之中。因此，每个细胞是一个整体（总的机体）的一个部分，而整体本身也存在于部分之中：全部遗传材料存在于每个个别的细胞之中；社会作为整体也通过其语言、其文化、其规范存在于每个个人之中。

3. 反馈圆环的原则：这个原则曾被诺伯特·维纳引入以便认

① 受到全息现象的启发：在全息现象中每个全息点包含了它所代表的物体的几乎全部信息。

识自我调节的过程。它与直线因果性原则决裂：原因作用于结果，结果也作用于原因，如同在一个供暖系统里恒温器调节锅炉的工作。这个调节机制使得一个套房可能有对抗外部寒冷的热自主性。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一个生物机体的"体内环境稳恒态"是建立在多种反馈作用基础上的调节过程的整体。反馈（或 feed-back）的圆环在其负形式下可能减少偏差，从而保持一个系统的稳定；在其正形式下，反馈作用是一个放大机制，如同一个肇事者的暴力行动引起了一个暴力行动的反应，而后者又轮到它引起一个更加暴烈的反应。无论是起扩大作用的还是起稳定作用的，反馈机制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心理的现象中大量存在。

4. 回归圆环的原则：它超越了自我产生和自我组织的调节的概念。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圆环，在其中产物和结果本身又产生和引起产生它们的东西。于是，我们，作为个人，是来自久远的过去的一个繁殖系统的产物；但是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继续繁殖，是因为我们通过交媾又变成了它的生产者。许多人类个人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之中和通过他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但是社会作为涌现的整体，又通过带给他们所有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这些个人的人类性。

5. 自主/依赖（自我的—依靠环境的—组织）原则：生物存在是自我组织的存在，它们不断地自我产生，因此，消耗能量以维持它们的自主性。由于它们需要从它们的环境中汲取能量、信息和组织，它们的自主性与这种依赖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必须把它们看为自我的—依靠环境的—组织性的存在。自我的—依靠环境的—组织的原则显然分别以特殊的方式对人类和社会有效：人们依赖他们的文化发展其自主性，社会则依赖其地理—生态环境自我发展。

生物的自我的—依靠环境的—组织的一个关键方面是生物由其细胞的死亡引起的持续的自我再生，这个过程按照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提出的格言进行："依赖死亡而生存，依赖生存而死亡"，死亡和生命两个对立的概念在其中既互补又对抗。

6. 两重性逻辑(dialogique)的原则：它正好刚刚被赫拉克利特的格言所说明。它把两个本应互相排斥的原则或概念结合起来，这两个原则或概念在同一实在中是不可分离的。

人们应该设想自宇宙一诞生就发生的有序/无序/组织之间的两重性逻辑的关系：从热动荡(无序)开始，在某种条件下(偶然的相遇)有序的原则使得可能形成原子核、原子、星系和恒星。有序、无序和组织之间的两重性逻辑以最为多样化的形式，通过无数的相互—反馈作用，经常地在物理的、生物的和人类的领域发生作用。

两重性逻辑使得可能合理地接受矛盾概念的不可分离性以便认识同一复杂现象，比如尼尔斯·玻尔认识到把物理基本粒子同时设想为微粒和波动的必要性。个人在一定的观点下好似自主的粒子，而在另一个观点下他们在两个连续性——一个是族类、一个是社会——的内部消失了。这是因为当人们考察族类或社会时，个人不再存在；当人们考察个人时，族类和社会不再存在。思想应该以两重性逻辑的方式接纳趋于互相排斥的两项。

7. 把认识者重新引入任何认识中的原则：这个原则实行对主体的恢复，并对认识的中心问题进行解蔽：从知觉开始到建立科学理论，任何认识都是一个精神/头脑在一定的文化和时代的背景中所作的重构/翻译。

让我们重复说一遍，思想的改革的本性不是程序性的，而是范

式性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组织知识的能力。只有它使得可能达到造就构造得宜的头脑的目标,亦即实现智能的充分的运用。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清醒意识依靠着我们思想的组织方式的复杂性。

思想改革要整合两个文化中在两者的边缘产生的最重要的观念,这些观念从维纳、冯·诺依曼、冯·弗尔斯特(von Foerster)开始在数学家—工程师—思想家的世界里产生。[①]它将从而使这两个文化互相沟通,最终形成一个文化的两极。新人文科学将从这文化的两极的交流中涌现。这些人文科学将复苏探询精神,后者将使整体的和根本的问题充分地涌现。这样,对于每一个未来的公民来说,如果他必须走向专业化,将必须首先经过文化的洗礼。

人本主义(humanisme)将被重新产生。我们回想一下,当今欧洲的人本主义并不是只有雅典的遗产(公民享有城邦的最高权力,理性享有思想的最高权力)和犹太—基督教的遗产(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而上帝又化为肉身、降世为人)作为惟一的源泉。它也接受了科学的四个发现所揭示的东西以确定人类存在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摧毁各种人类中心论。首先是哥白尼,他取消了人类居于宇宙中心的特权;然后是达尔文,他使人类变成类人猿的后代,而不再是一个按照其造物主的形象造出的创造物。再次之是弗洛伊德,他使人类精神失去了神圣性。最后是哈勃,他把我们流放到宇宙最偏僻的效野之一。人本主义不可能再成为统治宇宙的骄傲意志的载体。它基本上变成了人类之间休戚与共的意识的载体,而后者又蕴含着对自然和宇宙的脐带关系。

这向我们表明,一个能够连接分离的知识和使之彼此相关的

① 参阅附录Ⅱ。

思想方式,还能够延伸为一门关于人类之间的联合和休戚与共的伦理学。一个不自闭于局部的特殊事物之中而能够考虑整体的思想,将适于促进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思想的改革因此将产生存在的、伦理的和公民的后果。

第九章　超越矛盾

今天,教育的问题被趋向于化归为一些可量化的项目:“更多的经费”,“更多的教员”,“更少的约束”,“更少的课程教材”,“更少的负担”。应该有更多的经费、更多的教员。应当重视班级学生数量的最佳值,以便教员能够个别地认识每个学生和依据他们的特殊性帮助他们。应该有在灵活性、减轻负担、进行规划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如果仅有这些改革,那么它们只不过是遮蔽思想改革的更大的必要性的小改小革。

事实上现有的改革规划在围绕着这个它看不见的黑洞旋转。只有精神被改革了它才是可见的。在此我们到达一个绝境:**人们不预先改革精神就不可能改革制度,但是人们不预先改革制度又不可能改革精神**。这是一个形成双重障碍的逻辑不可能性。

对于这个既是一重的又是二重的改革存在着强大的阻力。巨大的教育机器是刚硬的、僵化的、固执的、官僚化的。许多教员固守着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学科的最高权力。这些人,如同居里昂(Curien)所说,仿佛用排尿来标志它们的地盘的狼群,咬伤所有走入其中的动物。存在着一种顽固的抵抗,包括在精敏的头脑那里。挑战对于他们是看不见的。

对于每一个改革的试图,即使是小型的,也会引起抵抗的增长。如同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在尝试过他的一次小改革之后所说,“保守主义的抗拒被调动起来了,我也不知怎样使之停止下来”。至于我,在我提出“五个目标”的时候,我遭致迪阿法吕斯

(Diafoirus)父子和特里索坦(Trissotin)[①](他们的人口在莫里哀之后有极大的增长)的冷嘲热讽。

由于大部分人的头脑都是在封闭的专业化的模型中铸造出来的，超出这种专业化的认识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即使专业领域最狭窄的专家都有着他确信的关于生活、关于世界、关于上帝、关于社会、关于男人、关于女人的普遍观念。实际上，这些专家、行家们也依靠着普遍的和总体的观念生活，只是他们的这些观念带有任意性，从未加以批评的考察，从未加以反思。其实专家们的统治就是最空洞的普遍观念的统治，所有观念中最空洞的观念是如下观念：不需要有普遍观念。

在改革思想以便改革制度和改革制度以便改革思想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障碍之外，还要加上一个关系到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的更广大的障碍。这种关系不是像镜子似的反映式的，而是全息式的和回归式的。全息性：如同全息图像上的一个个别点在它身上含有被表现的图像的整体，学校在其特殊存在中含有整个社会的存在。回归性：社会产生学校，而学校又产生社会。

从而，如果人们不改革社会如何改革学校，但是如果人们不改革学校又如何改革社会？

我们刚才陈述的这两个矛盾在逻辑上是不可能被克服的，但是生活总是不介意这种不可能性。

关于学校—社会的关系，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作了一些说明。由于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圆环，每一项都产生另一项，所以施加于两项中之一项的任何改变性的干预，都趋于在另一项上引起改变。

---

① 这分别是莫里哀戏剧《没病找病》和《女学者》中的顽固守旧的角色的名字。——译者注

必须能够起步，而起步只能是违反常规的和遭受轻视的。与中世纪大学决裂的近代大学，在19世纪初诞生于柏林、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普鲁士的首都。但它此后遍及欧洲和世界。而它现在又需要改革。这个改革也将以不起眼和遭轻视的方式开始。如同常有的，创举总是来自少数人，在开始时不被理解有时甚至遭到迫害。以后思想被传播，随着它的散布，变成发挥积极作用的力量。

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答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问题："谁教育教育者?"这将是教育者的少数，他们被关于改革思想和更新教育的必要性所鼓舞。这将是在他们身上已经有了使命感的教育者。

弗洛伊德讲过有三个从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的职能：教育、管理(gouverner)、精神分析。这是因为它们不只是职能或职业。教育的职能的特点导致把教师归结为公务员。教育的职业的特点导致把教师归结为专家。但是教育应该重新变得不仅仅是一种职能、一种专业、一种职业，而是一个济世的任务：一项使命。

这首先是一个传授的使命。

传授显然需要技能，但它也在技术之外需要一种艺术。

它需要的东西在任何教科书里都没有提示，但是柏拉图早已作为任何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指出：éros[①]，这同时是欲望、快乐和爱情——传授的欲望和快乐，对于知识的爱和对于被教育者的爱。Éros使得可能控制与权力相连的快乐而有利于与付出相连的快乐。正是这个首先会引起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欲望、快乐

① 希腊文：情欲。——译者注

和爱情。

在没有爱情的地方，对于教育者只有职业和挣钱的问题，对于被教育者只有厌倦的问题。

使命当然以信念为前提，这是对文化的信念和对人类精神的可能性的信念。

使命因此是很崇高的和困难的，既然它必须同时以艺术、信念和爱情为前提条件。

Éros → 使命 → 信念 构成非宗教性的三位一体的回归的环路，其中每一项都滋养着其他项。

我们来概括一下教育的使命的基本特点：

提供这样一种文化，它使得可能进行区分、背景化、整体化，谋求解决多维度的、总体的和根本的问题；

培养迎战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的头脑，不仅使他们去发现宇宙、生命、人类的不确定的和随机的历史，而且在他们的身上促进策略性的智能和为着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博弈的精神；

为着在无论亲疏的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行教育；

教育归心于法国，归心于它的历史，归心于它的文化，归心于共和国的公民资格，并引入对欧洲的归属感；

培育地球公民身份，为此教授人类在人类学上的统一性和在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多样性，以及人类所处的全球纪元特有的命运共同体，在其中全体人类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重新发现使命

教育的五个目标——给予我们组织知识的能力的构造得宜的头脑，对人类地位的教育，学习生活，学习迎战不确定性，公民教育——是彼此相互关联的，而且它们应该相互促进。它们同样应该

通过连接两种文化而引起文化的复苏，并且我们现在即将看到它们会推动非宗教性(laïcité)的更新和认识的民主制的诞生。

被如此考虑的、必然地与文化的更新不可分的改革，本身也将是与法国的非宗教性的更新不可分的。在源自文艺复兴运动的非宗教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存在着一种探询精神，探询世界、自然、生命、人类、上帝是什么，它诞生了欧洲现代文化。我们的20世纪初的非宗教化的现实曾经使我们认为：科学、理性、进步将带来对于所有这些探询的回答。今天，不能再仅仅探询什么是人类、自然、世界、上帝，而应该探询什么是进步、科学、技术、理性。新的非宗教性应该探询什么是科学而揭示后者深刻的两重性。它应该探询什么是理性，而把开放的合理性与封闭的合理化对立起来。它应该探询什么是进步，后者并不取决于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自觉的意志。因此被更新的非宗教性可能创造一次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条件。

思想的改革也是民主的关键需求：培养能够迎战他们时代的问题的公民，这正是制止民主制度的衰败；这个衰败是由在所有政治的领域里各种专家、内行的权威的扩张而引起的，这造成公民们的权能被逐步缩小。公民们不得不盲目接受被认为懂行的人们的决策，而这些懂行者们的智能是近视的，因为它是被切分为小块的和抽象的。认识的民主制的发展只有在重组知识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后者要求思想的改革，使得不仅可能通过分解来认识，而且可能连接已被分离的东西，以便以新的方式重新产生被学科的瓜分所轧碎的概念：人类、自然、宇宙、现实。

思想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关键需求。我们今天是两种封闭思想的受害者：一种是官僚化的技术—科学的切分为小块的思想，它把现实的复杂的组织切割为红肠片；另一个是愈益封闭的蜷缩在种族或国家之内的思想，它把地球—祖国的组织分割为拼图板。因此我们需要在智力上重新武装我们自己，学习思维复杂性，迎接

公元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交接期的挑战,努力思索全球纪元的人类的问题。

这是对于新千年的公民们的极其重要的改革,它将使得他们可以最充分地运用他们的思想能力,并构成我们走出不开化状态的肯定不是惟一的但确是必要的条件。

附录

I　非宗教性的黑洞[①]

从表面上看，“非宗教性”(laïcité)一词的含义是清楚的：这是与教条对立的批评的合理性，这是与对真理的垄断相对立的多元性。而在20世纪初，在它为着进入学校和国家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中，非宗教性是被对立于天主教教会而加以定义的，当时教会在教育领域占有垄断地位，它努力树立它的教义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威，它不容忍其内部有多元性，它使自己与反动力量为伍。

第三共和国时期的非宗教性的概念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是，它并不是如此多地从关于容忍和多元主义的观念中，而是从它作为其载体的一种用科学性和合理性乔装起来的隐藏的宗教中，吸取其能量和热情的。这是建立在神圣的理性—科学—进步的三位一体基础上的“世俗—普救的”(catho-laïque)[②]宗教。理性和科学是并肩前进的，它们赶走了谬误和迷信，把它们的恩惠带给全人类。进步被生物进化所证实，又得到了“历史规律”的保障。实际上是具有独断的和狭隘的本性的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

---

① 此文1989年发表于《争论》(*Le Débat*)杂志。

② 原文catho-laïque是作者拼合catholicisme(天主教)和laïque(非宗教化的)而创造的一词，也可译为“非宗教化的天主教”或“世俗天主教”，作者借以讽刺唯科学主义的新崇拜。考虑到catholicisme在希腊文的词源学中含有“普遍性”之意(“天主教”意译因而应为“普救教”)，我姑且译为“世俗—普救教”。——译者注

科学，使这个宗教合法化。这是一个被僵硬化和神圣化的合理化（而不是合理性——本质上是不自满的和自我批评的）的系统，它几乎在理性的名义下被神圣化了。

但是在20世纪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非宗教性的外部的宗教敌人完全变样，而内部的宗教发生了瓦解。

一方面，当今的天主教会已不像往昔的那样：它实行让步，它容忍思想的多元主义，它不再与反动派为伍。

同时，20世纪愈益不得不发现理性的概念可以包括不仅是批评的理性，而且还有自满的合理化。理性的两重性和缺点已不仅被"非理性主义者"，而且被理性的批评，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所阐明。愈益明显的是：证明的确定性并不因而导致科学理论的确定性，后者仍然是假设的和猜测的。在广岛事件之后同样愈益明显的是，科学的发展是有两重性的，它的后果可能是破坏性的和威胁性的。自动的、必然的、无可怀疑的进步的概念到处都陷于危机之中，因此世俗—普救的宗教的基础从此崩坍。

世俗普救教虽然没有参与末日启示录般的神话，但是也从中吸取了某些好处。它继续背诵进步的祷文，但带着日益减少的热情和信念。

老的非宗教性曾相信自己在1984年被复兴，当时在有关私人学校的问题上它猛攻老的教派敌人。但是斗争的含义已颠倒了：私人学校已经变成有益的多样性的因素之一，而不再是对自由思想的威胁。很可能在1989年秋老的非宗教性重新相信在排斥伊斯兰教派敌人中获得新生。但是伊斯兰教与20世纪初的天主教不同，在教育中没有占据任何地位。它根本不是进攻性的——它没有强加以戴面纱，这只是它的很少数成员的一种表现。事实上，非宗教性阵营分裂为强硬的和温和的两派。这桩事提出了如此重要的关系到法国本征、文化共存和融合移民的问题，向我们揭示了非宗教性的负面的、空虚的黑洞。

非宗教性是否已经死亡了？是否应该过渡到其他事情上去？抑或是否应该把它"现代化"？依我看，不应该抛弃非宗教性，应该使它重返其源头。也不应现代化非宗教性，而应调动它反对现代的不开化状态和偶像崇拜。

应该重返非宗教化运动的源头。作为政教分离运动，第一眼看来它是宪法和捍卫一个多元主义的公共空间、各种思想观念的讨论、宽容等等，而实质上它是比20世纪初法兰西共和国的非宗教化运动所表达的东西更为深刻的和更为根本的某种东西。它是造成现代欧洲文化的独特性本身的东西，如同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发展所显示的：它同时是粉碎了中世纪的世界观的被普遍化了的探询精神的载体和结果——探询什么是上帝、世界、自然、人类、国家、真理。它同时是欧洲文化特有的两重性逻辑的载体和结果，这种文化不是被这样或那样的真理或学说来定义，而是被对立的思想观念和真理之间的对抗的、互补的、生动的关系来定义。因此非宗教性首先是永久的"探询性"（帕托卡 Patocka）、不断的诘问、总是复生的两重性逻辑，它造成和产生了欧洲文化所造成和产生的最丰富和最珍贵的东西。

正是这种探询的精神、这种诘问的态度应该在今天加以唤醒来反对新的不知其所以然的自明之理、新的偶像。今天应该被诘问、被质询的东西，不仅是延续到现代世界的各种既往的不开化状态和蒙昧主义，而且是从现代性中产生的不开化状态和蒙昧主义，后者有时与不开化状态的既往形式相联合，在我们的世纪汹涌泛滥。

因此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新的泛滥，这是技术—科学、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以及它们联合的后果所导致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官僚主义化、被普遍化的超级专业化、存在的被切割、个人的原子化、生态的和道德的退化，所有这些首先在现实的进步之中被带来，然后又愈益威胁着进步的本身，这是我们文明特有的未开化状态，是

我们自认为理性主义的精神的特有的蒙昧主义。科学所产生的明达,不仅伴随着知识在学科上的分裂,而且伴随着科学探险过程的盲目性,对不可控制的各种摆布的形式的解放,专家们的傲慢的和蒙昧主义的统治,而这些专家不能设想处于他们专业技能之外的东西,不能思考整体的和根本的问题。

非宗教性的世界应该知道,如同既往,新的敌人来自内部。今天的问题不再是摇动科学、理性、进步的旗帜,而是向它们质询;今天的任务是动员起来反对技术—科学的未加深思的"自明之理"。

而这又是一个事关民主的关键问题。现在在一些愈益广大的领域里发生着民主的退步。在这些领域里技术—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对每一个人至关重要的新问题——从热核武器直到遗传基因的操纵,以后很快还会有对脑的操纵,这些问题关系到生育、母性、父性、疾病、死亡、生命。在这些领域里建立了专家委员会,专家们在传媒中充其量只是把他们的看法加以通俗化;而公民们愈是被难理解的和专业化的知识的新的占有者们推向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权利就愈是被剥夺。专家们和内行们的社会特权集团不仅垄断了问题,而且把问题切成碎片和加以分散。

从而,今天的非宗教化的斗争将是争取促进认识的民主性的斗争。这曾经正是在20世纪初期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条件下提出的小学教师们的使命的含义。今天正是应该重操这一斗争和将之加以转变。

愈是今后我们的精神被从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困难和威胁中解放出来,进行这一斗争就愈有必要;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困难和威胁曾在数十年中迫使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尽力向人们阐明那"顽固的盲目之墙"[①]的倒塌最后证明的东西。今后我们可以思考民主制,部分地针对从极权政体产生的经验(这个极权政体即使处于非宗

① 指柏林墙。——译者注

教性的外表下，也是非宗教性所意味的一切的疯狂的敌人)，但已不需顾虑它所代表的危险。我们现在能够以专注得多的目光来注视我们的民主政体，不仅是为了致力于纠正它过去的不足和缺陷，而且是为了觉察它在技术—科学—官僚主义的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缺陷和新的倒退。

对认识的民主制的呼唤不仅仅是对晚间课程、夏季学校和民间大学的呼唤。这是对这样一种民主制的呼唤，在其中对基本问题的辩论不再仅仅是专家们的专利，而将交给公民们。一如既往，争取民主化的历史性努力遭到了“高级种姓”和“社会技术特权集团”的抵抗，他们掌握着一种垄断权，现在是“对现实问题的认识”的垄断权。

这样一种努力显然需要思想的改革来对技术—专业化的思维模式质疑，后者在今天被树立为仿佛是惟一合理的。这个改革已在这里、那里微弱地起步。已有整个的科学部门摆脱了分析的、隔离的、片段化的思维方式，比如从天体物理学产生的宇宙学、地球科学、生态科学，它们是把一个复杂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把它的这个或那个构成要素看做研究对象。

在这场新的战斗中小学教师们将发挥头等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这场思想改革运动的推动者，首先要在他们的思想中引入探求总体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的视域，他们应该走出被外部传媒世界围困的班级教室的城堡。

事关一个真正历史性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个任务是长期的、困难的、莫测的、需要调动每个人的意识的。20 世纪初的世俗—普救的意识形态的过时是否将使它停止遮掩黑洞？人们是否可以期望涌现一个新生的和在以后不断更新的非宗教性？

Ⅱ　相互间的—多项聚合的—跨越的—学科性[①]

学科是科学知识内部的一个组织范畴，它在那里建立了工作的划分和专业化，它适应科学所覆盖的领域的多样性。一个学科虽然被包含在一个更广阔的科学的整体中，但是通过它为自己划定的边界、它为自己构造的语言、它为自己制订的或使用的技术和最后特别是它所特有的理论，它总是自然地趋于独立。学科的组织是在19世纪建立的，特别伴随着现代大学的形成，然后在20世纪它随着科学研究的飞跃而发展。这说明各学科有一个历史：出生、定型、进化、衰退，等等；这个历史处于大学的历史之中，而大学的历史处于社会的历史之中；因此学科属于科学社会学和认识社会学的范围。学科因此不仅从属于一种认识和一种对于它本身的内在的反思，而且也属于一种外在的认识。因此只耽在一个学科内部来认识与之有关的一切问题是不够的。

专业化的效能和超级专业化的危险

学科的有效性已在科学史上得到证明：一方面，它为一个技能的领域划定了边界，而没有这个边界认识将变得捉摸不定；另一方面，它为科学研究揭示、提取或建构了特别的对象。在这个意义

---

① 本文的第一稿曾经发表于《科学的交叉口》——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研讨会“学科间”的会议录，CNRS出版社，巴黎，1990年。

上马塞兰·贝特洛(Marcelin Berthelot)[①]说化学创造了它自己的对象。学科的确立同时引起了研究者的超级专业化(hyper-spécialisation)的危险和被研究对象的“实物化”的危险,人们有可能忘记那是个被抽象出来的或被建构的对象。学科的对象这时有可能被看做好像是自足的事物。这个对象与被其他学科处理的对象之间的联系与依存性,将如同它与其参与构成的宇宙之间的联系与依存性一样被忽略。学科的边界、它的语言和它特有的概念将使该学科孤立于其他的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超级的学科性的精神将变成地主的精神,禁止任何外人对他的小块知识领地的侵入。人们知道“学科”(discipline)这个词在起源时是指用以抽打自己的小鞭子,因此具有自我批评的含义。而在其倒退的含义中,学科变成了抽打敢于擅入被专家视为他的产业的思想领域内的人的工具。

来自学科外的目光

但是开放是必要的。甚至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不属于该学科甚至任何学科的业余爱好者的天真的探视解决了一个问题,其方法是在该学科内部看不见的。天真的窥探显然不知道现存理论为制订一个新的观点所设置的障碍,因此可能常常是错误地但有时会是正确地允许自己采取这一观点。因此比如达尔文,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业余爱好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②]把达尔文的缺乏大学专业化培养看作他的有利方面,还有达尔文的甚至缺乏生物学教育,在这方面只是他对动物和对他的鞘翅目标本收藏品的热爱给予了他知识。芒福德总结道:“由于缺乏学校教育的僵固性和禁忌,没有什么东西阻止达尔文对于生物环境中的

① 法国化学家,1827—1907。——译者注

② 美国社会哲学家,1895—1990。——译者注

每一表现保持警觉。"同样,气象学家韦格纳(Wegener)[1]在天真地注视南大西洋的地图时,觉察到西非洲和巴西的海岸相互配合。再注意到大洋两岸的由化石表现的和现有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相似性,他在1912年制订了大陆漂移理论。但是这一理论长期被专家们加以拒绝,因为"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undenkbar[2])",但是在五十年以后,特别是在发现了板块构造地质学之后,它得到了承认。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的土地,而是获得新的目光。"雅克·拉贝里(Jacques Labeyrie)向我们建议下述的定理让我们付之检验:"当人们在一个学科内找不到解决办法时,解决办法来自学科之外。"

学科之间的越界和巡回

如果有人说达尔文和韦格纳的情况是异常的,我们也可以很快地指出:科学的历史不仅是学科建立和增生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一个学科的问题侵入另一个学科、概念流通、混合的学科形成(这些学科将以独立而告终)……的历史,最后它还是不同的学科聚合或粘合起来形成复合体的历史。换句话说,如果科学的正式的历史是学科性的历史,那么它的另一个相连的和不可分的历史就是相互间的—多项聚合的—跨越的学科性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革命"就产生于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边际上发生的学科间越界、相接和移植的现象中。是像施罗丁格(Sehrödinger)这样的物理学家把热力学的和物理组织的问题投射到生物机体。然后一些不重要的研究者力图从ADN(脱氧核糖核酸)的化学蛋白质出发发现遗传物质的组织。人们可以

---

① 德国气象学家,1880—1930。——译者注

② 德文:不可想像的。——译者注

说分子生物学是产生于“不合法的”野合。在50年代它没有任何学科地位，它在法国获得这一地位是在莫诺(Monod)、雅可布(Jocob)和利沃夫(Lwoff)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这个分子生物学于是独立了，然后轮到它趋于自我封闭，甚至变成帝国主义，但是这些将如同吉卜林(Kipling)[①]所说的，属于另一个历史……

巡回

某些概念流行着，常常秘密地越过边界而没有被“海关人员”查获。与这传布广泛的观念——“一个概念只有在它被产生的学科领域里才是适当的”——相反，某些巡回的概念使一个新的领域变得丰饶，而且它将在那里生根，即使付出走样的代价。B.曼德尔布罗特(Mandelbrot)甚至说：“科学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惟一普遍有效的，就是由一个有才能的研究者操作的走样。”事实上，相对于一个参考系统的错误可能在另一类系统中演变为真理。出自社会实践的“信息”概念，在申农(Shannon)的理论中取得了精确的新的科学含义，然后它被移植到生物学中以被纳入基因的组织中；它在那里与出自司法语言的“法典”(code)的概念相结合，这一概念在遗传密码(code génétique)的概念中被生物学化了。分子生物学经常忘记：没有这些具有人类—社会学形态的起源的概念——遗传、法典(编码)、信息、消息等等——生物的组织将是无法理解的。

更为重要的是认识图式从一个学科向另一个学科的转移，因此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如果没有经常在纽约的大概是酒吧里频繁会见已经草创了结构语言学的R.雅各布森(Jakobson)[②]，恐怕不能创立他的结构人类学；此外，如果雅各布森和莱维-斯特劳斯两人不都是欧洲的难民——前者在几十年前逃避俄国革命，后者

---

① 英国小说家、诗人，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1865—1938。——译者注

② 美籍俄裔语言学家，1896—1982。——译者注

离开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他们恐怕也不会相遇。由于被赶出被纳粹或斯大林主义占据的大学的科学家的移居，导致思想、概念的巡回和理论的结合和转变，其例是不胜枚举的。这是一个证据，表明对于学科的固步自封和保守主义的一个强大的解毒剂来自历史的大地震(包括世界大战)、社会的骚乱和动荡，它们偶然地引起相遇和交流，这使得一个学科可能散布一粒种子，从它里面将诞生一个新学科。

学科间的和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案

某些科学观念保持着它们的生命力，因为它们拒绝学科的封闭。编年史学派的历史学就属于这一类，该学派过去在大学中占据一个次要的位置，而现在获得了极大的荣耀。编年史的历史学是通过消除隔障而建立起来的：它在历史学中首先实行了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观点的深刻的贯穿；然后第二代历史学家又在历史学中实行了人类学观点的深刻的贯穿，如同迪比(Duby)[①]和勒戈夫(Le Goff)[②]关于中世纪的著作所表现的。如此被丰富了的历史学不再能够被看作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这是一部多焦点、多维度的历史科学，在其中也存在若干其他人类科学的维度；总体的观点远没有被特殊观点的多样性所驱逐，而正是为后者所需要的。

某些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复杂化过程不仅要求十分多样的学科的参与，而且同时还要求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技能。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存在于史前学中：以利基(Leakey)在南部非洲的重大发现(1959 年)为起点，史前学就以原人进化为研究对象。原人进化不仅是解剖学的和技术性的演变过程，而且也是生态学的(大草原代替了森林)、遗传学的、动物行为学的(涉及行为)、心理学

---

① 法国历史学家，1919 年生。——译者注

② 法国历史学家，1924 年生。——译者注

的、社会学的、神话学的(研究可能构成对死者的崇拜和对彼世的信仰的东西的痕迹)演变过程。在沃什伯恩(Washburn)和德沃尔(De Vore)著作的系列中,今日的史前学(致力于研究原人进化)一方面依据高级灵长目的动物行为试图认识一个先进的灵长动物的社会如何可能过渡到原人社会,另一方面依据原始社会这个进化过程的抵达站的动物行为学。史前学愈益借助十分多样的技术,特别是为着推断骸骨和工具的年代,分析气候、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等等。史前学家在把这多种学科与他们的研究结合起来时变成多技能的,比如当科庞斯(Coppens)①撰写他的工作总结时,他产生了一部论述人类演变的众多方面的著作。史前学在今天是一门多技能和多学科的科学。这个例子表明了建立学科间的、多学科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案可能创造交流、合作和多面手。

重组的认识图式

同样,从不仅生态龛的概念而且生态系统(群落生境和生物群落的结合)的概念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起(唐斯利 Tansley, 1935),生态科学也形成了学科间的和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案,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有一个具有系统性质的起组织作用的概念可能把最多样的知识(地理学的、地质学的、细菌学的、动物学的和植物学的)连接起来。生态科学曾经不仅能够利用不同学科的帮助,而且还创造了一些多面手科学家,后者具有处理关于这类组织的基本问题的能力。

研究原人进化过程的例子和生态系统的例子表明在科学史上存在下述情况: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认识图式来超越或改造各学科,汉森(Hanson)把这叫做"回溯推理"

① 法国古生物学家,生于1934年。——译者注

(rétroduction)。分子生物学例子表明这种超越和改造可以通过发明新的解释性假说来实现,皮尔士(Peirce)把这叫做“假设推理”(abduction)。新的假说和新的认识图式的结合使得可能实现分离的学科之间的组织性的或结构性的连接,使得可能认识在当时被分离的东西之间的统一性。

关于宇宙也是这种情形,过去它从被分割的学科中被驱赶出去,以后又随着天文物理学的发展凯旋式地回归,这些发展特别是哈勃在1930年观察到星系的扩散,1965年发现了宇宙背景上的各向同性的辐射,以及融贯实验室微观物理学的知识以便认识天体上物质和生命的形成。从那时候起天文物理学就不再仅仅是一门产生于物理学、微观物理学和观察天文学之间愈益紧密的结合的科学,它还是这样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使得从它自身涌现出一个宇宙学的认识图式,后者可能把十分不同的学科的知识彼此连接起来以便认识我们的宇宙和它的历史,同时又在科学中引入了(通过复兴对于这个关键问题的哲学兴趣)在此之前似乎仅仅属于哲学思辨的东西。

最后还有极为丰产的杂交的情况,这大概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它与工程师和数学家们之间的相会有关。这些相会先是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大战进行正酣的阶段,然后发生于50年代。这种相会使得丘奇(Church)和图灵(Turning)已开始的数学研究能够与技术研究会合起来以创造自我操控的机器。后者导致形成维纳称之为控制论的东西,该理论融合了申农和韦弗(Weaver)在贝尔电话公司工作的背景上构想的信息论。一个真正的形式认识和实践认识的集合体当时在各门科学的边缘、在科学和工程的边缘形成。这个新的观念和认识的集合体的发展创造了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新的统治。冯·诺依曼和维纳是丰产的多种能力的头脑的典型例子,他们的才干适应不同的实践和

基本理论。

超越学科的领域

这几个仓促提出的、片段的、不连贯的、散乱的例子旨在展示一些情况的令人惊异的真相。在这些情况中，或是通过概念或认识图式的流通，或是通过越界或相互干预，或是通过把学科复杂化为多技能应用的领域，或是通过新的认识图式或新的解释性假说的涌现，最后或是通过构成可能把各学科领域连接在一个共同的理论系统中的组织性概念，如此来打破学科间的隔绝状态，从而推进科学的发展。

今天，应该意识到这个方面是正式的科学历史所最没有阐明的东西，它有点儿像月球黑暗的背面。各学科的合理性在理智上被充分证实以下述事实为条件：它们保有一个承认和设想联系和相互依存性的存在的视域。此外，它们的合理性的被充分证实还要求它们不遮蔽总体的实在性。比如，人的概念现在在不同的生物科学学科和所有的人类科学学科之间处于被肢解的状态：一个学科研究心理现象，另一个学科研究脑，第三个学科研究机体，还有其他的学科分别研究基因、文化，等等。但是复杂的人类实在的这许多方面只有在它们被连接于这个实在而不是无视它之时才具有意义。人们肯定也不能创建一门单一的关于人的科学，这门科学本身会消除人之为人的复杂的多样性。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人存在着，他不是前科学的人本主义的“天真”幻想。否则人们最终将达到一种荒谬性(事实上在人类科学的某些部门里人们已经到达这种地步，在那里人的不存在已被宣布，鉴于这个两足动物进不了这些学科的范畴)。

另一个意识同样是必要的，这个意识被皮亚杰(Piaget)称为科学的圆圈，它建立起不同科学的事实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

科学处理人，但人不仅是心理的和文化的存在，而且还是生物的存在，因此人类科学应该以某种方式扎根于生物科学，生物科学应该扎根于物理科学，而这些科学中的任何一个显然都不能被还原为另一个。不过，物理科学也不构成所有其他科学都建立于其上的最终的和原始的基础；尽管它是基本的，但在下述意义上它也是人类科学：它出现于一定的人类历史中和一定的人类社会中。能量概念的制订与19世纪西方社会的技术化和工业化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切都是物理的，但同时一切都是人类的。因此，巨大的问题是找到科学之间彼此连接的困难的途径，这些科学中每一个不仅有其特有的语言，而且有其不能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基本概念。

范式的问题

最后，必须意识到范式的问题，因为它建立主导的概念及其间的逻辑关系（析取、合取、蕴涵，等等），而这些东西以隐蔽的方式支配着在它的帝国中运行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但是今天，一个新的认识范式以分散的方式涌现，它开始能够在不相沟通的科学和学科之间建立桥梁。确实，（决定论—机械论的宇宙观所表现的）排除无序性的有序性范式的统治已经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裂缝。在不同的领域里，有序的概念和无序的概念被愈益迫切地要求看作是互补的而不仅仅是对立的，不顾这样做提出的逻辑困难：在冯·诺依曼那里（自我再生的自动机的理论）和在冯·弗尔斯特那里[①]，有序性和无序性的连接已经在理论的层面上出现；它在普利高津的热力学理论中成为必要的，表明组织化的现象在涡流的条件下出现；它又以混沌的名义被引入气象学，从戴维·鲁艾尔（David Ruelle）的著作和思考开始，组织性混沌的概念变成物理学中处于中

① 他提出了 order from noise（来自噪声的有序）的原则。——译者注

心地位的。综上所述，从不同的视域出发，都到达了如下观念：有序、无序和组织应该被一起思维。科学的任务不再是把无序从它的理论中驱逐出去，而是探讨它。科学也不再化解组织的概念，而是认识它和引入它来建立小块的学科之间的联邦。这一切说明一个新的范式可能正在诞生……

环学科的(éco-disciplinaire)和元学科的(méta-disciplinaire)

我们再回到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é)、多学科性(multi-或poly-disciplinarité)和跨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é)的术语上来，它们难以定义，因为他们是多含义的和模糊的。比如，学科间性完全可意味着不同的学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如同不同的国家集合在联合国只是为了肯定它们各自所有的国家权利和反对邻国侵犯的主权。但学科间性也可以表示愿意交流和合作，这使得学科间性可以变成某种有机的东西。多学科性是根据各科学共有的一个规划或一个对象建立的学科间的联盟，有时各学科如同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一样被招拢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有时相反的它们处于深入的相互推动之中以便协力认识这个对象或这个规划，如研究原人进化的例子。关于跨学科性，这经常涉及能够横贯诸学科的认识图式，它有时带有超强的力量使诸学科俯首听命。事实上，正是这学科间性、多学科性、跨学科性的复合体在科学的历史上发挥了作用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应该牢记其中蕴含的关键的概念，也就是说合作；较好一些，是连接、共有对象；更好一些，是共有规划。

最后，并不是只有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的观念。我们应该把各学科“环境化”(écologiser)，也就是说考虑到所有在此作为背景的东西，包括文化的和社会的条件；也就是说应当看到它们是在什么环境中产生、提出问题、变得僵固、发生迁变的。还应有元科学性，术语“元”(méta)意味着超越和保留。人们可能粉碎由学科建

立的东西；人们不能粉碎任何围栅。学科必须既开放又封闭。对于学科的问题、科学的问题以至生命的问题都应这样看待。

总而言之，分成小块的知识有什么用？还不是相互对照形成一个适当的形式以回答我们在认识上的期待、需要和探询？我们还应该想到超出学科的东西对于该学科也是必要的，为了它不自我满足和最终贫困化。这使我们想到三个世纪之前已由布莱斯·帕斯卡提出的认识的绝对要求，它肯定了各学科的正当性同时又要求拥有一个元学科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受到作用又施加作用，既是间接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所有事物，包括相距最遥远的和最不相同的事物，都被一种自然的和难以觉察的联系维系着。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

他可以说在建议一种运动中的认识，一种从部分走向整体又从整体走向部分的在穿梭中前进的认识，这是我们共同的志向。

Ⅲ 移民、同化

移民们肯定会遭受许多困难、很大的痛苦和屈辱，他们既会体验到欢迎、接受、友谊，又会体验到拒绝、摒弃、鄙视、侮辱。但是地方上的排外的反应，十分刻毒的反犹太主义的继续都未能阻止法国同化的进程，在两代或至多三代的时间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东欧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世俗化的犹太人都被融合，直到通过通婚而发生混血。因此，尽管有强大的障碍，在半个世纪里，非教会的和共和制的法国同化机器可惊叹地工作着。

这个机器今天是否生锈了？它是否碰到了它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愈益被人反复提出。

新的困难

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法兰西运动中曾经有一个转变，即它不再是把一些领地变为行省，而是把入境移民归化为它的国民。今天，新的条件似乎应该要求第二个转变。

首先，来自巴尔干半岛、马格里布(Maghreb)[①]、黑非洲、亚洲(巴基斯坦、菲律宾、中国)的大量移民带来了宗教气氛或肤色风景线上的异国情调。但是应该注意到，自从移民接受法国公共生活的非宗教性标准——这是归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时起，他们自己的宗教不再成为一个障碍。这已经是前几代的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中间的事实，他们如同天主教徒一样可以以私人名义保

---

① 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总称。——译者注

留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还应该注意到海外领地的黑人已经加入了法国籍,如同越南人和中国人。而流入量的增大应当促使我们想到扩大了的多民族的和多种族的特点变成了法国本征中的一个新的构成部分。法国本征将如同在南、北美洲的国家的本征中已经发生的那样,在自身中包含在其基质上融合全球多样性中的所有民族成分的可能性。

其次,我们进入了一个具有多重面目的本征(identité)遭逢危机的阶段。省份的和国家的这样的两重本征已经不能平静地保持,因为技术—经济大潮在全球的汹涌澎湃带来的文明的均一化的巨流威胁着第一重本征。从而出现了语言上、文化上和经济上自卫的区域性的反应。其激烈性甚至使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以保护被威胁的本征。如下一个问题也同样在移民身上存在,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他们希望既享受西方现代化的好处,又不因此在那里失去他们的本征。结论是:法国本征应该保持为双重本征,它今后应该注意尊重——包括对待法国人自己——民族的/文化的多样性,这导致超越"雅各宾主义"。

第三点,法国同化的问题今天存在于现代城市文明发生危机的背景下。有损都市利益的居民点和郊区化的发展,团结性和共生性的丧失,个人的原子化,生活的精确计时化,所有这些冲击着全体法国居民的东西促使近期入境的移民蜷缩于他们的集中居住区内,保护着他们在民族起源甚至部族联系上的团结性。而这促进了郊区居民中的青少年——法国出身的或不是,他们构成我们社会最薄弱的环节——形成常常是在民族性上自我封闭的帮伙,这对同化产生了附加的阻力。无论如何,城市生活的危机助长了好斗性和排外性,而且一如既往,矛头指向生活于社会边缘的和异族的替罪羊。因此,一个各方的敌对性在其中彼此滋长的因果环愈益被加强。

第四点,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海湾战争和原教旨主义的新

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展开，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欧洲—西方世界之间的极端紧张状态周期性地反复发生。只要中东危机和特别是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有如达摩克利斯剑继续威胁着我们的未来，这种紧张状态就不会趋于缓和。不能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在法国的各民族“社区”之间没有爆发公开的冲突，就认为在人们的头脑中一切是平静的。彼此之间的无声的但是畏怯的或怀恨的紧张心情，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出身的人口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无形的和强大的障碍。卡勒布·克尔卡尔(Kheleb Kelkal)的案例表明了许多马格里布出身但是诞生在法国的青年人摇摆于归化、犯法和恐怖活动之间的情况。

最后，对于南欧和东欧贫困的移民涌入一个必定遭受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威胁之苦的社会所带来的恐惧，创造了一种适于推动盲目排外的气候。总而言之，如果西方的经济保持繁荣，应当期待旧的移民潮的增长和新的移民潮的出现。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心理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许多条件都很不利的时刻，法国吸收移民的过程能够扩大吗？

保持法国的多彩性[①]

首先，让我们撤销确定一个文化可以接纳的移民的比率的任何抽象的数量标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可以同化一个很大数量的移民。因此，从20世纪初起，只有二百万居民的卡塔卢尼亚(Catalogne)[②]地区竟能“卡塔卢尼亚化”六百万非卡塔卢尼亚人。卡塔卢尼亚文化的力量在于它是一种其语言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讲说的城市文化，而不是一种乡村的民间残余文化。法国文化是

① 这是一个双关语：法国的国旗具有蓝、白、红三色，而法国的社会构成又因为吸收移民而具有多种肤色共存的特点。——译者注

② 这是一个西班牙地区。——译者注

非常强有力的。这是一种城市文化，它包含一个普及的和强大的教育系统。这是一种具有非宗教特点的公共的和公民的文化，正是只有这种非宗教性能够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融合，亦即接受和容纳种族的多样性。正是非宗教的文化同时构成了法国最独特的特点之一和同化外来人口的必要条件。

但是我们应该停止把雅各宾主义和非宗教性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应该相反地把抛弃雅各宾主义与更新非宗教性联系起来。从而我们的文化可以更多地开启它潜在的普遍性，接受一个多民族的和多种族的法国的观念；这个法国在向不同的肤色开放的时候，将永葆法国的多彩性。

由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的少数派建立的美国，看到了全球最大的移民潮向它汹涌而来，目击了在它内部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人口的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而它毫未丧失它国家的吸收、同化的机能。后者是建立于它的宪法的原则的基础上，美国人追求成功的梦想的基础上以及它的通过电影和电视被传播的统一的风俗、趣味、姿势和说话方式的基础上。美国人拥有强大的文化，这是他们特有的使他们能够不顾无数的混乱、暴力和罪行，吸收任何来源的移民和制造美国人的保障。法国是不同的，但它的地位处于长期向外移民而不知怎样融合入境移民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在本性上是个吸纳移民国家的美国之间。

因此问题在原则上不在移民的数量上。问题在于如何保持法国文化和文明的力量。这个问题与法国社会的变迁所提出的既是根本的又是多方面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说过城市文化和教育是使移民法国化的基本要素。但是现在城市处于危机之中，而教育又趋于僵化。文明的颓败同时是我们文明的主要问题和法国同化事业的主要问题。

一个强大的文化可以融合移民，但是在它发展的条件下，而不是在它处于经济的和道德的危机的时刻。今天一切都联系在一

起：政治、经济、文明。人们开始看到在城市/郊区/住宅/个人原子化/青年人/毒品/移民/失业者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虽然每一个问题都包含它的特殊性。

阿维森纳(Avicenne)①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②之后也讲过：应该医治疾病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症状。但是他又说：在疾病最恶化的时候，需要紧急地医治症状。因此，今天需要减轻症状(住房、经费、娱乐、体育等等问题)，但是不应因此忘记最主要的问题，即必须制定一个关于文明的政策。

一项关于文明的政策，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③，旨在更新城市，更新教育；它将努力重振团结的精神和激起或重新激起共同生活的意识。这若干取向不提供解决办法，它们只是指出思考这些主要问题的必要性，这些问题如果被空洞的话语掩盖起来就将变得更为空洞。它们指示了一个方向。

不应排除下述假设：我们被淹没在连锁的危机之中，从而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退步导致法国同化事业的中止。相反，经济的，社会的或政治的进步本身蕴含着对法国同化事业的推进。

最后，必须把移民问题放置于它的欧洲背景下。今天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处于人口危机之中，所有西欧的和北欧的国家都拥有移民人口。因此，法国的吸收移民入籍和通过学校同化他们的模式可能变成一种欧洲模式，它将可能使欧洲在人口上年轻化和取得它作为地球之省份的新的和未来的条件。再者，现在可以考虑一种欧洲公民资格，使得移民们可能把我们欧洲之外的起源国省份化，达到一种新的多重本征。即使在这个欧洲概念的内部，法国

① 波斯医学家和哲学家，980—1037。——译者注

② 古希腊医师，有“医学之父”之称。——译者注

③ 参阅埃德加·莫兰和萨米·纳伊尔(Sami Naïr)：《关于文明的政策》，Arléa 出版社，1997 年。

的独特性仍将保持，既然——我们重复说一遍——法国的历史是混合于法兰西化的历史的。

在这里，对未来的探索又一次需要回溯源头。由此产生了我们的信念：继续推进千年的法国、革命的法国、共和的法国、世界主义的法国，这同时就是继续推进法兰西化。这是在欧洲的一体化中继续保持法国的独特性。但是这样一种继续需要深刻地更新文明。路途将是漫长的，困难的，不确定的，并将伴有血和泪。

Ⅳ 主体的概念

行动、生活、保持其存在，这三个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

斯宾诺莎

活的实体是真正是主体的存在。

黑格尔

这是一个既明显又神秘的概念。一从某人说“我”起，这个明显性就显得非常平凡。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具有这个单数第一人称；如果语言没有代词，它们至少如同在拉丁语中那样，有具有单数第一人称形态的动词。还存在被笛卡儿阐明的第二个反思的明显性：“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此我在思想。如果我在思想，那么我在，也就是说我以第一人称形式作为主体而存在。”于是就产生了这个神秘：什么是这个“我”和这个不是简单的“est(在)”之“suis(我在)”？①

这是一个次要的表象还是一个根本的实在？对于整个哲学传统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实在。看来在《圣经》中情形也是如此：当摩西(Moïse)②向以火烧的荆棘丛的形状向他显现的超然存在询问：“你究竟是谁？”时，回答如同被译为法文的是这样的：“Je suis

① est是法语动词être(“在”)的变位的单数第三人称的形式，而suis是其单数第一人称的形式，即“我在”之“在”。——译者注

② 《圣经》中述及的古犹太人的领袖和先知。——译者注

celui qui suis"[①]或"Je suis qui je suis"[②],这就是说摩西的上帝是绝对的主体性。

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我们力图以决定论的方式考察社会与个人时,主体就消失了。

事实上,根据我们时而用反思的或理解的方式看待世界,时而用科学的和决定论的方式看待世界,我们的头脑被分割为两半,主体出现于对于自我的反思中,遵循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理解性的从主体到主体的主体间的认识模式。反之,在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还原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认识中它就隐没。科学可以说排除了人类科学的主体,因为它的决定论的和还原论的原则在它的领域里被普及。主体被从心理学中驱逐,从历史学中驱逐,从社会学中驱逐,我们可以说阿尔都塞(Althusser)、拉康(Lacan)、莱维-斯特劳斯的观念的共同特点就是希望清除人类主体。

但是在结构主义时代的思想家那里有着主体的姗姗来迟的复归,比如在福柯(Foucault)那里,在巴特(Barthes)[③]那里。但这是生存存在的复归,伴随着情欲的复归、文学的复归,而不是理论内部的主体的复归。

我想提出的是一个主体的定义,它不是从爱情出发,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具有一个生物—逻辑学的基础。

为了建立这个定义,必须接受今天开始被引入科学领域的一定数量的概念,首先就是与自组织概念不可分的自主性(autonomie)的概念。

我讲的自主不再是一种摆脱任何依赖的绝对自由,而是依赖于其环境的自主,无论这环境是生物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因此

① "我是我所是的那个人。"——译者注

② "我是我所是者。"——译者注

③ 法国批评家,1915—1980。——译者注

一个生命存在，为了维持它的自主性而工作、消耗能量，显然必须利用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能源来滋养自己。我们这些人，作为文化的和社会的存在，我们只有从对于文化、语言、知识的起始的依赖性出发才能获得我们的自主性。自主性不是绝对的可能的，而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可能的。

其次我们需要个体的概念作为主体的概念的先决条件。但是个体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固定的和稳定的。如同我们所知的，在生物学思想史上存在两个相反的倾向：一个倾向是认为个体是惟一的实在，因为在形体上人们只看到个体而从来没有看到过种族；另一个倾向是认为种族是惟一的实在性，既然个体只是种族的短暂易逝的样本。根据一种观点个体消失了，根据另一种观点种族消失了。这两种观点互相否定。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于这两个观点做出尼尔斯·玻尔对于波动和微粒所做出的同样的事情：这是两个看起来对立的观点，但是它们对于理解同一个实在是互补的。

因此有一种观点引导我们寻求个体和种族之间的复杂的联系，我们还可把同一推理应用于个体/社会的关系上。

从生物学观点来看，个体是一个再生循环的产物，但是这个产物本身在这个循环中又是生产者，既然是个体通过与异性个体的交配产生了这个循环。因此我们同时是产物和生产者。同样，在考察社会现象时，是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但是社会又以其文化、规范反作用于人类个体，并把后者作为赋有一定文化的社会的个人产生出来。

从而，我们现在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关于自主、关于个体的概念；我们还缺乏主体的概念。为了达到这个主体的概念，必须想到任何生物组织都需要一个认识的方面。基因构成具有认识/信息的本性的世代相传的遗产，正是这个知识的遗产给细胞的工作编制了程序。同样，生物存在不管有无神经—脑系统，都从其环境提取信息和进行与它的生物实践不可分的认识活动。换言之，认识

的方面是生命不可缺少的。

这个认识的方面也可称作运算的。运算是对刺激、数据、信号、征象、消息等等无论是其中哪一个的处理，使我们能够既在外部世界中又在我们的内部世界中进行认识和行动。

下述一点至关重要：主体概念的本性与它的运算的个体性紧密相关，这是我们能够制造的所有人工的电脑所没有的。这种个体存在的运算是每个个体从它本身出发、经由它本身和为着它本身而进行的。这是一个 camputo[①]。我运算是主体据以构成自身的行动，在这个行动中主体把自己放置在它的世界的中心来处理这个世界，考察这个世界，还包括所有保存、维护、自卫等等的行动。

因此我将说主体的第一个定义是自我中心主义(按照此词的直接含义)：把自身置于其世界的中心。此外，“我”，如同人们经常注意到的，是一个无论谁都可以说出的代词，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我的地位上说出它。“我”是占据变为世界中心的位置的行动。关于这点，我说存在一个本征的“软件的”原则，它可以被概括在下述公式中：“Je suis moi.”(法语：我是我。)[②] “Je”(我)，这是占据自我中心的位置的行动；“moi”(我)，这是占据了这个位置的存在物的客观化。“Je suis moi”是这样一个原则，它使得可能建立“Je”(主观的主体)和“moi”(被客观化了的主体)之间的区别，同时又建立它们之间不可分离的同一性。换言之，主体的本征包含了

① 拉丁语：我运算。——译者注

② 法语原文“Je suis moi”一句汉语可译为“我是我”，但由于法语和汉语语法上的区别，汉语翻译不能把法语原句中的微妙含义全部表达出来。主要区别是该句中的前后两个“我”字在法文中词形是不同的，而在中文中是同一的。在法文句中前一个“我”——“Je”是“我”的主语形式，而后一个“我”——“moi”是“我”的宾语形式。从法语句中“我”一词的这两种语法形式的区别出发，作者进行了随后的哲理分析。——译者注

一个区别、分化和重新统一的原则。这个相当复杂的原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使得对自我本身的任何客观处理成为可能。如果一个细菌要处理它的分子，它把它们当作对象处理，但是它把它们当作属于它的对象来处理。并且它由自己为了自己来处理它们。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通过把主观的“Je”(我)和客观的“moi”(我)加以区分和重新统一使得实际上可以进行任何操作的原则。这个原则包含有同时参照自我(自我参照)和外部世界(对外参照)的能力,因此能够作出与外在于自我的东西的区别。“自我的—对外的—参照”意谓我能作出“我”和“非我”之间的区别,以及“我”和其他的“我”之间的区别。此外,我们人类还具有两个层次的主体性：我们有大脑的、精神的主体性(这我下文要谈到),我们还有由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保护的机体的主体性。免疫系统进行着“自我”和“非自我”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个体的特有的身份证的分子实体将被拒绝、驱逐、打垮,而具有身份证的将被接受、认出和保护。因此,对“自我”、“非自我”、“我”和“他者”的根本的和即时的区分同时就分配了价值：任何属于“我”、“自我”的东西都被珍视,因而应该受到保护、捍卫;其余的则是无关紧要的或被打击的。这就是主体本征的第一个原则,它使得可能建立“我是我”的主观的/客观的统一以及外部和内部之间的区分。

还有第二个本征的原则,不可分离的,它是：尽管有“我”(moi)的内部的改变(性格、情绪的变化)和“自我”(soi)的内部的改变(由于年龄发生的体质的改变),“我”(Je)保持同一。不错,个体从生到死发生着体质上的变化,他所有的分子被更换了好几次,大部分的细胞也是这样。在“我”的内部还有极端的改变,我下文将讲到。尽管有这一切,主体仍保持同一。他只简单地说：“我曾是孩子”,“我曾发火”,但这总是同一个“我”,虽然个人的外部的或心理的特点在改变。这就是第二个本征原则,即不顾变化和通过

变化的自我参照的不变性。

从这一点上我们将达到第三和第四个原则：一个不相容原则和一个相容的原则；它们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不相容的原则可以表述如下：虽然无论谁都可以说“我”，但无人能够在我的位置上这么说。因此“我”对于每一个人是惟一的。我们在两个单卵双生的孪生儿的例子中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任何体质上的独特性来区别二者，他们根据遗传学观点是完全同一的，但他们不仅是两个人，而且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他们纵有共谋关系、共同的密码、彼此的直觉，孪生儿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在另一个的位置上说“我”。这就是不相容原则。

相容原则与它既互补又对抗。我能够把一个“我们”纳入我的“我”中，就像我能把我的“我”纳入一个“我们”之中：因此我能够把我的心上人、我的双亲、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祖国引入我的主体性和我的目的性之中。我能够把我所爱的人包含在我的主体的本征之中，为了对被爱的人的爱或者对共同的祖国的爱而献出我的“我”。显然在相容和不相容之间存在着对抗性。你们有例子表明有些母亲为了她们的儿女牺牲自己，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孩子；也有一些母亲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抛弃或吃掉她们的孩子。你们知道爱国者将为他的祖国自我牺牲，也知道只想保全自己生命的逃兵。换言之，我们所有人在我们身上都有这两个原则，可以被不同地调整、分配；换言之，主体在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绝对的自我献身精神之间摇摆。

相容原则的根本性并不亚于其他原则。它对于人类意味着同一种族、同一文化、同一语言和同一社会的主体之间相互沟通的可能性。

此外，还存在一个“超我”对主体的占有。在此我取朱利安·杰

尼斯(Julian Jaynes)在其《意识在两院制精神的崩塌中诞生》[①] 一书中的主题作形象化的说明。根据他的理论，古代帝国的个人在他们的头脑里也有两院：一院归属于他们个人的主体性、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所有与他们作为私人的个人相关的东西；另一院被神权——政治的权力、国王、帝国所占据，而当这个权力讲话时，个人主体被这第二院所占有并听从它的命令。根据杰尼斯的观点，意识产生于在这两院之间被打开了一个开口使它们可以相通的时候。这时个人—主体会思考："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并可能变为公民。

在此应该强调十分重要的东西：在"Je suis moi"(我是我)中已经有隐含的二重性：主体在他的潜在的另一个我中同时又在他自身。这正是因为在主体本身含有相异性他才能够与他人交流。这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两重性的统一产物(通过或者是单细胞生物的细胞分裂的繁殖，或者是大多数生物中性别不同的两个个体的交媾而实现的繁殖)，他在本身中含有对另一个"自我"的吸引力。理解使得可能不仅把他人看为 ego alter，亦即另一个个人—主体，而且可以看作 alter ego，即另一个我本身，我与之交流、同感、一致。交流的原则因此被包含在本征原则中，它表现在相容的原则里。

作为不相容原则的结果，在我们身上总是存在着更为主观的东西的不可沟通性。但是依靠相容原则和语言，我们至少可以传达我们的不可沟通性，说："你知道，我的主观性是完全不可传达的"——这样给予不可沟通性以一定的可沟通性。

我们因此发表如下意见：任何个体—主体的固有的性质不能被化归为利己主义，相反，它使得可能进行沟通和实行利他主义。

---

① 由 G.加博里·德·蒙儒(Gaborit de Montjou)从美文版译出，PUF 出版社，1994 年出版。

显然主体也具有存在的特点,因为他与个体不可分,而个体以不确定的、随机的方式生活着,在出生与死亡之间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常常是威胁性的或敌对的世界里。

我们现在可以来参考一下麦克·莱恩(Mac Lean)关于大脑的概念。这个脑子是三合一的。如同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中融为一体的三个存在,既相互区别又保持为一个事物,我们在我们身上拥有爬行动物的脑或古脑,它是最基本的冲动——侵犯性、发情——的中枢;我们还拥有哺乳动物的脑作为边缘系统,它使我们能够发展情感;最后我们还有皮层和特别是由智人的脑大大发展了的新皮层,它是理性操作的中枢。我们因此有这三个机构。有趣的是在这三者之间没有稳定的等级制:并不是理性支配感情和控制冲动。我们可能有等级制中的对换,而这时可能是侵犯性利用我们的理性能力以达到它的目的。在这三个机构之间存在着异常的不稳定性、等级制中的位置对调,而引人注意的是"我"一会儿被吉基尔(Jekyll)医生占据,一会儿被海德(Hyde)先生占据。[①]在人格两重化的情形中,你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文笔,不同的性格,甚至有时有不同的病症,而由起支配作用的那个人说"我",亦即占据主体的位置。我再补充说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情绪变化的东西也涉及人格的改变。在我们整个一生中不仅我们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且我们被不同的人格所占据。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由几个人格组成的协会。但是也有这个体现主体性的"我"——某种固定点,他一会儿被这个人格一会儿被那个人格所

① 作者此处提到的两个人物与19世纪英国作家R.C.斯蒂文森(Stevensen,1850—1894)所著小说《化身博士》有关。该小说描述善良温厚的吉基尔医生因服用了自己发明的一种药物变成另一个名叫海德先生的凶残的人。他此后在善恶两重人格中交替出现。——译者注

占据。

我们再来参考弗洛伊德提出的关于“我”的经典概念。这个“我”产生于来自生物学底层的冲动的“本我”和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代表父亲的权威的“超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个“超我”可以转变为更加广大的代表祖国、社会的“超我”。这个“我”处于与“本我”和“超我”的不停的辩证交互作用之中。在这里同样有一个占据的问题。当我们被“超我”占有时我们继续说“我”，如同我们在追逐纯粹利己主义的目的时说“我”一样。当你沉入最刻苦的智力劳作中时你说“我”，而在你投入最狂乱的色情游戏中时你仍然说“我”。

“我”作为“Je”(我)在人类的经验中是迟迟地涌现的。如同你们所知的，孩子们在讲到他们时首先用第三人称。我们至少可以给予拉康称之为“镜像阶段”的东西以象征的价值，这是形成主体身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它把“moi”(我)客观化，而这个“moi”只是正在注视的“Je”(我)，这个阶段建立客观的形象和主观的存在之间的联系。我在我的书《人和死亡》中强调了在远古人类中“副本”(double)观念的有力存在。副本是人的自身存在的客观的和非物质性的幽灵，它不断地伴随着人，人们在影子里，在映像中看出它。在睡梦中是副本在散步而当时人体一动未动。因此这副本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以后它会变成ghost(鬼魂)在人死亡之时被解放出来，而那时人体将瓦解。副本是“Je suis moi”(我是我)的经验的一个被物化的形式，在其中“moi”(我)首先采取的正是这种现实的但非物质的孪生存在的形式。这个副本将内在化；在文明史开始的社会中，它将产生灵魂的观念，灵魂在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人那里被十分经常地与气息联系在一起。“灵魂”与“精神”是同样的用表示一个特定的客观实在的词语来称谓、表示主体的内在性的方式。人们可以说某人：“他没有灵魂”，而人们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有了不同的称谓这个主观实在的方式，使

我们对之不被严格局限在"Je"(我)和"moi"(我)的表述上;但是正是在这个"Je"[①]和"moi"[②]的辩证相互作用之中主观实在采取了灵魂和精神的形式,并随着我们所称的"意识"重新出现。

在这里我向你们提出的关于主体的定义,是与通过意识来确定主体的定义完全不同的。意识,在我的概念中,是主体性质的最高程度的涌现。这是一个使得精神可能形成一个圆圈返回他自身的反思的涌现。意识是最终的和可能也是最珍贵的人类品质,既然最终的同时也就是最美好的和最脆弱的。而确实意识是极其脆弱的,在它的脆弱性中它可能经常自欺。

当然,情感性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与主体性紧密地联系着的。情感性在哺乳动物身上发展,我们从它们那儿继承了极端的多变性——比如猴子具有十分强烈的情绪,可从愤怒很快过渡到平静,等等。我们是哺乳动物的情感性的继承者,而我们又把它加以发展。情感性因此对人来说是与主体的概念相连的,但它不是主体的最基本的性质。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关于主体的生物—逻辑学的理论,人们认为主体性是一个感情成分,必须驱逐它以便达到正确的认识。但是人类的主体性如同不能被化归为意识一样也不能更多地被化归为它所包含的情感性。

现在应该审察一下主体的概念和自由的概念的联系。自由同时以进行认识和作出选择的头脑的或理智的能力以及在外部环境中可能实行这个选择为前提条件。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失去任何外部自由,处于监狱之中,但是保持着你的理智的自由。

主体可能拥有自由和行使自由。但是主体中有很大一个部分不仅是依附性的,而且是受控制的。此外,我们也不真正知道什么

① 主观之我。——译者注
② 客观之我。——译者注

时候我们是自由的。

于是有第一个不确定性的原则，其内容如下：我说，但什么时候我说，谁在说？只是“我”一个人说呀，还是通过我的“我”，有一个“我们”在说（热烈的集体、团组、祖国、我所从属的党派），还是这是一个“人们”（on）[①]在说（冷静的集体、社会组织、文化组织，它们在我不知不觉中通过它们的范式，我无意识地接受的讲话的指导原则支配我的思想），或者是一个无名的低于人的机器在说，它说给我一个我在说的幻象？人们永远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上是我在说，在什么程度上我是在做一个个人的和自主的讲话，在什么程度上我是在自信是个人的和自主的外表下面，只是重复了灌输给我的观念。

与关于主体的两个对立的信条——一个认为主体不存在，另一个认为主体是一切——相反，主体摇摆于一切和不存在之间。我对于我是一切，而在宇宙中我微不足道。自我中心主义的原则是关于我是一切的原则，但是既然整个我的世界在我死亡时会瓦解，正是由于这个必死性我不存在。“我”，这是闻所未闻的特权，同时又是最平庸无奇的事情，既然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我”。同样存在着主体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摇摆。在利己主义中我是一切，而他人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利他主义中我献出自身，我牺牲自己，对于我为之贡献出自身的人们我完全是次要的。个体—主体拒绝吞没他的死亡，但他能够为他的观念，为了祖国或人类献出他的生命。这就是主体的概念的复杂性本身。

社会生活的很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最丰富的、最炽热的部分，属于主体间关系的范围。甚至应该说由社会内部的相互作用构成的、织造出这个社会的生活本身的主体间的特点，是至关重要

① on是法语中的泛指人称代词，只作主语，泛指人，不明确说明所指的人是谁，可译为“人们”，但在俗语中常代表“我们”。——译者注

的。为了认识人类的、个人的、个人间的和社会的东西，必须把说明和理解联系起来。社会学家本人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精神，他是主体间的织网上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应该看到任何主体都潜在地不仅是演员，而且是导演，能够认识/选择/决定。社会并不仅仅、甚至也不是主要地服从于物质的决定论，它是在个体—主体们之间、在许多的“我们”和“我”之间的对峙/合作的游戏。

总而言之，主体不是本质，不是实体，但也不是幻象。我认为对主体的承认需要实行一个概念的重组，后者与人们仍在人类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应用的经典的决定论的原则决裂。显然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的框架内，不可能认识主体。因此必须有一个重构，必须有自主/依赖的概念、个体性的概念、自我产生的概念、人们在其中既是产物又是生产者的回归的圆环的概念。还应该把对立的概念结合起来，如相容原则和不相容原则。应该把主体设想为给予多种人格、性格、潜在性以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东西。因此，如果人们处于在当前科学世界中占优势的认识范式的支配下，主体就是看不见的。人们否定他的存在。反过来，在哲学世界里，主体变成了先验的，脱离了经验，属于纯粹的精神，因此人们也不能认识主体的依赖性、他的弱点、他的不确定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思考主体的两重性，他的矛盾，不能同时思考他的位居中央和他的能力有限，他的富有意义和他的没有价值，既是一切又是无有的特点。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关于主体的复杂的概念。